

INDEX of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Articles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文章目录 摘要 关键词 精华版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 01 | 2018年第1期 [主题] 数字化城市设计
- 20 | 2018年第2期 [主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开发区发展与规划
- 41 | 2018年第3期 [主题]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国城市雨洪管理
- 61 | 2018年第4期 [主题] 美国规划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 84 | 2018年第5期 [主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当代城镇化
- 104 | 2018年第6期 [特稿]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概观

《国际城市规划》相关信息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主办单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 编 王 凯

副 主 编 陈 明 孙志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 立 于涛方 王 兰 王兴平 王红扬 王缉宪 王 德 龙 瀛 吕 斌 刘 健 孙施文
孙 晖 李志刚 李和平 杨贵庆 杨家文 吴志强 冷 红 沈 青 张 兵 张丽君 张京祥
张庭伟 张 勤 林文棋 林 坚 卓 健 罗震东 周江评 周 俭 郑德高 赵万民 赵星烁
袁 媛 夏 青 柴彦威 徐 江 徐 苗 唐 燕 崔功豪 韩笋生 谭纵波 颜文涛

编辑部主任 孙志涛（兼）

编 辑 部 许玫 王枫 张祎嫻 顾春雪 秦奕

编 务 徐荔鑫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0 号东楼 E320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86-10-58323806 / 58323803

查 稿 86-10-58323835

发 行 86-10-58323820

电子邮箱 upi@vip.163.com

网 址 <http://www.upi-planning.org>

总 发 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 本刊官网

邮发代号 82-363

期刊价格 38.00 元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5583/TU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9493

本刊微信公众号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编辑出版：《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

责任编辑：顾春雪 孙志涛

集册时间：2020 年 9 月

2018年第1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数字化城市设计

王建国 / 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城市设计第四代范型刍议

杨俊宴 /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论范式探索

关成贺 / 城市形态与数字化城市设计

史宜, 关美宝 / 美国高校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初探

龙瀛, 曹哲静 / 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实践

徐刚, 毛羽 / 基于多学科数字技术应用的山地型城市设计实践——以重庆前沿科技城为例

盛强, 方可 / 基于多源数据空间句法分析的数字化城市设计——以武汉三阳路城市更新项目为例

城乡研究

瑞斯·范德尔·沃登, 著; 赵鹏军, 白羽, 安妮·特·维尔德, 译 / 成功还是失败?

荷兰 50 年城镇化政策回顾

杨浩, 张京祥 / 土地财政驱动城市空间生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

刘彬, 陈忠暖 / 权力、资本与空间: 历史街区改造背景下的城市消费空间生产
——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

刘长安, 赵继龙, 高晓明 / 养分循环代谢的城市可持续社区探析

乐晓辉, 林雄斌, 杨家文 / 我国城市小汽车牌照限制政策的社会效益评估

刘莉文, 张明 / 国外高速铁路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及启示

规划研究

伊丽莎贝特·A·席尔瓦, 帕齐·希利, 尼尔·哈里斯, 彼得·范·登布洛克, 著; 李彤玥, 张雨蝉, 顾朝林, 译 /

论规划研究的技巧

王亚洁 /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进展

唐婧娴 / 多中心与单中心区域内城市的交通供给效率
——基于等时间交通圈的对比研究及规划政策刍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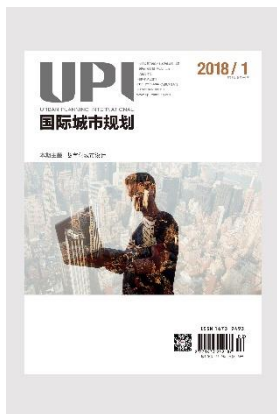
实践综述

胡依然, 张凯莉, 周曦 / 城市制度影响下的香港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研究

万成伟 / 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机制研究——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

书评

朱巍, 周江评 / 如何规划出世界宜居城市? 《为澳大利亚做规划》评介



2018年 第1期

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城市设计第四代范型刍议

王建国

摘要：在城市设计发展历程中，其依托的理论和技術方法一直与时俱进。城市设计先后走过了四代范型，亦即：建筑学基本原理主导、以城市三维形体组织为对象的第一代传统城市设计，以科技支撑、功能区划、三维空间抽象组织为特征的第二代现代主义城市设计，基于“生态优先和环境可持续性原则的第三代绿色城市设计，和今天正逐渐浮现的基于人机互动的第四代数字化城市设计。第四代城市设计以形态整体性理论重构为目标，并以人机互动的数字技术方法工具变革为核心特征。通过众多案例的科学研究实践成果表明，在可见的未来，规划设计编制将有望实现“从数字采集到数字设计，再到数字管理”的跨越。

关键词：城市设计；范型；数字化

引文格式：王建国. 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城市设计第四代范型刍议[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6. DOI: 10.22217/upi.2017.558.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论范式探索

杨俊宴

摘要：数字化城市设计为城市规划学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也向城市设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提出了新的命题。信息时代的城市设计，各类空间相关的基础信息都存在于异构的各种数据系统中，且具有多时态、多坐标、多量纲和多格式等特征，不利于进行数据协同和深度设计挖掘，迫切需要将多源大数据整合于统一规范的空间平台，协同分析城市发展规律。本文在多源大数据的基础上，阐述了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概念。通过构建全数字化城市设计框架，研究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基础性工作包含采集、调研、集成；核心性工作包含分析、设计与表达；实施性工作包含报建、管理与监测。据此可建立基于全数字化流程的城市设计理想范式，以适应不同城市的实践应用。

关键词：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理论范式；多源大数据

引文格式：杨俊宴.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论范式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2-21. DOI: 10.22217/upi.2017.556.

在当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中，城市空间的内涵与形态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谋划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令人关注的问题，包括整体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无序、城市山水格局破坏、人的实际感知和真实生活体验品质不高等，尤其在当前“降速—提质”转型过程中，民众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从而对空间形态的品质和特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城市设计不仅要从“上帝视角”对城市发展提出宏观策略，更要转向“蚂蚁视角”关注个体的城市生活体验，因此数字化转型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

学者关注。在数字技术介入城市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层面的拓展创新，以及因此带来的城市设计工作在效率和内容方面的提升，也要关注因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的城市设计整体方法论的变化趋势，其趋势可以总结为全流程的整体介入、全尺度的综合判断、精准交互的跨学科转译三个方面。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总结 21 世纪以来承担上海、南京、杭州、郑州、芜湖、蚌埠等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设计实践，对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相关技术手段予以应用和验证，改变以往城市设计数字化技术应用往往缺乏大量有效实际数据和足够成果检验的问题。在总结实践反馈的同时，探索数字化城市设计全流程的理论范式。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源于信息时代丰富的多类型大小数据涌现,“万物皆数”为城市设计的底层架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技术轮廓按照工作流程概括为三个主要类型——基础性工作、核心性工作和实施性工作。通过在城市设计的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提升,实现了数字化技术对于城市设计全过程的整体覆盖,并以此构建了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技术谱系。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基础性工作侧重于城市设计前期现状调研工作的开展,可概括为数字化采集、调研和集成三个方面。其中,数字化采集指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城市空间的数据(如建筑、道路、山体、水系等)进行计算机全自动或半自动抓取的方法。包括建筑空间抓取技术、高清遥感影像技术、高程等高线抓取技术、物理环境数据抓取技术等。数字化调研指通过互联网、无人机、激光雷达设备、延时摄影机等数字化设备,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对城市空间进行现场数字化记录的方法。常见的此类调研技术包括 GPS 定位技术、网络问卷技术、无人机航拍技术、360 度全景技术、倾斜摄影建模技术、天空可视域技术、延时摄影技术等。数字化集成指不同量纲、坐标、单位、格式的数据进行集成处理,得到统一的可用以城市设计的时空数据,通常包含格式集成、量纲集成、坐标转换、集成平台等工作方法。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核心性工作侧重于城市设计中后期研究及深化设计的成果绘制,可概括为数字化分析、设计和表达三个方面。其中,数字化分析指通过数字化软件、技术及分析体系对城市空间、格局、景观、人文、环境等一系列要素进行模拟及分析,包含都市分析、景观分析、人文分析、物理环境分析、大数据分析五种类型;数字化设计指通过建立完整的数字化技术方法,对城市空间的结构框架和三维形态进行设计,通常包含空间特色判定、

空间原型分析、虚实骨架建构、多元情景分析、因子叠加模型布局、参数化设计平台等;数字化表达指运用全息交互、VR 虚拟现实等技术方法,多向互动地展现设计成果的表达方式,通常分为静态、动态和交互表达技术。其中,静态表达包含全息图展示、场景渲染展示等;动态表达包含多媒体动画展示、动态结构展示、VR 交互展示等。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实施性工作侧重于城市设计后期实施管控工作的强化,可概括为数字化报建、管理和监测三个方面。其中,数字化报建指通过城市设计的数字化管理平台、设计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将城市设计项目向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行报建的工作方法;数字化管理指运用城市设计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对重点地区的三维空间形态等管控指标进行整体控制,达到精细化管理的目的,通常包含空间形态分区、三维图文导则、高度密度控制、城市设计数字化审批、地块数字化技术要点等;数字化监测指运用城市设计数字化管理平台为城市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监督管理城市设计实施的一种工作方法,通常包含限制性因素自动审核、公众动态参与及历史性地段分级监测等。

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城市设计实践也逐渐呈现出精细化、量化、集成化等新特征趋势,因此探索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论范式,在城市设计的转型与提升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看到,在城市设计的项目实践中,新的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被开发,而对于数字化城市全流程的系统总结以及理论构建还有待完善和提升。本文构建的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理论范式是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城市设计总结与探索,为城市设计的创作与判断提升提供了更科学的“理性沙盘”。同时,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理论范式是基于实践的总结,所提到的技术类型亟待补充与完善,新的数字化工作方式亦值得进一步探索。

城市形态与数字化城市设计

关成贺

摘要: 18 世纪中叶,英国的约翰·斯诺使用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伦敦流行病的爆发,奠定了现代社会城市形态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论基础。随着计算机计算速度的提高和大量数字化数据的出现,城市形态

学在数字化城市设计中的应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从凯文·林奇的城市形态学元素的分析入手,结合城市形态学在数字化城市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实践与研究来探讨其所带来的影响。结合国际学术领域的发展和案例,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城市形态学与数字化城市设计在未来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城市形态; 空间分析; 数字化城市设计; 城市强度

引文格式: 关成贺. 城市形态与数字化城市设计[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22-27. DOI: 10.22217/upi.2017.540.

美国高校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初探

史宜 关美宝

摘要: 基于大数据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城市设计出现新的变革,即数字化城市设计。在数字化城市设计应用的实践中,美国规划设计院校逐渐成了引导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的重要前沿。选取在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中独居特色的三所美国规划设计院校,分别从工程、科研、教学等层面,介绍美国高校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动态,为我国城市设计学科建设和行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城市设计; 数字化; 高校; 美国

引文格式: 史宜,关美宝. 美国高校数字化城市设计发展初探[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28-33. DOI: 10.22217/upi.2017.555.

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实践

龙瀛 曹哲静

摘要: 大数据的兴起,深化了人们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对现状的精细化认识。城市传感器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为规划设计的后置式反馈和精确描绘分析对象提供了契机。在线平台不仅动态展示城市数据信息,更激发了城市人群个体的空间应变,提供了空间需求信息反馈的渠道,促进了不同角色的交互与沟通。本文提出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方法,在搭建整体框架的基础上,解析数据和传感器类型,划分在线平台的模块,提炼五类应用场景。文章进一步将这一自反馈式城市设计的方法初步应用于上海衡复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实践,提出了空间传感器植入框架,结合多种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形成融合多种功能模块的衡复区信息共享网络交互平台,包括街道慢行指数测度平台、人本观测平台、人迹地图平台、方案宣传展示平台、公众参与平台、人际数据交互感知地毯数据平台等六大版块,并对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数据增强设计; 城市传感器; 在线平台; 空间干预; 上海衡复历史街区

引文格式: 龙瀛,曹哲静. 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方法及其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34-42. DOI: 10.22217/upi.2017.553.

1 城市传感器及在线平台的运用契机

城市传感器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断兴起,促使人们通过自定义城市传感器的类型、安装场地、监控时间和反馈周期,获得城市特定区域空间要素或人群的详细数据,并精准刻画其特征,

为规划设计的精确描绘分析对象和后置式反馈提供了契机。此外,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影响下,城市的物质空间逐渐依赖于虚拟网络来强化彼此的连接,人们对城市的主观感知不再囿于传统物质空间的体验,而倾向于从网络空间获

得更多新的认知与发现,进而引发了对城市空间新的需求。整合多样化城市数据信息而形成的可视化的开放在线平台将成为重要载体,使得以往模糊的、碎片化的城市信息被感知到。个体在动态的感知下将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和空间需求,继而映射到真实空间的改造中。在线平台不仅是城市数据信息的动态展示,更激发了城市人群个体的空间应变,提供了空间需求信息反馈的渠道,促进了不同角色的交互与沟通。

2 数据类型、传感器、在线平台与应用场景

本文构建了“传感器布置—数据采集—平台数据整合—平台功能实现—反馈形式”的整体架构;梳理了三类在线平台的数据源,即开放数据、大数据和自定义传感器数据。平台的功能在于整合单一维度的数据源,形成融合的分析,以不同功能板块呈现分析结果,从而为民众、规划师、城市管理者、开发商等提供信息参考、反馈渠道和协商平台。平台包括“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预处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输出和展示”六个模块,主要形成了六大应用场景:(1)监测设计方案实施状况并进行空间修正;(2)基于多情景预测的设计导

则,监测空间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空间动态干预;

(3)促进公众参与;(4)城市设计实施的动态管理和紧急情况应对;(5)通过空间与人群交互数据的可视化增加空间的趣味性和启示性;(6)对人群行为进行实时诱导并优化空间设施配置。

3 应用案例

本文以上海衡山路—复兴路(简称“衡复”)历史街区慢行系统设计为例,探讨基于传感设备和在线平台的自反馈式城市设计方法的运用。为了对街道特征进行测度从而实现空间修正、动态规划和促进公众参与,方案特提出了空间传感器植入框架,结合多种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形成融合多种功能模块的衡复街区信息共享网络交互平台,包括街道慢行指数测度平台、人本观测平台、人迹地图平台、方案宣传展示平台、公众参与平台、人际数据交互感知地毯数据平台等六大板块。在明确不同指标数据搜集方式和搜集周期的基础上,该方案主要针对不同类型街道导则的实施状况、各类街道是否需要重新划分、交互装置的实时反馈、城市监控管理与调度、信息传达与公众参与等五个维度进行城市设计的自反馈。

基于多学科数字技术应用的山地型城市设计实践——以重庆前沿科技城为例

徐刚 毛羽

摘要: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引导城市空间营造行为的技术实践,具有系统性、开放性和丰富性的特征。现代城市设计面临的挑战如此复杂,已远超传统的空间美学范畴,需要融入众多相关学科和工程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推动城市设计工作更为综合和科学。本文以重庆前沿科技城城市设计为例,探索在山地型的城市建设区,如何在满足合理建设强度,并承载既定发展目标的同时,针对山地环境特点,抛弃强力改造地形的常规手法,探索低影响开发的多种手段;并研究如何依靠现代的可量化技术工具,有效降低工程成本,综合达成产业、宜居、活力、高效、生态、节能、智慧等多元化诉求。这一方面为城市设计影响、完善甚至修改法定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也为城市设计有效引导后续具体的开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案例中运用的可量化技术工具涉及山水空间、生态保护、安全保障、海绵城市、市政能源以及风环境模拟等方面。

关键词: 数字技术; 山地型城市设计; 重庆

引文格式: 徐刚,毛羽. 基于多学科数字技术应用的山地型城市设计实践——以重庆前沿科技城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2018(1): 43-51. DOI: 10.22217/upi.2017.542.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引导城市空间营造行为的 技术实践,具有系统性、开放性和丰富性的特征。

现代城市设计面临的挑战如此复杂，已远超传统的空间美学范畴，需要融入众多相关学科和工程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以推动城市设计工作更为综合和科学。

本文以重庆前沿科技城城市设计为例，探究在山地型的城市建设区，如何在满足合理建设强度并承载既定发展目标的同时，针对山地环境特点，抛弃强力改造地形的常规手法，依靠现代的可量化技术工具，探索一套因地制宜的山地人居环境塑造方法。在有效降低工程成本的同时，综合达成产业、宜居、活力、高效、生态、节能、智慧等多元化诉求。

重庆前沿科学城的实践尝试以 Autodesk Inforwork 三维数字平台为工具，通过精细化的规划现状预评估手段、参数化的山地规划设计方法、人性化的规划后评估指标构建，从山水景观、场地水文、生态环境、场地竖向、建设能耗、山地微环境等多个要素探讨如何通过多学科合作交融，全方位思考以综合解决山地城市低影响开发的规划问题。

项目搭建的数字平台支持多种数据格式，通过导入多种类型数据建立基础模型，各专业使用传统地形图及设计文件即可在基础模型上作业，并使设计成果快速可视化，在模型上实现各个专业系统设

计的即时互动与量化度测。

本次设计前期使用 ArcGIS、Civil3D 等软件进行多尺度基础现状分析。在基础模型上使用 ArcGIS、Fragstats（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软件）分析场地整体生态效益结果；使用 DigitalWater Simulation 模型软件进行场地产汇流分析与雨洪管理规划测算；使用 Civil3D 进行土方工程量测算，优化道路场地竖向标高与平面线型；使用 Phoenix 进行微环境风环境模拟；使用 Skyline 进行山地空间景观视线优化分析。最终形成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生态规划、环境规划、能源规划、交通规划、市政规划、智慧城市等 10 多个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城市信息模型（CIM: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系统实现三维数字化技术集成创新，解决多专业协同作战和技术集成创新的问题。

数字化的平台搭建使得该方案的各项措施经过量化分析后落实到了三维空间图纸上，大大提升了方案设计的精确度，同时对方案进行的各项指标评估也提升了规划的可实施性。因此，数字化平台为城市设计影响、完善甚至修改法定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也为城市设计有效引导后续具体的开发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

基于多源数据空间句法分析的数字化城市设计——以武汉三阳路城市更新项目为例

盛强 方可

摘要：实现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想需要立足于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及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设计的工作方法。本文以武汉三阳路地区城市更新项目为例，介绍空间句法模型如何综合利用网络开放数据、无人机航拍、实地调研等多种数据源，在城市尺度初步概念设计阶段和街区尺度设计方案深化阶段对这些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将结论应用于基地潜力评测、方案比较和优化等辅助设计工作中。

关键词：网络开放数据；无人机航拍；街景地图；空间句法；数字化城市设计

引文格式：盛强，方可．基于多源数据空间句法分析的数字化城市设计——以武汉三阳路城市更新项目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8(1): 52-59. DOI: 10.22217/upi.2017.541.

1 内容简介

数据时代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规划和设计方法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方向。而面对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源，如何将数据的分析落实到空间设计层面则更为重要，也是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目

前数据对于城市设计的价值往往是对城市现状进行的一系列数据可视化和识别，其发现可以用于修正传统数据（如用地功能属性）的局限性，更为合理地确定城市中心等级等一系列现状条件。在可视化和识别的基础上，基于数据分析还可以进行城市

问题的诊断,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设计目标。对设计师而言,这意味着能够获得一份更为理性的任务书。但是,这种工作方式未能触及城市空间设计的核心,对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而言,数据或数字化的模型对设计工作的意义仍仅体现于前期策划或后期评价阶段(如对生态环境或交通的影响)。

空间句法理论及模型可以基于对城市数据的空间分析,发现城市设计中的功能和交通等关键内容与城市空间形态这个由设计师控制的关键设计手段之间的量化关系,从而在设计的全流程中贯彻数据化模型的作用,帮助设计师评价选择合理的空间形态与功能布局。

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城市规划和设计项目应用了空间句法模型,但在项目不同阶段、不同尺度上结合多源数据分析的空间句法项目仍不多见,本文以武汉三阳路地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为例,详细介绍空间句法在该项目前期概念设计、中期设计过程中决策与方案比较方面的应用。

该项目由武汉市规划研究院牵头,英国福斯特公司负责总体统筹规划设计,空间句法—北京交大联合实验室负责数据空间分析和辅助设计。设计的目标旨在重建基地的慢行系统,打造宜人的街道氛围,力求将此地区建设为以人为本而非服务于机动车的步行街区。

2 数据与方法

空间句法的空间建模往往应用百度和高德地图的网络开放地图资源。本项目使用的武汉大区域尺度模型基于百度地图最高精度的道路网络,抓取处理生成道路轴线,而后在三环路以内的中城区进行了道路双线合并,拓扑角度连续性检验及高架桥、隧道等立体连接处理等手动修正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空间句法分析往往需要足够大的建模缓冲范围,本项目使用的模型囊括了大约 3000 km² 的广大区域,作为基础的轴线模型共计街道线段数 299 466 条。

本项目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用地功能类数据和交通行为类数据,其中用地功能数据主要是软件抓取的武汉中心城区零售业与餐饮业百度 POI,交通数据则主要依靠无人机航拍获取。除此之外,项目基于街景地图对百度 POI 的功能落位在局部地区

进行了手动修正,并对基地内老住区内居民的社会聚集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

城市规划与设计项目往往在不同阶段涉及不同尺度的工作内容,具体到本项目中,按项目进程和尺度大体可分为城市尺度概念设计和街区尺度深入设计两个阶段。

在城市尺度概念设计阶段主要采用的是百度 POI 数据。空间句法的工作内容包括两项:首先是对城市尺度餐饮零售业功能分布聚集(即城市中心活力的空间支持条件)进行分析;而后是该结论在基地内的应用,即对设计师提出的功能分布进行空间可达性评价。

街区尺度深入设计阶段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

(1) 基于无人机航拍视频获取各类交通流量数据并进行空间分析;(2) 结合道路设计方案和基地外未来发展规划对交通量分布进行预测;(3) 根据街景地图矫正后的商业功能落位进行高精度的商业分布空间分析;(4) 根据三阳路地区道路网络设计方案进行机动车、自行车和步行流量分布预测;(5) 对三阳路老住宅区户外社会聚集现象进行调研分析与设计应用。

3 城市尺度概念设计阶段的分析

概念设计初期福斯特公司基于对三阳路地区的实地调研,提出将该地区公共空间更新定位为城市艺术区,并提供了武汉市 7 个与之具有类似艺术特征的活力中心区案例。图 2 为武汉三环内零售业与餐饮业 POI 按 400 m 路网可达范围均匀化处理后的可视化地图,从中可以看出武汉市中心城区各个中心区域的活力等级差异。

为研究零售业和餐饮业在各中心的聚集程度,本项目具体选取了 12 个半径的四组参数。从分析结果来看,穿行度对各案例商业聚集的决定系数随半径增加而提升,在半径达到 7.5 km 的峰值后略有下降。整合度系数(含 NAIN)在 1.2~1.6 km 半径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结果说明,如果某个片区在城市尺度范围具有较好的联系(大半径穿行度值高,机动车流量高),且在局部尺度范围内与周边街道有较好的联系(规整的小尺度街道网格),则该片区往往也具有更多的零售餐饮功能分布。这个研究结果对设计的意义在于,可用于判断设计区域对城

市商业功能聚集的空间承载力,也可用于在概念设计初期量化评测各拟建功能吸引点大致的入口落位。

4 街区尺度深入设计阶段的分析

由于三阳路中段近年来处于断路施工状态,现状流量数据的分析需在同样断路条件下的模型中进行。即便如此,车流量数据与7.5 km穿行度的决定系数还是达到了0.649,说明该参数对车流量有较好的解释力。从评测设计方案的目的出发,本项目基于该回归方程计算了三阳路贯通时(2012年地图)和2020年两个设计方案的影响对比。这两个设计方案的差别在于,方案1将三阳路公园绿地布置

在路中,南北两侧为单向车道;方案2将公园布置在路北,而南侧为6车道。从对步行者的观察经验来看,车流量小于500车/小时的路段对步行穿越是基本安全的。因此方案1将车流量划分成两部分,有利于道路两侧步行者到达公园,与福斯特公司设计团队讨论后确定为推荐方案。

除对该区域的交通流量进行预测外,本文还基于功能分布的回归分析预测了新方案对本地区商业潜力分布的影响。同时,基于对本地区社会聚集现象实地调研的结果,发现其聚集规模与空间句法参数的关联,并将该研究成果用于在深化设计阶段量化、对比和评价各方案聚集场地分布的使用效果。

成功还是失败? 荷兰 50 年城镇化政策回顾

瑞斯·范德尔·沃登 著 赵鹏军 白羽 安妮·特·维尔德 译

摘要: 荷兰城镇化政策始于50年前。起初,它是基于集中化分散概念和增长中心政策;1988年以后,则是基于紧凑城市和开发区位管理政策。本文基于已有的评价性研究和地图分析,评估了荷兰50年来的城镇化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强大的城镇化压力之下无法完全阻止城市蔓延,但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关键词: 荷兰空间规划; 城镇化政策; 制度变迁; 政策评估

引文格式: 瑞斯·范德尔·沃登. 成功还是失败? 荷兰50年城镇化政策回顾[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60-67. DOI: 10.22217/upi.2017.173.

土地财政驱动城市空间生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

杨浩 张京祥

摘要: 以“土地财政”支撑的城镇化资本逻辑,可细分为彼此嵌套、相互助推的三个循环关系:工业用地的低价出让以吸引投资,追求长期利益;商服、居住用地的有偿出让或以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实现资本快速的原始积累;投入基础设施及提供公共服务,以助推土地增值,优化城市功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南京河西新城这一典型的土地经营案例,揭示出新城土地财政资本的空间积累方式:以房地产财政实现初期的快速资本积累,随后寻求工商业等长期税收收益的保障,以及与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公共产品供给。然而,土地资本的非均衡配置隐藏着资本过度积累与固化社会分异等危机,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急需转型,因此本文提出了资本驾驭与空间规制等方面的应对思考。

关键词: 土地财政; 空间生产; 资本循环; 南京河西新城; 土地经营

引文格式: 杨浩, 张京祥. 土地财政驱动城市空间生产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68-74, 100. DOI: 10.22217/upi.2016.219.

权力、资本与空间：历史街区改造背景下的城市消费空间生产——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

刘彬 陈忠暖

摘要：随着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在城市的兴起，各种消费空间在城市中扩张，将历史空间打造成全新的消费空间成为很多大都市进行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一背景，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相关理论，对基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而成的城市新型消费空间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在城市新型消费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权力对制度空间进行规训，而开发商主要通过资本对物质与经济空间进行打造和控制，城市新型消费空间的生产由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对此类空间的生产模式进行批判性反思，如空间打造和使用过程中存在本土文化的表面化、空间的排他性以及缺乏公众参与等问题。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消费空间；空间生产；远洋太古里

引文格式：刘彬,陈忠暖. 权力、资本与空间：历史街区改造背景下的城市消费空间生产——以成都远洋太古里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75-80, 118. DOI: 10.22217/upi.2016.265.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影响深远的消费革命，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形态，各种消费空间在城市中扩张，消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在消费空间“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基于传统的历史空间形塑而成的全新消费空间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手段。如纽约的苏荷区、旧金山渔人码头的复兴以及伦敦道克兰地区的再生等，使得曾经面临衰败的历史空间变成前卫的商业消费空间。而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历史街区也在政府和开发商的投资建设下，被塑造成为令人目眩的、融地方传统与时尚消费于一体的全球地方化景观，诸如上海新天地、南京 1912、宁波老外滩等一系列新兴的“历史风貌区”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不断涌现。

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取位于成都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的远洋太古里购物中心作为研究案例，运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相关理论，采用历时态的分析方法对其的形成进行剖析，并从权力和资本两个角度探讨在全球化与消费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形塑为城市新型消费空间的过程以及这种塑造背后的主导力量与生产机制。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其对空间的实践主要是通过土地制度、规划文件来界定空间改造的方向以及调控资本的参与过程，以实现其权力的规训。在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

中，对传统历史文化街区的定位直接影响空间的改造和开发策略；而规划对城市空间的容量以及建筑形态的控制又影响消费空间的外部形态。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 2002 年被纳入政府的改造范围，由政府主导的空间实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划文件来实现对原有历史空间的规训与改造。然而，由于对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导致规划和改造建设出现严重失误，致使政府主导下的“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出现“拆除—重建—拆除”的荒诞历程，而这一失误也折射出转型期我国城市发展中以单一权力为主导的空间改造与建设面临的困境。

由单一政府主导的空间实践的失败使得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地方政府退居二线，将土地交由开发商进行开发和使用。2011 年 4 月，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决定投资 59 亿元联合开发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且将项目的名称定为成都远洋太古里；这也意味着 2002—2010 年期间以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街区生产实践转向以开发商为主导的新型商业文化空间的生产；而开发商为主体的资本对空间的作用既包括对物质空间的设计与打造，也包括其对内部经济空间的控制。

最终，政府权力与资本合谋，远洋太古里成为本土文化与全球消费文化全方位互相渗透的结果；企业化的政府“经营城市”的方略与意图加快资本循环的开发商形成了一致的需求耦合——政府需要开发商的资金与市场化的经营策略，而开发商需

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支持，两者结成政府—开发商“城市增长联盟”，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合作，客观

上加快了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进程。

养分循环代谢的城市可持续社区探析

刘长安 赵继龙 高晓明

摘要：在当前城市面临的种种困境里，养分线性代谢是一个日益严重却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构建新的城市养分代谢系统、重新闭合养分循环是一个必要措施。本文以马克思“代谢断层”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城市养分自然循环过程遭受破坏后带来的代谢失衡等严重后果；从社区层面入手，把社区代谢废物视为可以循环利用的养分资源，关联废弃物、肥料、农业、食物及居民等诸多要素，促进形成社区内部递进往复的养分循环过程，以修补代谢断层。本文以鄂尔多斯郝兆奎社区为例，将农业要素融入社区空间，重构社区基础设施，循环利用社区代谢废物，解析在社区尺度实现城市养分闭合循环的作用机理，并介绍相关的可持续社区规划理念，以期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可持续社区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养分循环；城市代谢；城市农业；有农社区；可持续社区；代谢断层

引文格式：刘长安，赵继龙，高晓明. 养分循环代谢的城市可持续社区探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81-85.

DOI: 10.22217/upi.2017.194.

在当前城市面临的种种困境里，养分线性代谢是一个日益严重却被长期忽视的问题，构建新的城市养分代谢系统、重新闭合养分循环是一个必要措施。

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就提出了“代谢断层”（metabolic rift）的概念，揭示了养分代谢过程与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多维度关联。其后果一方面是土地养分枯竭，被迫消耗石油等矿藏资源进行贴补；另一方面是城市被垃圾围困，为污水脱养、垃圾填埋等环境问题苦恼不已。而这正是因为城市的代谢循环通路断裂造成的。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一切事物都有其去向，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所谓的“废物”。现代城市每天都产生大量废水、垃圾、人类排泄物，通常人们只考虑如何处置这些所谓的“废弃物”，却极少将其视为可以循环利用的养分资源。通过变革城市相关基础设施，把线性、开环的养分代谢通路重新闭合成循环流动的回路，使土地流失的养分重新返田，避免养分从农业—食物系统中向外泄露，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养分线性代谢问题。

近年来在社区层面关注养分循环问题的建设实践颇多，位于中国鄂尔多斯市的郝兆奎社区是一

个典型案例。区别于普通住区，该社区的显著特征是内部相对封闭的养分循环体系，其作用机理在于就地收集、利用社区产生的富含养分的有机代谢废物，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有机肥料；经过社区内部城市农业作物种植，将肥料中的养分转化为人可以食用的食物，再通过社区居民对食物的代谢开启新一轮养分循环过程。

在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线性代谢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养分循环的重要生态意义及相关技术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得到关注。正如麦克维尔（Mcconville）所言，养分代谢如此重要，在制定任何尺度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策略时，都应该把养分再利用问题纳入考量。社区作为介于微观的建筑与宏观的城市之间的中观尺度，与建筑相比，其可容纳食物生产、食物消费、废弃物收集、养分转化、肥料返田等全过程，分类回收社区内部的有机废弃物并集中转化为农作物可利用的养分，建立更为完整、有效的社区级养分循环系统；与城市相比，社区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和人群，不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过多投资即可建立相对封闭的社区内部养分循环，可操作性较强且相对独立，由此形成的养分循环半径更小、效率更高，因而社区是

当前可能实现养分闭合循环的适宜尺度。通过社区内部废弃物的收集与再利用，闭合社区内部养分循

环，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持整个城市的代谢系统，值得在我国可持续社区建设中加以推广应用。

我国城市小汽车牌照限制政策的社会效益评估

乐晓辉 林雄斌 杨家文

摘要：我国一些大城市已经采取小汽车牌照限制政策来应对城市快速机动化下交通问题的挑战，但这些政策实施的社会效益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政策细节缺乏系统的评估。本文在梳理各城市限牌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一般社会效益评估的模型框架，对竞价、摇号、混合等限牌模式进行社会效益的经济学分析，并与不限牌模式和理想限牌模式进行对比。另外，结合该政策探讨其对城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交通问题日益显著的背景下，限牌可显著提升社会效益，而且理论模型显示“竞价”方式的社会效益更优。然而，无论是强调效率还是公平，竞价还是摇号，现有方案都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完善，以提升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政府需在限牌政策模式和细则制定、小汽车使用管理、公共交通体系完善和政策信息透明化等做出协同改善。

关键词：小汽车限牌；经济分析；社会效益评估

引文格式：乐晓辉，林雄斌，杨家文. 我国城市小汽车牌照限制政策的社会效益评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86-94, 118. DOI: 10.22217/upi.2016.017.

随着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由小汽车数量的膨胀而带来的交通拥堵、能源消耗、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大量关注。为了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汽车的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先后颁布了车牌限购政策，即政府通过定期发放低于市场需求的车牌数量，由公众通过竞价、摇号或者组合的方式竞得车牌，从而实现对私人小汽车拥有速率的控制。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7 个城市实施了私车牌照的限制政策。其中，上海采用竞价拍卖，北京和贵阳采取摇号，其他城市（如广州、天津、杭州、深圳）采用了“摇号+竞价”的组合模式小汽车拥有量和使用度较低，道路不拥堵、尾气污染也能自我净化的情况下，除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成本，车牌消费的社会净效益可认为等于居民通过使用小汽车给社会创造的总收益。而一旦汽车使用超过容量，则产生拥堵和环境负外部性，社会净效益将大打折扣。此时，是否“限牌”和“限牌”所采用的模式将对社会净效益造成极大影响，其值通过以下公式表示。

社会净效益 = 社会效益(SS) – 社会成本(SC)
= F(Q, M) – Q² × MC

上式中，Q 为政府提供的汽车牌照额度，M 代表获得牌照的个体获得的净效用，F(Q,M)代表车牌消费带来的社会效益，是个人净效用的加总。Q’代表实际增加的小汽车使用量，应该是 Q 的正向函数，同时受小汽车使用政策的影响。MC 则代表小汽车使用的边际外部成本，即个人不曾支付的社会成本。在车牌发放数量给定的前提下，社会效益的大小取决于限量供给的车牌是否被边际效用相对高的群体获得，社会成本取决于增加的车牌如何带来相应的车辆使用增加和拥堵外部性的大小。容易理解的事实是：在一个已经严重拥堵的城市里，限牌具有可观的社会净效益。

不同的车牌投放模式会造成居民差异化的消费心理、决策取向和行为偏好，进而影响最终获得的社会净效益的规模。“竞价”模式遵循的是“价高者得”的市场规律，消费者基于对自身可通过小汽车获得的效用和对车牌竞拍市场的判断出价，出价价格靠前的居民获得车牌。单纯竞价方式有利于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更多地分配给高边际效用使用者，

从而产生相对较大的社会效益。“摇号”模式下，参与者的中签概率几乎相等，使得高边际效用者获得车牌的机会相对大为降低；而限牌恐慌更进一步刺激摇号基数的上升和中签率的下降，在效率实现上最为不济。组合模式将两个渠道的效益加和，由于投机心理的存在，部分高边际效用个体将受中签率高低、竞价走势的影响游走于两个模式之间，两者的指标额度配比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总效益的值。从各模式的社会净效益规模来看，排序为：不限牌<摇号<摇号+竞价<竞价。

城市交通和个人出行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深远影响，层面多而复杂。小汽车限牌政策将小汽车带来的外部成本“显化”的同时，也拉大了不同收入阶层间出行模式和机动性的差异，而这又将进一步影响居民就业、住房选择等生活的其他层面。限牌政策作为政府干预之一，影响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重新分配，其中反映出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正是政策应重点考虑的。

得益于经济收入的上升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内城市对小汽车的需求正处于膨胀状态，而随着

“限牌”政策的实施，部分潜在需求也被提前激发。如果政府期望通过汽车限购或其他使用管制措施来改变人们拥车和用车的行为，则应同时注重限牌细则的制定和相关配套政策的有效性，并改善小汽车以外的交通方式的出行环境和服务水平。若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为目标，可优先考虑竞价方式，或妥善配置组合模式中两者比例。

我们往往无法比较效率和公平哪一个更为重要，只能在整个社会系统环境下权衡两者。无论是出于公平还是效率的考虑，现有政策在细节制定上都有待完善。例如，提高摇号门槛并鼓励摇号中签者长期持有指标，或采取按排量分类竞价等方式。另外，限牌政策的效率和公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其他相关交通配套政策才能得以实现，如创造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出行环境，采用价格杠杆降低小汽车使用率等都是必要的协同手段。并且，创造一个信息透明的政策环境，也有助于增加限牌政策的市民认可度，提升限牌政策的实施效果。

国外高速铁路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及启示

刘莉文 张明

摘要：交通基础设施改进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人们普遍认为高铁能缩短时空距离，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目前，中国建设高铁里程最多，对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却甚少。通过国外权威期刊文献分析，梳理高铁压缩时空距离、增加乘客量、改变交通模式份额、与航空产生竞争关系、提高可达性，以及高铁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引起区域经济空间不均衡发展等影响。本文提出对中国高铁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启示，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强化实证分析，有助于利用好高铁这把双刃剑，构建多元化交通系统模式，避免极化效应带来的过度集聚经济，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速铁路；空间经济；影响；综述

引文格式：刘莉文，张明. 国外高速铁路对区域空间经济的影响研究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95-100. DOI: 10.22217/upi.2017.034.

目前，中国高铁里程最多，占世界运营总里程的 50%。但对高铁如何影响空间经济的研究甚少。整理国外权威期刊文献，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1) 高铁压缩时空距离，颇受乘客青睐，增加

乘客量。韩国高铁 KTX 的最高时速是 300 km/h，往返主要城市之间能够缩短近一半的运行时间，首尔到釜山的时间从 4 小时 10 分钟缩短至 2 小时 40 分钟，这极大地改变了乘客的出行观念，高铁运营

后日均客流量增长 38%，从 2004 年的 72 万名乘客增长到 2006 年的 100 万名乘客。高铁作为可替代的交通模式，从航空、小汽车等交通领域内捕获了相当大的乘客量。日本的 SANYO 新干线运行后，高铁吸引的乘客有 23%来自航空，16%来自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对航空的份额影响较大。

(2) 高铁提高了区域或国家的可达性，可促进其经济发展，但学者也认为高铁增加了区域空间差异，具有“廊道效应”和“极化效应”。蒙宗等学者利用可达性方法，探讨了高铁对区域空间差异的影响。

(3) 高铁可带来“极化效应”，使得高铁站点、廊道或都市圈内产生经济、人口空间集聚，导致区域空间经济不均衡发展。高铁是否带来空间差异、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成为热点问题。

研究最后提出对中国高铁空间经济影响的几点研究启示：

(1) 建议构建多尺度、多层面的理论体系框架，

从宏观即国土层面、中观即城际层面和微观即城市层面，构建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多尺度研究理论框架。

(2) 拓宽研究领域，多视角、深入、系统地研究，拓宽学科间交叉与深度融合，弥补国内高铁对城市和区域空间差异研究的不足。

(3) 强化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借鉴适合的分析模型，探讨高铁对特定区域经济的影响。国内实证研究多集中在已建成的京沪、武广、沪昆等高铁线路，当前亟须展开一系列比较研究，对已通高铁和未通高铁城市之间、京沪线路以外的多线路之间、中西部各地区之间，以及多个城市群之间，探讨高铁对不同区域、不同线路、不同城市（已通高铁和未通高铁）的空间经济影响。利用好高铁这把双刃剑，加强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用，避免极化效应带来的过度集聚经济，对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

论规划研究的技巧

伊丽莎贝特·A·席尔瓦 帕齐·希利 尼尔·哈里斯 彼得·范·登布洛克 著 李彤玥 张雨蝉 顾朝林 译

摘要：这篇文章集中讨论空间和区域规划学科的研究问题。规划研究与一般的科学研究相同也不同，甚至与空间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文章重点就如下问题进行了论述：(1) 关于规划学科研究的争论；(2) 空间和区域规划做研究的特殊性；(3) 规划学科的知识传统及其对研究实践的影响；(4) 规划研究的认识论和道德敏感性；(5) 在规划实践中研究：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规划研究方法；空间与区域规划；规划的知识传统

引文格式：伊丽莎贝特·A·席尔瓦，帕齐·希利，尼尔·哈里斯，彼得·范·登布洛克. 论规划研究的技巧[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01-110,142. DOI: 10.22217/upi.2015.315.

这篇文章集中讨论空间和区域规划学科的研究问题，聚焦于规划领域承担研究需要面临的多重挑战，填补了规划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空白。可以认为，这是一本规划研究方法的实用手册，它将广泛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文献与规划领域的特殊性关联起来。要求作者特别注重规划领域做研究工作的技巧、应用在规划领域的各种各样研究方法以及规划中做研究产生的特定挑战。

首先，研究者应注意到空间和区域规划做研究

的特殊性。规划研究与一般的科学研究相同也不同，甚至与空间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较大差异。已知有关研究的最常用的定义来自弗拉斯卡蒂手册，“研究”是指“为了增加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储备而进行的系统性创造工作，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储备进行新的应用的各种活动”，该定义本来用以评估研发活动，但它已被包括学术机构在内的大部分社会群体广泛采纳并应用。在英国的学术研究质量评估中，研究被定义为“调查引发新见解并且

能够有效共享的过程”。在这两个定义中有几个重要内涵。首先，它们都重点强调了知识可以是全新的，也可以是如第二个定义所指出的以某种方式运用已有的知识引导新的见解，而这种知识应当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如上所述，研究的第二个特征——通过调查的过程获得知识的应用——对于规划学科尤为重要，规划领域聚焦于规划实践。系统性研究调查起到对经验进行巩固和评估的作用。行动导向、明确的规范性焦点、认可系统性的知识产生在塑造和评价现实世界干预中的价值、对于场所特质和空间关系抱有实质的兴趣、对于规律和范式多元性的敏锐程度、对知识产生和运用的政治制度环境的认知、对知识产生和运用的伦理维度的敏感性等特征使得规划学科内的研究工作独具特色。

其次应关注规划学科的知识传统及其对研究实践的影响。一个学科（例如规划学科）吸收了优势知识传统的方式将导致其与确定的研究方法具有密切关系，读者应当能够建立多样规划知识传统与规划研究设计及方法之间的关系。规划实践具有与不同的国家相关的不同侧重点、不同政治动态和制度形式背景，这些不同的背景，不仅使规划研究产生了多样的关注焦点，而且还要求规划师具备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多元的实践渊源也生成了适应于多元知识传统的规划领域知识文化，这些知识文化与规划实践与制度环境相联系，这些知识传统并非以一个传统接替和覆盖较早的一个传统的形式，或被安排在一个历史性的连贯范式中，其中很多传统持续并行存在，导致了学科多元化以及共存的知识传统的异质性。文章以“早期规划的发端：城市和区域规划中调查的演变—社会科学转向—理性分析、系统建模和理论构建—1970年代激进主义批判—科学规划、类方法和行动规划研究兴起—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转向”作为脉络梳理了

这一历史性的连贯范式。

第三，认识到规划研究的认识论和道德敏感性。实证主义的假设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领域，并渗入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规划领域，并且在新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不断进化。哲学的转变已经削弱了认为运用科学能够完全理解世界的希望。相反，大多数研究者普遍认为，任何研究都仅仅是认识复杂的、动态的、我们生活着的、规划工作进行着的一部分世界。源于“实证主义”传统的方法仍然有效。规划研究者具有一系列的关键研究敏感性，包括“对与其研究课题相关的社会背景的认识”“能够明确地阐明人或者其他力量可能做出怎样的行为”“针对适用于环境、问题和假设的研究策略选择”“仔细关注如何进行‘研究解释’和‘研究报告’的架构和表达”。

第四，要在实践中研究，即理解研究与实践的相互作用。规划研究和实践是多元且复杂的关系，其中一些关系强调“谁”进行规划研究、利益相关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从事和委托进行规划研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实践是研究的“思想”源泉，实践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场所”，实践是从事研究的场所，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从事规划研究的人最重要的是识别和反思他们与实践相关的“立场”，并理解这一立场对其所从事的研究的影响。

结论：对着手规划研究者的善意提醒。规划研究是一个系统性的探究过程；规划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相比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往往具有强烈的实用目的导向；规划是空间性的学科，大部分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评估并试图理解场所及其相互关系；《规划研究方法手册》将呈现出有经验的规划研究者如何发现并制定出路径，以迎接做研究中复杂方法的挑战。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进展

王亚洁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利用不协同问题凸显，亟待加强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本文总结了国外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进展，以为国内提供借鉴。国外大多数研究表明，城市轨道交通对站域土地价值的提升显著，提升程度受站点服务情况、地产类型和站

域居民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能够提升站域土地利用强度、聚集商业办公功能、疏散中心城居住人口，但是，只有在相关政策条件的配合下，土地利用的变化才会发生；密度、可达性要素对客流大小影响较大，尤其是就业密度和公交接驳对客流影响大；混合度要素对客流影响较小，但能平衡客流的时空分布；在两者的协同方面，国外学者在 TOD 理论、节点—场所模型、轨道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协同评价等方面做出探索。国外在定量实证研究、互动模型研究、相关规划思想和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我国今后应加强基于已建城轨的定量实证研究、基于个人交通行为和客流时变特征的微观研究、基于亚洲高密度城市的协同规划和协同评价研究。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站域；土地利用；互动关系

引文格式：王亚洁. 国外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11-118. DOI: 10.22217/upi.2017.081.

在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背景下，我国许多城市以空前的高速度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暴露出诸多问题：土地开发滞后于城轨建设，站点周边用地功能单一，站点缺乏与城市空间衔接，交通接驳不便等等。对于投资大且影响深远的城市轨道交通，研究其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研究起源于 19 世纪的区位理论，经过 1960 年代对理论和模型的探讨，以及 1980 年代交通—土地利用一体化等概念的提出，多数学者认识到交通和土地利用之间的“源流关系”。1980 年后，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等思想被提出，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成为该领域热门话题，“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这一分支领域逐渐形成。

1 互动范围

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区域，本文简称为“站域”。相关英文表述有 Pedestrian Catchment Area (PCA)、Service Area、TOD Area 等。北美多采用半径 800 m 的圆形区域表示站域，亚洲多采用 500 m 半径，也有学者使用泰森多边形或者综合法划定站域范围。

2 互动机理

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分解来看，互动关系包含四个要素、五个环节，如图 1，箭头表示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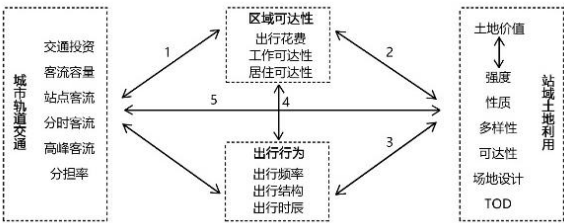


图 1 城市轨道交通和站域土地利用互动机理

3 城轨影响站域土地利用

大部分研究认为城轨能够提高站域土地价值，溢价水平的影响因素有三：第一，站点服务水平，如发车频率、网络连接性、覆盖率。当站域有一个步行导向的环境时，站点对地产价值有较大影响。第二，地产类型影响溢价水平。在 400 m 以内，商业地产比住宅地产溢价高，公寓比独栋住宅溢价高。第三，人口特征影响溢价水平，低收入地区城轨对站域土地价值影响更大。

城轨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的影响更为复杂，其不同城市、城市内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规律不同。多数学者观点为：在合适的土地利用政策、公共支持以及强大的地区增长动力下，城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才会发生。城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常源于城轨对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提升站域土地利用强度，集聚商业办公功能，疏散中心城居住人口。

4 站域土地利用影响城市轨道交通

高密度土地利用模式能够提升公交乘坐率，降低汽车拥有率和车辆行驶里程，是激发城轨客流的关键因素。用地混合度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大小

的影响仍不明确，但其可以减少机动车出行，增加非机动车出行，并平衡一天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交通需求，减小高峰和非高峰时段的客流差距。

可达性被认为是影响城轨客流的重要因素，包括步行可达性，交通接驳，内部换乘三方面。研究表明，随着站点距离的增加，每个人口和就业岗位产生的客流量下降。对部分中国城市，自行车的停车换乘是个重要影响因素，但站点周围难以配备足够的停车设施；对于部分亚洲城市，相比于高密度，城轨与公交的衔接更能提升城轨客流。

5 城市轨道交通与站域土地利用的协同

城市轨道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协同是可持续交通的基础，许多学者开展了协同规划理论、规划模型、规划实施方面的研究。比如“步行口袋”(PP)、“公交导向开发”(TOD)、“传统邻里街区开发”(TND)、“联合开发”(TJD)、“交通需求管理”(TDM)等。

在协同评价方面，欧洲学者贝托里尼(Bertolini)提出节点场所模型。通过对比站点节点和场所功能，将站点分为五种情形。也有学者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和模糊网络评价法评估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同关系。

6 研究小结及展望

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积累了许多经验。第一，由于数据、资料翔实，研究方法成熟，国外普遍重视定量研究；我国若干城市已进入城轨快速建设时期，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应加快相关规律的定量研究。第二，提出了TOD、TOD3D、节点场所模型等相关理论或思想，总结并应用了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我国应加强本土化理论研究，提出针对高密度集中模式下的协同策略。第三，重视微观化、精细化的研究，如土地利用对居民交通选择的影响，土地利用对客流时变特征的影响等，而国内还较少涉足。第四，重视政策、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关注公共支持政策、交通外部成本、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国内可在如下方向进行突破：

- (1) 互动区域的定义和界定；
- (2) 土地利用强度、混合度、可达性与客流定量关系研究；
- (3) 针对个人交通行为特征、客流时变特征的研究；
- (4) 城市轨道交通—站域土地利用协同规划研究；
- (5) 协同度定义以及评价方法研究。

多中心与单中心区域内城市的交通供给效率——基于等时间交通圈的对比研究及规划政策刍议 唐婧娴

摘要：面对当前人口密度过高、设施供给不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走向多中心的区域空间政策受到规划实践的青睐，但目前对于多中心的空间绩效评估尚属不足，规划政策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本文探索了利用 Google Distance Matrix API 和 Baidu Distance Matrix API 平台的等时间交通圈测度方法，来检验多中心与单中心大都市区域内，单个城市区域的交通供给效率。研究样本选择莱茵鲁尔区内的多特蒙德市、德国首都柏林、我国首都北京为对比对象。研究发现，同等时间内多中心结构内城市的机动车交通圈范围远大于单中心结构内城市，且拥堵程度明显偏低，具有较高的交通供给能力，但公共交通呈现了不同的结果，文章试从供给—需求的角度解释供给绩效的差异。最后，文章对我国大都市区交通供给水平提升和空间结构优化提出建议。

关键词：交通绩效；时空圈；莱茵鲁尔；大都市区；空间规划；多中心

引文格式：唐婧娴. 多中心与单中心区域内城市的交通供给效率——基于等时间交通圈的对比研究及规划政策刍议[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19-127. DOI: 10.22217/upi.2017.160.

我国城市群地区以全国 20%的土地集聚了全国 70%左右的城镇人口。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规划建设在“数量”上基本达标，但在人居环境的质量提升方面却负债累累。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地区，普遍面临着中心过度密集导致的“大城市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多中心结构——这一“均衡”的代名词在规划实践中备受青睐，用于应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大城市自身难以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尽管“多中心空间结构”政策在实践领域被频繁使用，但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多中心结构与单中心结构的绩效差异缺乏充足的讨论。本文着眼于交通供给能力的评价，选择德国莱茵鲁尔区作为多中心大都市区的代表，以柏林—勃兰登堡单中心大都市区和我国北京单中心大都市区进行比较，提供了一种评价思路。

传统的交通圈的测定方法常以建模模拟的方式展开，借助交通模拟软件构建 OD 矩阵，建立不同出行方式的交通模型，进而测度城市的交通圈。本研究中，并未采取模拟交通时速建模的方法，而是借助新出现的导航地图开发平台，利用真实环境中的历史出行数据来获得研究范围内特定时段的出行时间。即，应用 Google Maps Distance Matrix API 和百度 API 提供的距离矩阵服务，快捷获取机动车、公共交通出行的时间。相比于传统交通建模，利用导航地图开发平台的测度方法更符合大众出行的行为逻辑。当前导航地图已经深入大众生活，应用十分广泛，位置和路线检索成为公众出行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出行决策，所以这种方法更加准确和可靠。

莱茵鲁尔多中心大都市区内城市无拥堵时段交通圈范围为 9 161 km²，半小时内可抵达四周临近城市；柏林机动车无拥堵时段出行范围约为多特蒙德的 62%，半小时内可抵达城市内部的大部分地区，一小时内可抵达柏林—勃兰登堡都市区内往来通

勤频繁的周边城市。无拥堵时段，两城市等时间交通圈范围均大于北京，其中柏林为北京的 1.66 倍。多特蒙德无拥堵与高峰时段交通圈面积比值为 1.005，柏林为 1.002，拥堵时间成本低。从这一比值来看，凭借德国高通达性、多节点、高服务水平的路网建设，德国大都市区当前的交通供给能够满足城市无拥堵时段与高峰时期的通行需求。而北京无拥堵与高峰时段的交通圈面积比约为 6.71，拥堵成本高，反映了北京交通供需的矛盾十分突出，道路网建设难以满足高密度人口集聚形成的通行需求。

公共交通结果与机动车略有不同。多特蒙德公交 1 小时交通圈范围为 523 km²，柏林达 1 087 km²，后者是北京的 2.64 倍。3 小时出行范围，柏林接近 20 000 km²，是多特蒙德的 2.1 倍，北京的 3.7 倍。柏林作为德国首都，又是德国东北部唯一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城市，加之东西德国合并后团结税的引入，使首善之地柏林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莱茵鲁尔大都市区内公共交通发展仍受制于碎片化地方政治格局的影响，区域治理机构内的各城市主体难以在财政税收、政治目标、空间发展战略上达成一致，公共交通建设的进展相对缓慢。根据统计，莱茵鲁尔区的公共交通仅占工作出行的 18%，比欧洲同等城市区域的一般水平要低——柏林公交出行占有率约 30%，西班牙马德里、葡萄牙里斯本、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公交出行占有率达 35%（面积小于莱茵鲁尔）。

相比之下，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的规模相对均衡，内部从中心到边缘的道路供给差异小，发生拥堵概率降低，道路网络设施的便利性可以被临近城市捕获。由于相邻城市的路网相互衔接，路网密度和交通节点数量从中心向外尚未显露出明显的衰减时，即进入另外一个城市的建设区域，从而保持了持续均质的路网密度。

城市制度影响下的香港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研究

胡依然 张凯莉 周曦

摘要：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对贯穿于香港中区的高架步行系统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这个高效有序的三维网络并非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行为，而是由非正式制约主导，始于碎片化的、自发的市场行为。

同时，将中区步行系统按照 1963—2003 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探讨在政府与私人企业双重制约下的中区高架步行系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以及在私人企业掌握主导权的阶段又产生了哪些问题。最后，以沙田新区的案例和中区近 10 年的规划进展阐明，在区域设计的尺度上不能缺少自上而下的正式制约，政府应当明确并承担城市管理的职责，从而有效保障公众的利益。

关键词：香港；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私人；正式制约；非正式制约；沙田

引文格式：胡依然, 张凯莉, 周曦. 城市制度影响下的香港中区高架步行系统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28-135. DOI: 10.22217/upi.2015.592.

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机制研究——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

万成伟

摘要：基于台湾社区发展历程与经验认识，提出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从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环境活力等“三股分力”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分析了内在活力营造经验，并总结对大陆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的启示。

关键词：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可持续发展；台湾龙眼林社区

引文格式：万成伟. 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营造机制研究——以台湾龙眼林社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36-142. DOI: 10.22217/upi.2016.301.

文章对快速城镇化发展成就下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衰落景象进行反思，提出农村可持续发展需要系统培育社区内在活力。在分析台湾光复后数十年来农村社区营造经验基础上，总结出农村社区内在活力的概念框架与特征。随后以龙眼林社区营造为例，本文对农村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机制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总结了其对大陆农村社区营造的启示。

内在活力是指由农村社区中产业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空间三者共同作用形成的不断支撑、推动社区发展的“合力”，其有如下内涵：（1）内在活力是社区生产、生活活动的总和，构成农村社区发展的基础并提供发展动力来源，是社区生命力的体现；（2）内在活力是农村社区社会活动的衡量维度，能反映出社区发展是否健康有序；（3）内在活力是由社区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物质空间活力“三股分力”共同组成，是一股由三者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集成性的合力，三者缺一不可。产业经济为社会文化和物质空间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物质空间是社会文化和产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而社会文化是产业经济和物质空间的内涵所在，三

者相互支撑，共为一体。

龙眼林社区位于台湾南投县中寮乡，距南投市约 10 km，面积约 2 700 hm²，核心聚落约 740 人。龙眼林社区因香蕉、太白粉等传统农业兴盛于日治时期；1945 年台湾光复后城市成为发展中心，社区传统产业遭受重创，由繁荣小镇变成衰败萎缩的没落之地。直到 1999 年发生集集大地震，震中的龙眼林社区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扶下开展社区营造，由此迎来发展复兴期。

龙眼林社区内在活力营造措施如下：

（1）产业经济活力营造方面，立足荔枝、乌梅、龙眼等地方农业，发展多元经济；并且注重编制产业经济谋划，积极建构“社区支持农业体系”（CSA）。

（2）社会文化活力营造方面，注重地方组织培育，倡导自下而上合作参与；建立健全社区福利机制，注重人才培养；并且立足传统文化，发展社区新文化，培养社区共同体精神。

（3）物质空间活力方面，完善基础建设，注重生态防护；活化废弃空间，倡导低碳节能；开展“美化”活动，提升环境品质。

龙眼林社区营造过程强调产业经济活力、社会

文化活力、物质空间活力的同步协调发展，注重整体性的内在活力培育发展。产业经济活力上，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形成以特色农业与旅游业同步发展的多元经济；社会文化活力上，由乡贤精英牵头培育地方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参与机制，既注重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与福利保障，又注重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新文化的吸收；物质空间活力上，强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防护工程建设先行，注重社区美化，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废弃空间

的整合利用。

龙眼林对大陆农村社区营造的启示有：（1）农村社区营造要善于抓住重大事件与机遇，活用内外部资源助力农村社区发展；（2）活力营造应坚持规划为先，注重统筹产业经济活力、社会文化活力与物质空间活力；（3）善于挖掘地方特色，积极发展多元业态，为社区产业经济活力发展找到动力；（4）主动寻求多方协作，倡导共同参与，为社区社会文化活力发展提供保障；（5）加强基础设施，保育生态环境，为社区物质空间活力发展奠定基础。

如何规划出世界宜居城市？《为澳大利亚做规划》评介

朱巍 周江评

导读：《为澳大利亚做规划（第二版）》（*Planning Australia, 2nd edition*）这本澳大利亚城乡规划专业人员普遍阅读和参考的书籍，非常值得推荐，理由有三：一是它的全面性，虽然该书针对澳大利亚的问题，仍深入系统、带有国际视野地思考了城乡规划的起源、发展、本质、现状和可能的未来；二是它的实践性，该书汇集了澳大利亚城乡规划专业的各路高手，对城乡规划的方方面面做了合理的切分与撰写；三是它的国际性，该书的作者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展示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城乡规划的观念和认识。除了推介，本文对该书的各个章节（共17章）的内容作了概述。

引文格式：朱巍，周江评. 如何规划出世界宜居城市？《为澳大利亚做规划》评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1): 143-145. DOI: 10.22217/upi.2015.560.

地理上，澳大利亚是一个偏居地球一隅的国家。历史上，它曾经是大英帝国重刑犯的流放之地。时过境迁，今日的澳大利亚，不但是被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还打造出了墨尔本、悉尼、珀斯等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美世（Mercer）等权威机构评选出的世界最宜居城市。

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城市建设究竟有什么经验和教训？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不但能帮助人们对澳大利亚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合理的框架，去思考自己所关心的国家发展、城市建设问题。《为澳大利亚做规划》（*Planning Australia, 2nd edition*）就是这样一本回答前述问题的书籍。抛去各章各节的

细节，从大的方面讲，这本书值得推荐，理由有三：一是全面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国际性。关于全面性和国际性，这本书虽然是针对澳大利亚的规划问题的，但是它全面系统，带有国际视野地思考了城乡规划的起源、发展、本质、现状和可能的未来。因此，关于实践性，这本书是“众筹”的书，各个章节是由在澳大利亚各个规划院校的一线、资深的科研人员共同写作完成的。参与“众筹”的作者，通常不但自己在一个城乡规划的子方向，如土地利用上有专攻，对澳大利亚的城乡规划或管理的方方面面也有所接触。因此，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和思考澳大利亚城乡规划，并从中挖掘出一般性的对一国、一地的城乡规划的思考，是有所裨益的。

2018年第2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开发区发展与规划

王缉慈, 朱凯 /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托马斯·法罗尔, 著; 许俊萍, 译 / 开发区和工业化: 历史、近期发展和未来挑战

王兴平, 崔功豪, 高舒欣/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互动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

柏露露, 谢亚, 管驰明 / 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

沈正平, 简晓彬, 赵洁 /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模式研究

徐嘉勃, 乔基姆·迪特尔, 王兴平 / 从共建型园区视角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保罗·科利尔, 迈克尔·布莱克, 特沃德罗斯·加布雷沃尔德, 普里亚·曼纳林, 著; 徐嘉勃, 译 / 超越关税和基础设施: 营商便利度对促进非洲经济特区成功的重要性

城乡研究

黄晶, 帕特里克·康登 / 扁平城市:

数字通信技术进步背景下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迎成 / 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差异及思考

杨炼, 于涛方 / 国外大城市地区企业区位模型研究综述

彭伊依, 周素红 /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分析
——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

郭旭, 严雅琦, 田莉 / 法团主义视角下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规划研究

叶裕民, 田若敏, 王晨跃 / 俄勒冈城市增长边界简化方法探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肖希, 韦怡凯, 李敏 / 日本城市绿视率计量方法与评价应用

实践综述

刘晓逸, 运迎霞, 任利剑 / 2010年以来英国城市更新政策革新与实践

王祝根, 昆廷·史蒂文森, 李晓蕾 / 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30年发展历程解读

黄欣茹, 宋彦, 陈燕萍 / 利用绿色街道推进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美国绿色街道建设的经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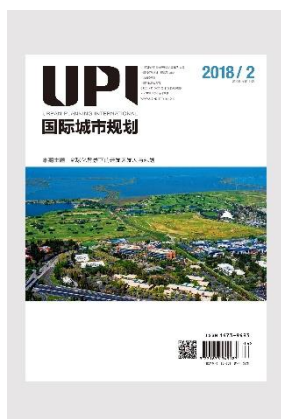
陈林, 刘云刚 / 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经验及其借鉴

书评

周江评, 韩涛 /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探索与经验——评《向成都学习: 中国的城乡发展统筹》

专题研究

洪孟良, 亢德芝, 柳应飞, 成伟 /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改善城市公共空间”试点项目
——汉口租界区二曜路公共空间“Block by Block”实践



2018年 第2期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王缉慈 朱凯

摘要：针对产业园区这一研究对象，本文首先将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两大类，并分别做了细分，继而梳理相关政策演变脉络及其对应的主要相关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创新集群理论、工业生态系统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然后基于产业园区的国外理论背景和中国发展经验，对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园区升级前景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产业园区；理论脉络；发展实践

引文格式：王缉慈，朱凯. 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7. DOI: 10.22217/upi.2017.600.

伴随历次国际产业转移及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建构，产业园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受到多国决策者的青睐，文章将其置于全球竞争背景下，力图从错综复杂的产业园区现象中找到其发展途径的规律性分析构架，主要阐述三方面的内容：一，产业园区的类型及其发展背景；二，产业园区政策的理论溯源；三，国外产业园区相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产业区域开发政策，建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园区，且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各自所设立产业园区的种类和名称也不同，但整体上，产业园区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关注单一的短期性经济增长目标的传统产业园区，另一类是关注多元的长期性综合发展目标的现代产业园区。前者不仅在出现时间上早于后者，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产业园区这一政策工具的初始阶段基本上都会选择；其以发展制造业为主，强调加工制造环节，主要有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和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园两个子类。后者则在前者加工制造环节基础上延伸或增加了新的环节，且不同环节之间的组织方式和功能表现等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可细分为科技园、生态产业园、创新区等子类，其发展与成型面临冷战后期的经济复苏、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科技创新软硬实力的全球性竞争等发展形势，具有较为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可谓是引领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型方向的旗舰地带。

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发展背景、所能供给条件的实践基础，不同类型产业园区的概念之成型，得益于在各国不同发展阶段兴起的区域及产业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之于出口加工区，可持续

发展理论之于生态产业园区，创新集群理论之于科技园区，创业生态系统之于创新区等。文章选择性地阐述了影响产业园区发展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一方面较为清晰地解释了不同产业园区的发展原理；另一方面也为产业园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推广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思路，有助于把握今后国际产业园区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就现阶段产业园区关联理论及产业园区实践的发展进程而言，二者亦都有着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前者表现为不同理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尚未建立，因此需要在跟进指导或启示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发展实践的同时，逐步建立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的体系。后者则因其内涵的时空变迁而表现出两大走向：其一是传统产业园区被赋予新的内涵，使得传统与现代产业园区及其内部子类之间的界线在具体实践中趋于模糊；其二是新理念、新技术、新媒介、新要素以及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创新都在改变着以往的产业园区内涵，乃至孕育着新的产业园区类型。

我国数不清的多种多样的产业园区从国家到地方的经济发展、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下，在沿海发达省份，原有的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产业园区正在从依赖外资走向内外资并重或以内资为主，从依靠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走向自主创新，从单纯加工制造走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从污染严重走到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各种当代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加速器和孵化器创客空间涌现出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育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国外创新和创业者进入园区。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类似上述传统

产业园区类型的大量园区已经向科技园、生态工业园和创新区过渡；原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正在迅速培育着创新集群，注重产学研合作和企业网络构建的制度创新。在部分欠发达省份，新的产业园区还在兴建，但应当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并确

认其目标是现实的，避免将园区定位在尚不具备基础设施的极度落后或偏远的地区。这种新园区在设立之初，可能不得不从传统类型的园区开始发展，但需要有明确的长期愿景，而不能功利主义地将增加经济收益作为唯一的短期目标。

开发区和工业化：历史、近期发展和未来挑战

托马斯·法罗尔 著 许俊萍 译

摘要：过去 50 年，开发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比较了开发区的不同定义、发展目标以及建设模式，并讨论了不同国家利用开发区作为政策工具的方式。文章同时回顾了开发区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的演变历史，并指出现代贸易和科技的变化将对传统开发区模式的有效性造成巨大冲击。文章最后提出了开发区目前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包括开发区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开发区与国内产业链的融合，开发区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以及开发区与城市的融合。

关键词：开发区；工业化；全球化；产城融合

引文格式：托马斯·法罗尔. 开发区和工业化：历史、近期发展和未来挑战[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8-15. DOI: 10.22217/upi.2018.016.

开发区支持部分地区接触全球市场，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从建立第一个现代化的开发区（SEZs）迄今已经超过 50 年时间，很多国家对这个激励经济转型的政策工具充满了信心。在一些国家，这种经济模式引人注目。这包括东亚的“虎体经济”（tiger economies）【类似日本模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以及中国，用开发区作为平台来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在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国利用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进入美国市场，并且在以往依赖农产品的经济体状况下产生了大规模的制造业部门。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开发区在加速出口多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埃及、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尽管许多开发区在创造出口和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一些国家与开发区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变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更糟糕的是，在一些国家，这些开发区没能吸引到投资者，成为“昂贵而无用的东西”，造成财政和政治的双重损失。传统开发区方案的成功部分归功于 1970 年代以来出现的贸易和投资全

球化的空前发展时代，并在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前 10 年加速，这是由制造业的垂直化和空间碎片化引起的。然而，随着我们进入全球技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种传统的静态工业化模式正日益受到限制。本文回顾了开发区的简短历史并且讨论了当今贸易和技术的变化可能预示着传统区划模式有效性的终结。本文认为应当采取更为综合的方法来建立开发区，并适当地考虑其固有空间产业政策的作用。同时，应当着眼于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本文提出了一种更综合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方法。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试图用开发区来刺激对周边地区的投资，但大部分的开发区投资仍集中在城市周围。大城市的开发区通常是在城市边缘地区，那里的土地便宜，还可以大片集聚起来，并且能连接到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门户，从而达到最高的效率。但是，全球大部分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土地供应的不足给开发区与城市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需要开发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或许如何有效地在分散的“网络”模式中建设开发区，值得考虑。

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互动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

王兴平 崔功豪 高舒欣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相关性，厘清全球化作用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发区规划体系的创新。进而展望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开发区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开发区的发展与全球化关系密切，反映开发区全球化的外向型经济指标与开发区的总体发展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中国开发区发展与全球化之间存在三大互动机制与效应；与一般的城市规划比较，开发区规划在适应全球化的需要、面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诉求上进行了多方面创新。面对新一轮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开发区模式和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具有外向输出的客观条件和内在优势，将成为驱动全球新一轮工业化的新平台。

关键词：开发区；全球化；经济发展；城乡规划

引文格式：王兴平，崔功豪，高舒欣. 全球化与中国开发区发展的互动特征及内在机制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6-22, 32. DOI: 10.22217/upi.2017.601.

以开发区为载体推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就。中国特色开发区模式的巨大成功，既有内力的因素，也离不开外力的驱动作用，如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因素。其中，全球化是中国开发区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在驱动力。开发区规划在塑造“全球化空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并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支撑。

本研究选用 2002—2016 年国家级经开区的生产总值与实际使用外资额等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选用 1995—2015 年国家级高新区的收入数据与出口创汇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也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研究同时发现，国家级经开区的 FID 每增加一亿美元，大致每年带来 142.408 亿元的收入，国家级高新区出口创汇的增长可带来营业总收入、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见，无论是国家级经开区还是高新区，反映其全球化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指标与其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此外，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方法，本文分别计算了各探测因子对国家经开区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发现 2002—2013 年全国经开区的实际利用外资等全球化、外向型指标对经开区 GDP 表现出较高的决定力。研究进一步发现，外资及其带动的外贸增长在国家级经开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具有阶段性作用，分别是开发区主动融入和与全球

化建立链接的阶段、外贸开发区驱动开发区发展的阶段、外资及外贸双轮驱动阶段等。

研究发现，出口创汇对国家级高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状态同样具有标识性作用。研究选取国家级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个案研究，发现与前文对国家级经开区整体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总体而言，全球化与开发区的互动机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作用和效应，包括政策激励机制、要素纽带机制以及比较优势形成的集聚机制。在政策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发挥了重要的“撬杠”作用，打开了中国与全球化隔离的“闸门”，形成了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对接的“窗口”并逐步扩展，而世贸组织及其相关规制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提供了平台和保障。在要素方面，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带动了资本和商品在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市场之间形成了循环并不断强化，是中国开发区与全球化互动的重要内容。在集聚机制方面，则是相关政策和中國本土生产要素综合形成的低成本、高效率和宽管制优势带动形成的聚流效应。

与开发区的创建同步，中国的开发区规划实践也开始推进，在规划系统、空间规划、支撑系统、规划实施管理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且能够适应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规划体系。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全球投资和人才，开发区规划均比较重视对接国际最前沿的规划建设理念，建设符合国际化水准和需求的综合营商环境。同时面对国际投资的需

要，规划高效率、符合国际惯例的生产服务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生活配套服务体系，比如规划建设国际社区、国际学校、教堂等，满足国际人才的生活需求等等。

面向未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中国

开发区作为重塑全球新型工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必将发挥引领全球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中国开发区规划体系也具有“走出去”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

柏露露 谢亚 管驰明

摘要：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是中外产业合作、规划技术融合的空间载体和重要平台。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其发展现状、核心特征与类型特征，从基本概况与产业发展、规划特征、合作与管理三方面具体介绍了三类园区的典型案列，并总结了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的规划特征及借鉴意义，最后揭示了其发展问题，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境内合作园区健康稳定发展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开发区；中外合作园区；园区规划

引文格式：柏露露，谢亚，管驰明. 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23-32. DOI: 10.22217/upi.2017.602.

境内国际合作园区指在一国国境内，借鉴他国规划技术经验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府或企业合作开发、园区内对合作国企业和跨国贸易实行特殊优惠政策、提供具有国际化特色、满足国际标准的配套和服务体系的国际合作产业园区。笔者通过多渠道（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中国大陆内国际合作园区共计 70 余个，其中较为规范的国省级合作园区 52 个。52 个国省级境内合作园区分布于 12 个省/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共涉及 18 个合作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

中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早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吸引外资和跨国企业入驻，以拉动外向型经济增长。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和国际产业合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境内国际合作园区从规划伊始便注重国际合作，以国际先进园区建设标准和国际生态园区环境控制指标体系引导园区规划建设，以先进的发展模式指引园区发展，成为对接国际规则、实现产能合作、提升供给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和空间载体，和具有一定规模、特色鲜明的新型产业空间。文章通过对中国大陆内国际合作园区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其发展现状及核心特征，介绍典型规划案列，总结其规划特征与发展问题，

提出发展策略建议，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提供新思路，为我国产业园区升级提供新视角。

基于对境内国际合作园与传统开发区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境内国际合作园区存在以下几点核心特征：（1）开发主体具有二元国家属性；（2）合作组织框架灵活化；（3）建设目标具有双向性；（4）产业发展国际化、创新化、融合化；（5）运营管理模式市场化。根据园区定位的不同，境内国际园区可分为工业园区、生态新城、商贸物流园、综合新城四种类型。传统开发区正经历“第四代园区”的转型升级，境内国际合作园区规划先行的开发理念，融合化、协调化、特色化的规划理念，定制化、刚柔并济的创新规划标准和因地制宜的规划方法，市场化、扁平化的规划管理模式和经验，都对传统开发区规划升级有较高借鉴价值。

然而，中国经济合作园区发展仍处于探索期，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具体表现为受双边政治关系影响大、主导产业趋同、部分园区盲目跟风炒作等。为了引导我国境内国际合作园区稳定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发展建议：（1）宏观引导，合理布局；（2）杜绝跟风，理性定位；（3）内外兼修，多元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模式研究

沈正平 简晓彬 赵洁

摘要：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我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基于产业园区理论与“走出去”战略实践的有机结合，阐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的概念及内涵，从园区类型及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概述“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状况。通过对农业园区、加工园区、服务业园区、综合性产业园区等四类产业园区的案例分析，论述我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的背景意义、总体目标、产业定位、主导企业、运营模式及综合效应；同时，通过与国内代表性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模式的比较分析，提出全面加强双边政府沟通、深化完善园区合作机制、科学制定园区产业规划、聚力推动园区配套建设、大力培育引进国际化人才等对策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模式

引文格式：沈正平，简晓彬，赵洁．“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模式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8(2): 33-40. DOI: 10.22217/upi.2017.607.

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合作产业园区，是我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贸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至2016年底，我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初具规模的境外合作产业园区56家，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深化。但在境外合作园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政策及法律法规风险、合作机制不健全、产业特色不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其建设模式及特点，剖析存在的问题及障碍，推动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简称境外园区），是由中外两国政府推动，国内企业主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产业特色鲜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各类经贸合作区的统称。在我国政府特别是商务部的大力推动下，目前我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23家国家级境外园区，主要涉及农业、矿业、机械、轻纺、节能环保、信息处理、生物制药、商贸物流等产业领域，主导企业几乎都是我国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技术设施完备的大型企业，园区分布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亚、东欧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按照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综合性产业四种产业类型，本文从我国商务部批准的23个国家级境外园区中分别遴选出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

作区、中俄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进行案例分析。

从建设背景及重要意义看，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建设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境外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从总体目标及产业定位看，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重在通过规模化开发油棕资源，建设成为以油棕种植开发、精深加工、收购、仓储物流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园区；中俄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重点发展轻工、机电、木业等产业；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着力打造以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和高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的国际化商贸物流园区；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重点发展以装备制造、通信产品为主的高端制造以及商贸物流等产业。

从主导企业及运营模式看，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的主导企业为天津聚龙嘉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采用“合作种植、全产业链构建、基础设施配套、特色管理”的综合运营模式；中俄乌苏里斯克经济贸易合作区的主导企业为康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主要采用“跨境连锁加工”和“就地生产销售”两种运营方式；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的主导企业为山东帝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主要

按照“一区多园、两地展销、双向代理、内外联动”的模式运作；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的主导企业为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主要通过和尼日利亚拉各斯州政府、尼日利亚莱基全球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莱基自贸区开发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

从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看，四类境外园区在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改善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看，境外园区建设模式的基本特点为：中外政府友好合作及政策支持是境外园区顺利建设与发展的先决条件；有实力主导企业及合理运营模式是境外园区有效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规划及精准产业定位是境外园区有序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指引；良好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是境外园区持续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境外园区和国内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在建设模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建设理念不同。通过引进外资建立的国内园区重在学习国外先进园区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经验；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的境外园区则重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我国企业“走出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不同。国内园区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吸引中外企业入驻和发展；而境外园区特别需要中外双方政府的友好交流合作，以降低国际产能合作和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三是资本合作方式不同。国内园区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多种投资合作方式；而境外园区主要采用中外合资形式，且大多以中方企业为投资主体；四是盈利模式不同。国内园区建设大多采用土地开发费用和财税捆绑而形成的资金大循环模式，因而资金保障程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而境外园区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造成运营主体资金缺口较大、盈利能力偏弱等困难。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复杂，可能给境外园区建设与发展带来诸多

障碍。一是政策及法律法规风险可能长期存在。如东道国承诺的优惠政策能否到位？提供的便利条件能否兑现？领导人更替导致政策变动等等。二是合作机制不健全加大投资风险。由于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可能加大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三是产业特色不突出阻碍持续健康发展。园区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方向不合理，产业关联度不强，势必影响境外园区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影响招商引资。园区交通、电力供应、供水排水、环保等设施配套较差，不利于园区招商引资计划的有效实施。五是国际化人才缺乏制约核心竞争力提升。境外园区主要分布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普遍不足。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推动境外园区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全面加强双边政府沟通。在中外双方政府齐心协力推动下，进一步落实两国双边投资协定，特别是明确政策优惠、信息共享、投资争端、风险防范等相关条款，最大限度避免和降低东道国法律政策变动的风险。二是深化完善园区合作机制。不断加强政府间双边交流协作以及和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合作，建立由双方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商会等组成的境外园区领导、规划、协调机构，统筹推动园区建设与发展。三是科学制定园区产业规划。坚持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为导向，把我国企业的优势与东道国及所在地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基础设施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国情和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园区规划及产业定位。四是加快推进园区配套建设。充分利用我国对外援助的有利条件，加强对境外园区所在区域的道路、电力、通讯、燃气管道、给排水等基础设施进行援助建设。五是大力培育引进国际化人才。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努力造就一批懂技术、会外语、能交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队伍。

从共建型园区视角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徐嘉勃 乔基姆·迪特尔 王兴平

摘要：得益于全球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和亚洲特别是中国产业园区模式成功的激励，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

始重新审视产业园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园区建设作为带动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抓手。在这其中，埃塞俄比亚可谓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产业园区不仅带动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对改善国家整体投资环境，促进经济整体提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产能合作的示范国家，中国园区模式在埃塞俄比亚的成功离不开双方在国家与园区两个层面的积极合作，即国家政策的互动衔接、园区规划体系的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和管理经验的交流合作。这一成功典范，对于中国后续在埃塞及其他非洲国家开展共建园区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产业园区；产业政策；园区规划；投资环境；埃塞俄比亚

引文格式：徐嘉勃，乔基姆·迪特尔，王兴平. 从共建型园区视角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影响[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41-47. DOI: 10.22217/upi.2017.605.

埃塞俄比亚与卢旺达近来被大量学者认为是非洲两个最有可能实现快速复兴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从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革阵”(EPRDF)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中可以看到大量“向东看”的元素，即向亚洲国家学习。产业园区这一发展模式便是埃塞俄比亚向中国学习的直接成果，并毫无疑问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工业化发展最重要、最直接的载体。

另一方面，自商务部 2006 年认定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来，境外产业园区已成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产业园区已成为众多非洲国家眼中“中国发展模式”的一块金字招牌。首批境外经贸区有 6 个位于非洲(除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外，另有埃及、赞比亚、毛里求斯各 1 个，尼日利亚 2 个)，尽管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园区规模相比，4 km² 的东方工业园显得相当“迷你”，然而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大却遥遥领先，不仅自身被列入埃塞重要的发展减贫计划，还推动了埃塞俄比亚全国产业园区体系的形成，并直接参与了埃塞园区发展法案的制定。

对于这个制造业占 GDP 比重长期维持在 4% 左右的国家而言，其国家发展战略——增长与转型计划中提出的“2015 年成为非洲制造业中心”目标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但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用强大的

执行力快速接近这一目标：在中国企业的鼎力相助下(全面参与多个园区的设计、建设甚至运营)，计划中的国有园区很快将全部建成；而在计划之外，华坚国际产业园、湖南—阿达玛产业园、中材 Arerti 产业园等中国企业投资的私营园区对埃塞国有园区形成了补充。

尽管埃塞俄比亚一贯稳定的政治环境近年来因为民族间利益分配不均受到负面影响，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也在持续对执政党形成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的严峻的形势之下，2017 年，国家园区体系中距离吉布提港口距离最近的一个园区——德雷达瓦(Dire Dawa)产业园(中土集团承建)仍然在短短数月之内依托亚吉铁路的德雷达瓦站拔地而起。埃塞俄比亚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决心以及中埃两国在产业园区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进程并未因接连而来的全国紧急状态受到明显的阻碍。

本文意在对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在产业园区领域这种如火如荼的合作“盛况”从国家与园区两个层面、硬件与软件两个领域进行解读，以期为中国后续在埃塞及其他非洲国家开展共建园区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超越关税和基础设施：营商便利度对促进非洲经济特区成功的重要性

保罗·科利尔 迈克尔·布莱克 特沃德罗斯·加布雷沃尔德 普里亚·曼纳林 著 徐嘉勃 译

摘要：为了促进制造业发展并减少对初级商品的依赖，许多非洲国家正在试图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这些经济特区能够通过集聚企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促进出口进而提高生产率。但经济特区能否成功取决于

地方政府是否能构建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传统的政策大多针对基础设施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然而，有一些更加低成本且易操作的改革政策能够通过营商便利化对经济特区的成功产生巨大的影响。没有上述政策，经济特区最终将沦为一个昂贵的“负担”。本文旨在说明贸易便利化政策在促进非洲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特区；产业园区；工业化；营商便利度；贸易便利化

引文格式：保罗·科利尔，迈克尔·布莱克，特沃德罗斯·加布雷沃尔德，普里亚·曼纳林. 超越关税和基础设施：营商便利度对促进非洲经济特区成功的重要性[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48-52. DOI: 10.22217/upi.2017.606.

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在非洲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1970 年代，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自贸区（Free Trade Zone）等多种形式的“第一代”经济特区就开始在非洲出现。然而，绝大多数“第一代”非洲经济特区呈现的发展路径与创造了众多“发展奇迹”的亚洲经济特区大相径庭，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微乎其微。

众多学者对非洲经济特区失败的原因进行过探讨，提出了针对硬件提升（如基础设施改善）和软件优化（如各类优惠政策）的各类措施。本文肯定了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财政激励政策在促进经济特区成功方面所发挥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在此基础上另外一个更加低成本但至关重要的方面——营商便利度提升，特别是其中贸易便利措施的重要性。

在世界银行 2017 年度针对全球 190 个国家的“营商便利度排行”中，54 个非洲国家仅有 2 个位于前 50 名（分别为毛里求斯第 25 名，卢旺达第 41 名），另有 7 个位于 50~100 名之间，大量撒哈拉以

南非洲国家的营商便利度排名处在全球最低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论述了通过基础设施提升、财政激励两类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特区提升的一般路径，解析了提升营商便利度对于最大程度释放前两类政策红利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基于大量鲜活的案例，论证了非洲国家经济特区提升营商便利度的可行性及可能的方向，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本文作者所在的国际增长中心（IGC: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是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致力于用前沿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需求导向”的政策。基础设施提升与财政激励措施固然有效，但是对于财政收入微薄、高度依赖外来援助和贷款的非洲国家政府而言几乎是高不可及的成本，相比之下，以需求为导向，通过简化繁复冗杂的官僚程序推行机构改革，从而提升营商便利度则是一本万利的政策，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扁平城市：数字通信技术进步背景下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向及对中国的启示

黄晶 帕特里克·康登

摘要：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类型。既有经历了第一、二次城市浪潮而形成的成熟城市，也有正在发展的新兴城市。数字通信技术的进步影响了成熟城市与新兴城市的功能和形态，它们的发展暗示着一种新的城市趋向——“扁平城市”。扁平城市是在城市中任何区域能够获得经济与信息自由的城市，它避免长距离延伸基础设施，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城市组织方式由“职能中心”向“综合组团”转变、道路由“运输型”向“生活型”转变以及发展彼此关联、功能相互补充的小型城市中心将有助于中国城市的扁平化。扁平城市对土地与能源相对紧张的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成熟城市；新兴城市；扁平；数字化通信技术

引文格式：黄晶，帕特里克·康登. 扁平城市：数字通信技术进步背景下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向及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53-60. DOI: 10.22217/upi.2017.035.

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呈现出不同类型。有经历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技术发展浪潮的成熟城市，也有正在形成的新兴城市。

在机械能驱动的第一次城市发展浪潮中，工厂、有轨电车、家庭与地铁使用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于燃煤蒸汽，人们则利用电报和日报通信；20 世纪后半叶，在内燃机带来的第二次浪潮城市中，交通方式转化为机动车交通，电话和广播电视网络成为通信的主要形式。工作、居住等城市功能区之间的距离被拉长，大多数郊区是工作者睡觉的地方。长距离的驾驶引发了城市中交通设施的大量建设；1980 年代，伴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电话的出现，人们预言一个更为分散与高效的城市将会到来。但是，当时远程交换还停留在工作者的数据交换上，居住区的蔓延以及通勤距离的增长并没有减弱。

直到智能手机和家用电脑的普及，成熟城市慢慢开始成型。数字通信技术（DCT: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发展正在逐渐减少人们的通勤旅行。DCT 促使“远程工作”与“办公室工作”相互替代和补充。很多人开始在家工作。这样的现象刺激了对靠近住所的公共设施的需求，以及将城郊居住区变成一个更为完备的可工作、可居住场所的需求。近些年来，许多大城市渐渐摆脱了单中心结构，人们的日常通勤目的地也在更为广泛的城市区域中扩散。在 DCT 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工作。城市越来越需要处于家与办公室之间的工作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工作。这降低了能源的消耗以及对交通设施的需求。

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在很多城市中，非法定居点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涌现了出来。手机为这些连续增长的地区带来了新自由。DCT 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利用现代工具从事经济活动，它为小型企业创造了更高的自由度、更好的生存条件和更有效的支持。因此，这些新兴区域拥有数量众多、功能多样、规模微小的沿街商业以及一些小型工厂，并形成了狭窄的街道、紧凑的房子以

及有机的结构。

DCT 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去中心化趋向。无论在成熟城市还是新兴城市中，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技术变革影响着既有城市形态与结构。人们可以在城市中大部分场所通过移动设备彼此连接，“面对面”不再是维持全日制工作关系的必要条件。这样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出行量，并会引发城市空间离散的趋势，进一步产生城市的“去中心化浪潮”。

在 DCT 影响下，城市出现了一个新发展趋向——“扁平城市”。扁平城市是一种层级更少、交互更多的城市组织方式。在扁平城市中，网络连接部分代替了空间实体上的联系，消减了人们对城市地理“极点”的依赖，以及对昂贵的长距离延伸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原来集中于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与工作场所，被分散到城市中的不同区域，人们的大部分工作、娱乐和居住等需求能够在距离更短、结构更为紧凑的城市空间中解决。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出现了住宅的郊区化、职住分离、通勤距离与时间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大量建设等现象。在政府的倡导下，结合 DCT 与中国人工作、生活的关系，将互联网作为城市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能够为城市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城市扁平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开始由大幅外扩转向对已有城市建城区的修复与重构。为了实现向扁平城市的转变，“城市组织方式由‘职能中心’向‘综合组团’转变”、“城市道路由运输型向生活型转变”以及“发展彼此关联、功能相互补充的小型城市中心”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扁平城市能够加强城市功能的合理混合，鼓励人们就近解决工作与娱乐的需求，减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节约国家土地与能源等重要资源，是一种更为可持续和低碳的城市形式。扁平城市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差异及思考

李迎成

摘要：本文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了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城市网络研究进行了初步思考。通过对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西方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和区域尺度的城市网络，而国内研究则主要关注国家和区域尺度的城市网络。在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研究在城市联系类型选择和网络分析方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在区域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仍需要对西方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借鉴。在延续现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今后城市网络研究可以更加关注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的嵌套衔接、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机制的实证分析以及城市网络的外部经济分析等。

关键词：城市网络；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研究重点

引文格式：李迎成. 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差异及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61-67. DOI: 10.22217/upi.2015.477.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深入分析这些成果非本文篇幅所能及。因此，本文仅从研究尺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中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城市网络研究进行初步思考。

城市网络按其空间尺度的差异可以分为全球城市网络、国家城市网络和区域城市网络三个层面。尽管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研究的起源存在差异，但大致都经历了从属性到关系、从等级到网络的范式转变。从研究的侧重点看，西方学者较为关注全球层面的“世界城市网络”和区域层面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国内学者除了主要关注后者外，近年来也较多地关注了国家层面的“国家城市网络”。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西方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网络研究基本涉及两个方面，即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以及城市网络的构建和分析方法。其中，城市联系类型的选择主要包括公司组织路径、基础设施路径、人群活动路径、社会文化路径、创新联系路径和引力模型路径等六大路径；城市网络的构建和分析方法主要涉及连锁模型及其相关改进算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位序—规模法等三大方法。

中西方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城市网络的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的分析，如对世界城市网络区域性、等级性和复杂性的分析以及对区域城市网络功能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分析等；第二，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分析，如对城市在网络中的门户地位分析、对城市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节点性的分析等；第三，网络对城市

发展的影响分析，如分析多中心的区域城市网络结构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等。整体而言，在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研究在城市联系类型选择和网络分析方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在区域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仍需要对西方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借鉴。

在延续现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今后城市网络研究可以更加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网络的嵌套衔接。对城市网络从不同空间尺度的分析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补充单一空间尺度城市网络分析的不足。一方面，突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侧重于分析少数世界城市的限制，通过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一些处于国家或区域尺度的专业化城市（如高科技城市、制造业中心城市）也纳入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单一空间尺度的分析可能难以识别城市地位的全貌，从不同空间尺度审视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有利于在某一空间尺度、就某一项功能而言非常重要的城市。

第二，城市网络形成和演化机制的实证分析。城市之间本身并不会自发地形成联系，各类企业、机构以及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才是产生和推动城市联系的行为主体。对城市网络形成机制的分析因而可以转化成对各类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分析，而行为主体之间是否发生联系则主要取决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三，城市网络的外部经济分析。一方面，对于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部分中国城市以及处于

国家和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的城市，分析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学者关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分析我国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关系。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借助区域科学、经济地理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这也将推动城市网络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国外大城市地区企业区位模型研究综述

杨烁 于涛方

摘要：长期以来，大城市的家庭居住区位选择和企业区位选择一直是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关注的重点。在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全球化、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的综合作用下，加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能够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和变革。为此，本文归纳了国外大城市地区就业区位分析模型研究进展，全文共包括四部分内容，分别是：城市企业区位模型的趋势、企业区位处理方法的发展历程、模型构建要素与理论以及对城市规划的启示。

关键词：就业区位选择；城市模型；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

引文格式：杨烁，于涛方. 国外大城市地区企业区位模型研究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68-74. DOI: 10.22217/upi.2015.552.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分析——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

彭伊依 周素红

摘要：在全球性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优化养老模式成为地方政策关注的热点话题。“住宅型多代屋”项目作为德国一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其中多代屋的社区治理机制是该项目成功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由行动者角色、转译过程、互动网络逐层深入，研究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构建与运营机制。文章发现利多多代屋基于居民多代分异的特征，采取措施合理利用多代文化的活跃优势，规避居民需求冲突、文化隔阂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富有归属感的社区邻里。最后，文章借鉴住宅型多代屋独特的社区治理模式，为我国老龄化社区规划管理提供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行动者网络理论；德国

引文格式：彭伊依，周素红.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分析——以德国科隆市利多多代屋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75-81. DOI: 10.22217/upi.2016.316.

在全球性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优化养老模式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话题。德国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占比高达 69%，但与子女的代际联系却逐步减弱，主流的血缘代际养老模式开始无法满足德国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满足社交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弥补断裂的家庭关系网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德国“住宅

型多代屋”项目，提出以构建无血缘关系多代居民会面的公共场所为核心，以促进代际交流、多方合作作为重要的社区构建导向。本文将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德国科隆市利多社区为例，对住宅型多代屋社区治理机制进行分析。

基于“行动者”视角，对社区网络成分及内部关系进行分析。居民群体是利多社区联盟中的主要

行动者，政府在前期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对项目运营进行过多干预。企业组织主要负责房屋建设与管理，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规模化运作有效弥补了居民组织的不足。

基于“转译”视角，从“征召动员—社区构建—项目运营”的环节回溯梳理利多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过程。基于“网络”视角，探讨利多多代屋多元化、多层级的社区网络结构。居民互动是社区网络的核心，自发性互动、自组织性互动与合作组织性互动等互动行为分别从不同规模与主题出发，互为补充，有效保证了多代屋社区的持续运作。非正式、小规模交流更有利于产生代际联系，而大规模的正式活动则展现了社区整体价值观。稳定性经济来源、规律性居民会议以及专业性技术支持则从经济、管理、技术等不同层面为多代屋网络提供了外部支撑。

追溯利多社区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功经验主

要源于以下几个支撑条件：（1）从空间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等不同层面为满足不同代际成员的互补性需求提供条件；（2）充分发挥老年群体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将老年人从传统观念中的社会负担转变为活跃的社会工作者；（3）借助社会组织力量，形成社区共同利益的构建基础。

随着中国老龄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未来中国养老模式的总体趋势也从家庭化向家庭化+社会化、家庭化+社区化转型。借鉴住宅型多代屋的培育多代交流文化氛围、打破代际隔阂的治理经验，建议我国老龄化社区进行适老化改革，营造鼓励代际交流的社区氛围，并引入多主体模式展开社区构建。总而言之，住宅型多代屋作为无血缘互助养老的社区新模式，开辟了解决社会养老居住问题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我们立足国情探索新的社区养老实施途径。

法团主义视角下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郭旭 严雅琦 田莉

摘要：在考察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政策与实践基础上，分析了再开发的制度安排、实施结果，认为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变迁的背后是空间治理结构的转型。运用法团主义分析工具，构建了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变迁的制度分析框架，在以“分权”为特征的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不同的力量组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的空间治理方式。从“国家法团主义”到“地方法团主义”再到“社会法团主义”的治理结构变迁下，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政策与实施特征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国家法团主义”下对违法用地的承认与处理以及放弃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到“地方法团主义”下地方政府占据主导作用，压制了市场和力量的力量导致再开发放缓，再到“社会法团主义”下社会力量崛起，再由开发房地产导向转变为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导向。研究应用广州市番禺区的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历程，对再开发过程中的权力结构重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法团主义；存量建设用地；空间治理；制度变迁；“三旧”改造

引文格式：郭旭，严雅琦，田莉. 法团主义视角下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82-87. DOI: 10.22217/upi.2017.233.

俄勒冈城市增长边界简化方法探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叶裕民 田若敏 王晨跃

摘要：控制城市蔓延，引导城市集约发展、精明增长是推动新型城镇化中的重要任务。城市开发边界作为

控制城市蔓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抓手正在各地迅速展开。为了更好地支持我国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本文重点介绍并评价了俄勒冈最新的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的简化方法。UGB简化方法基于科学的数据研究得出,由一系列的统一标准组成,用详细可循的条文来规制,并建构配套的制度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以保障实施。UGB简化方法体现的整体与部分的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刚性与弹性的融合值得中国在制定与实施城市增长边界政策时借鉴学习。论文提出的简化UGB方法可以给我国以启迪:重新认识城市增长边界的本质,灵活运用相关工具;鼓励公众参与贯穿规划始末;为UGB构建法律基础,健全其过程监督;完善UGB政策体系,推动部际和府际间的跨域协作;在摆脱对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的前提下,将土地存量成本分析纳入UGB划定的考量范围,推动事件驱动型UGB扩展方式在未来的应用;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收集整理客观科学的数据信息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纽带和关键。

关键词: 城市增长边界(UGB); UGB简化方法; 政策研究; 俄勒冈

引文格式: 叶裕民, 田若敏, 王晨跃. 俄勒冈城市增长边界简化方法探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88-97. DOI: 10.22217/upi.2017.063.

1950—1970年,俄勒冈人口增加了40%,其中80%的增量在威拉米特(Willamette)河谷中;农用地每年减少8.5万英亩(343 km²),其中45%的减少发生在威拉米特河谷。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 Urban Growth Boundaries)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耕地。

自俄勒冈1972年提出UGB的概念以来,1979—2014年,波特兰地区城市增长边界内的人口增加了61%,同期增长边界面积只扩张了14%,较好地起到了控制城市蔓延的作用。

俄勒冈UGB简化方法是以数据科学预测为基础,评估和修正UGB的简化方法。相比传统方法,它时限短、复杂性低、不确定性小、成本低,适用于除波特兰大都会区以外的其他州内城市,城市可以根据需要选择UGB简化方法或者传统方法。

俄勒冈UGB简化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点特征。

(1) UGB的建立可以分为两大步骤:一是确定规划期内的土地需求,判断需不需要修改UGB;二是对周边土地进行评估,确定UGB的位置。

(2) 每个城市每四年做一次人口预测,通过人口预测确定满足不同居住偏好的住宅单元用地,通过就业岗位预测确定满足不同就业需求的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并划定一定比例的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用地,进而确定用地总需求。

(3) 将城市按人口规模分类,并分析同类城市的历史发展模式、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城市未来的发展情况。以此为基础,为每类城市确定一套适合

其自身的统一标准。之后,各地方政府只需按照统一制定的标准“对号入座”,在确定的数值范围内自由裁量,以最简便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就能划出最终的UGB。

(4) 在14年的规划期内,采用UGB简化方法的城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就能扩张UGB:城市人口实际增长量达到预期增长量的50%;满足需求的可建造土地中的50%已经开发。

(5) 树立了划定UGB的目标并建立了保障目标得以实现的一系列举措。

俄勒冈UGB简化方法对我国有以下六点启示。

(1) 我国现有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思路大多为永久性的刚性划定,而城市增长边界是阶段调整的弹性边界,更具合理性与科学性。确定城市增长边界,关注的是在尊重城市及区域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对城市用地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而促进城市更集约、紧凑、健康地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保护生态环境、控制城市规模。

(2) 鉴于我国规划领域的公众参与处于起步阶段,首先要注重研究培养公民意识的政策,开展培养公民意识的活动,而非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公众参与。

(3) 制定完善有关城市增长边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实行有效监督。对于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的土地,政府应证明人的需求与土地扩张的关系,供权力监督部门审查,实现城市的良性增长。权力监

督部门应独立于权力实施部门，有权对政策含义做出法理上的解释。

（4）俄勒冈明确由一个部门负责统一制定 UGB 政策。在空间规划改革的现有背景下，应将城市增长边界的功能本质纳入重构后的空间规划体系，并与城市开发边界及其他既有政策工具有效衔接，由同一部门制定统一政策。开发边界注重行政区划内的城市用地开发，而增长边界立足区域的整体发展和战略考量，这对城市府际间的合作以及上下级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提出了要求。

（5）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实际上是一个土地

存量管理模式，应对存量监测的行政成本、土地存量的价格波动等土地存量成本要素进行科学分析，将其纳入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的考量范围。在短期内，时间驱动型的控制方式更迎合我国的规划实践。但从长期来看，事件驱动型的控制方式更佳。

（6）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土地人口信息系统，利用大数据监测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并做出科学的人口预测，更好地确定城市对土地的合理需求。以此为依据，因地制宜建立统一的 UGB 划定技术标准。

日本城市绿视率计量方法与评价应用

肖希 韦怡凯 李敏

摘要：目前我国城市绿化常用的评价指标，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面积等，主要用于衡量城市绿地的平面绿量。1987 年，日本学者青木阳二提出“绿视率”的概念，表达在人的视野中绿色所占的比重，用以研究人居环境空间中绿色物质与人的感知之间的关系。2004 年，日本政府将“绿视率”纳入城市绿化评价的常规指标。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概述了日本学者近 30 年来对绿视率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绿视率的基本概念和常用计量方法，阐述了绿视率评价的应用领域。本文认为，研究应用绿视率指标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绿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1）绿视率可作为城市空间心理感知绿量的评价指标，（2）绿视率可为优化城市空间植物景观构成提供技术依据，（3）绿视率可作为制定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补偿指标。

关键词：绿视率；城市绿化；计量方法；评价指标；日本

引文格式：肖希，韦怡凯，李敏．日本城市绿视率计量方法与评价应用[J]．国际城市规划，2018(2): 98-103.
DOI: 10.22217/upi.2015.547.

多年来，我国业界一直将绿地率、绿地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作为主要的城市绿化评价指标，这在反映城市三维空间的绿色资源和景观效果方面有所欠缺。由于人在城市环境中所接收到的信息有 90% 来源于视觉，因而应用绿视率评价能让市民直观地了解城市绿化建设的水平。迄今为止，欧美和国内学者对绿视率的研究关注较少，而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2004 年日本政府将绿视率认定为城市绿化评价指标之一。

1 绿视率的基本定义

绿视率（Visible Green Index）作为一项反映城市空间绿化水平的物理量，由日本学者青木阳二于

1987 年首先提出。通过统计“看到的绿色”的绿视率，能直观了解城市三维空间的绿化效果，为有关部门合理制定绿化建设策略提供依据。

绿视率的定义为：在人眼高度中所看到的绿色所占比例，包括屋檐下的花卉、墙体绿化、草坪、远处的群山和水体等，是立体的绿量计量指标。

绿视率在日本城市发展建设中已受到较高重视：1984—1993 年间，日本学者开展了许多关于绿视率指标化提案的研究，包括对公园绿地绿视率测量方法、城市绿色空间植物配置效果指标化评价、城市空间绿化建设成果与人心理感受的关系等；2004 年，日本政府正式通过“景观绿三法”，使“绿

视率”成为绿色景观评价体系的常规指标之一。

2 绿视率的计量方法

城市绿视率评估可使用多种计量方法，主要技术环节及要点如下。

（1）合理选择调查时间

原则上应选择在植物景观效果最佳、植物生长最茂盛且外界影响因素最小的时间段进行绿视率测量，一般选择6—7月份。位于热带地区的城市，可适当放宽调研时间的选择范围。

（2）选取典型的观测点

观测点应能客观反映空间实际绿化情况，同时在一段时间内应保持稳定，以便后期跟踪调研。绿视率观测点常用的取样方法有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抽样法两种。

（3）获取绿视率观测图像

根据研究人眼的视野范围在水平方向上为80°~160°，在垂直方向上为130°，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以60°为清晰视野范围。据国家发布的中国成年人平均身高数据，调研拍摄视高可在1.5~1.6 m之间选取。

用照相机定点拍摄获取人眼视野范围的图像，方法简便，对设备的要求低，可推广性强，是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方式。根据普通相机的焦距成像原理，经对比发现：焦距24 mm的镜头成像效果最接近人眼的视野范围。调研拍摄方向主要由道路形态决定。城市道路应朝道路沿线和垂直方向拍摄；丁字路口应于交叉点上朝道路方向拍摄；多条道路交叉口应分别在转折处取点，朝道路交汇中心拍摄；交通岛的拍摄方向取决于相交道路的数量。

随着城市空间图像获取渠道的增多，全景拍摄、谷歌街景图下载都可以用于绿视率的计量研究。全景拍摄能更客观地反映人在空间活动时的真实感受，但是对拍摄设备有较高要求。街景图像可直接在网上获取，效率高且操作简便，但缺乏时效性，图像限制因素较多。

（4）绿视率计算与数据统计

绿视率的精确计算公式如下：

$$\text{绿视率} = \frac{\text{绿色面积}}{\text{视野面积}} \times 100\%$$

此外，也可以用估算绿视率方法快速判断某个街区绿视率的高低，算式如下：

$$\text{绿视率} = \frac{\text{绿视面积}(S)}{\text{街道长度}(W) \times \text{建筑平均高度}} \times 100\%$$

3 绿视率的评价应用

绿视率是从人的生理感知出发进行人眼视野绿量测定，直观地表达三维空间绿量高低并间接反映视觉环境质量，可以作为衡量城市绿化建设水平的基本评价指标之一。

（1）绿视率可作为城市空间心理感知绿量的评价指标

绿视率测定用定量方式综合考察城市三维空间的绿化程度及市民的心理感知状态，能较好地反映市民对城市空间的心理感知绿量。它作为人对空间环境绿化质量的心理感知指标，可通过实验研究确定使人产生积极心理反应的取值范围。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布社会调查结果：高绿视率环境可带来安静、湿润和清爽感，带动周边的商业气氛，起到聚集人流的作用。该文件首次认可绿视率高于25%能给市民绿化较好的感受。因此，绿视率大于25%已成为许多城市绿化建设的目标。

（2）绿视率可为优化城市空间植物景观构成提供依据

研究城市空间绿视率的影响因子，是优化城市绿化水平的基本依据。如城市道路空间中的乔木数量、路幅宽度、绿带数量、种植结构均对绿视率有较大影响，特别是立体绿化，虽然在平面上对城市绿地率上贡献不大，但对空间绿视率的贡献很大。通过研究植物景观质量与绿视率的相关性，确定合理的绿化种植方式，能够为优化城市空间的植物景观构成提供依据。

（3）绿视率可作为制定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补偿指标

2011年5月，日本大阪府提出“绿色之风促进区域”，将绿视率指标作为放宽建筑物容积率和密度限制的若干条件之一。即：若建筑周边环境满足“绿视率达到25%以上”，城市沿路地区的建筑密度就可以从60%放宽至80%，城市中心区的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有机会从3.0放宽至4.0。此外，研究表明：绿视率与城市住区环境的经济价值呈正相关性，高绿视率会拉动周边的房产售价。从日本的经验看，在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划控制时，绿视率可作为放宽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限制的补偿指标。

2010 年以来英国城市更新政策革新与实践

刘晓逸 运迎霞 任利剑

摘要：面对国民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境，英国政府自 2010 年以来改革了原有的城市更新政策，以期通过更新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从政策整体制定及其实践检验的角度，阐述英国联合政府为应对原有城市更新政策目标不清、不可持续等挑战，采取了一系列更新政策革新举措：地方企业合作组织及其区划、城市交易、区域发展基金、邻里更新等；并分析其政策的实效性、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跟进英国城市更新政策革新及其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城市更新政策的最新发展，也将为我国存量规划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英国城市更新政策；政策革新；更新实践

引文格式：刘晓逸，运迎霞，任利剑. 2010 年以来英国城市更新政策革新与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04-110. DOI: 10.22217/upi.2017.088.

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 30 年发展历程解读

王祝根 昆廷·史蒂文森 李晓蕾

摘要：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是墨尔本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对促进墨尔本城市空间更新与优化发展、提升城市宜居度和城市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对人性化城市设计的概念与价值做了解读；通过发展过程的梳理将墨尔本始于 1985 年的人性化城市设计实践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对其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与研究实践做了分析总结；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实践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的四项基础。

关键词：人性化；城市设计；城市街道；开放空间

引文格式：王祝根，昆廷·史蒂文森，李晓蕾. 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 30 年发展历程解读[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11-119. DOI: 10.22217/upi.2016.430.

自相关概念于 1980 年代年初首次提出至今，城市设计已经在中国经历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21 世纪以来，“以人为本”已成为当代城市设计的核心思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性化在国内往往作为一种口号被广泛提及，真正能够推进并落实该理念的城市并不多。

同国内城市相比，作为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墨尔本是较早将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应用于建设实践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国际城市之一。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在满足不同需求的时代背景下，墨尔本的人性化城市设计实践在 30 年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早在 1980 年代，墨尔本就在城市设计法令中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墨尔本需要继续保持并不断发展适宜步行的、安全的、具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

该法令从城市形象、建筑设计与土地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多项城市设计控制原则，对墨尔本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随后，墨尔本市规划委员会于 1985 年进一步研究制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性化的街道——墨尔本市中心活动区步行策略》。在该策略中，墨尔本第一次将城市设计的关注点从物质空间转向了人本身，这种转变对墨尔本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开启了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的实践历程。

1990 年代，墨尔本市规划委员会开始同扬·盖尔合作展开人性化城市设计专项研究，并于 1994 年共同制定了《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划》。扬·盖尔在该规划中对宜居城市概念做了解读，首次从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宜居城市环境的四项要素，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城市设计策略，该规划对墨尔本打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引导

墨尔本走上了以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驱动城市更新的发展轨道。

随着规划中一系列策略的相继实施，墨尔本的城市吸引力和城市活力有了显著提升，墨尔本也开始意识到，实践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对城市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自此开始，针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墨尔本形成了每十年编制一次专项规划的延续性机制。此后墨尔本于 2004 年、2015 年相继编制了两轮人性化空间发展规划。依托该规划，墨尔本多年来投入大量资金对城市街道、城市公园、城市广场、公共建筑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持续性的人性化改造，这些“看不见”的改造工程已经成为

墨尔本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

回顾发展历程，从城市人口流失到空间过度拥挤，从城市活力不足到新老城区发展不均，墨尔本在 30 年间经历了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发展挑战。同样的 30 年，从扭转设计意识到建立研究机制，从拓展研究内容到更新研究方法，墨尔本在应对不同城市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也实现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研究的不断发展，充分体现了城市设计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作为国际宜居城市建设的典范模本，墨尔本充分证明了实践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和意义。

利用绿色街道推进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美国绿色街道建设的经验启示

黄欣茹 宋彦 陈燕萍

摘要：由美国提出和主要倡导的绿色街道是低影响开发理念落实到街道雨水管理实际工程的重要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推广，绿色街道目前被公认为最先进的雨水管理方式之一，改善了当地街道暴雨洪水问题的同时为城市创造了更多绿色空间。本文在全面分析美国绿色街道建设过程以及先进建设案例的基础上，从成熟的绿色街道建设工程技术、完善的绿色街道实施保障机制和多方协作参与建设绿色街道三大方面梳理归纳了美国绿色街道建设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并指出我国应当借由发展海绵城市建设的机遇，结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积极借鉴美国绿色街道建设经验，以绿色街道建设为着手点和推动力促进海绵城市建设。

关键词：绿色街道；海绵城市；雨水管理；美国

引文格式：黄欣茹，宋彦，陈燕萍. 利用绿色街道推进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美国绿色街道建设的经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20-127. DOI: 10.22217/upi.2015.466.

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经验及其借鉴

陈林 刘云刚

摘要：乡村驿站是日本推动乡村活化的重要项目，作为新世纪日本乡村再生的一项重要举措备受瞩目。本文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了日本乡村驿站的建设过程、类型、模式、实施机制及其影响，并探讨了其对中国城乡统筹、乡村活化工作的借鉴意义。日本的乡村驿站兴起于城乡联动交流的背景之下，依托驿站这一平台，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与乡村的生活文化资源相结合，通过区域内农户、企业和社会团体等的合作，实现了区域差异化发展。此外，乡村驿站还带动了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的重构和活化，助推了日益衰退的乡村再生。日本乡村驿站建设的诸多经验，对推动我国的城乡统筹及乡村活化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村驿站；城乡统筹；乡村活化；乡村再生；日本

引文格式：陈林，刘云刚. 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经验及其借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28-134. DOI:

乡村驿站作为日本推动乡村活化的重要项目，已经成为乡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道靓丽风景。乡村驿站为何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如此快速增加，支撑其成长的机制是什么，与此同时其又给乡村的活化带来什么影响。这些疑问促使笔者去弄清日本乡村驿站兴起背后所隐藏的秘密。

日本的乡村驿站概念诞生于 1990 年建设省道路局（现国土交通省道路局）在广岛县召开的一次地方营造意见交流高峰论坛。与会人员指出，火车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虽然具有休息、信息展示和区域合作等功能，但带动的范围不广。如果能在一般道路上设立驿站，更有益于促进乡村活化。建设省在听取上述意见后，于次年在不同地方广泛开展社会实验，在经过充分论证后正式批转日本乡村驿站登记建设。

日本乡村驿站的设立采用申请—许可制的方式。在驿站的设施建设上，日本政府各部门提供了许多支持措施。其中，建设方式以道路部门负责驿站基础设施，市町村等乡村部门负责区域振兴设施的联合式居多。与此同时，市町村主要委托指定管理者和第三部门运营和管理乡村驿站，注重运用民间智慧以高效利用公共设施，提升服务质量。

日本的乡村驿站立足于城乡联动交流这一背景，这也迎合了后生产主义理论下乡村空间的商品化诉求。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依托驿站这一平台，与乡村的生活文化资源相结合，通过区域内农户、企业和社会团体等的合作，推进了乡村驿站的发展。乡村驿站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站的节点，带动了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的重构和活化，助

推了日益衰退的乡村再生。与此同时，乡村驿站不断探索目前日本乡村由于过疏化和少子化所带来的各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现驿站功能的自我复合化。

中国目前也已开始进入乡村少子化、老龄化和乡村经济衰退时期。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振兴处于越发重要的位置。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乡村驿站建设理念可以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是一种可借鉴的发展策略。通过建设乡村驿站，可将城市和乡村间的车流，人流和信息流进行有效链接，助推乡村活化和城乡统筹。

我们认为，在中国建设乡村驿站首先要尊重和保护好乡村生活，在此基础上有效结合乡村所富有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实现生产空间的重构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产业融合应立足乡村物产，在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环节实现价值提升和区域创新。同时，面向城市居民提供乡村物产和服务以加深对乡村的认同，促进城乡融合。积累原始资本孵化乡村新产业和实现资金的内部循环以谋求共同发展。其次，将乡村驿站建设成为乡村的小型生活基地，为村民提供一站式生活服务和交通便利，解决他们在生活、福祉等的难题，助推宜居乡村建设。另外，我们也应借鉴 1980 年代日本外生性乡村振兴失败的经验，在乡村建设和运营上应以内部主体形成的网络为主，吸引城市相关主体进行辅助。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城市消费者的多样需求，有效组合乡村的各种资本与时俱进持续赋予乡村新价值，助推乡村建设。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探索与经验——评《向成都学习：中国的城乡发展统筹》

周江评 韩涛

导读：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城乡统筹，即如何处理城乡差异、城乡发展、农民、农业、农民工（或城市、工业新移民）、城市化等事务，是它们在走向富强、民主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要面对和解决的、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在解决以上问题时，闯出了一条自己的、值得自豪和世人称赞的新路。对于这条新路，我们作为学者该如何总结？它对于中国之外的读者，又能提供怎样的启示？如何把这些启示转化为能够使最多人理解和获益的理论和知识？本文推荐了中国人民大

学的叶裕民教授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理查德·勒盖茨（Richard LeGates）教授合著的《向成都学习：中国的城乡发展统筹》（*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earning from Chengdu*）一书。推荐理由包括：该书的案例选取、结构安排和写作手法；该书的核心内容；该书提出或使用的新的视角或素材。

引文格式：周江评，韩涛. 城乡一体化的成都探索与经验——评《向成都学习：中国的城乡发展统筹》[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35-136. DOI: 10.22217/upi.2015.542.

城乡统筹，即如何处理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农业、农民工、城市化等事务，是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国过去 30 余年闯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作为对此新路的小结，叶裕民、理查德·勒盖茨（Richard LeGates）两位教授的专著《向成都学习：中国的城乡发展统筹》（*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Learning from Chengdu*）值得推荐，理由解析如下。

1 本书的案例、结构和写作

在城乡统筹理论介绍和讨论之外，本书对于理论的解释和应用，大量地使用了成都作为案例。成都是中国 2007 年最先确定的两个国家级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的试点城市之一。结合既有文献和成都案例，作者将城市化、城乡统筹的重点工作和挑战归结为以下十一个方面加以阐述：

- 1) 城乡发展的密度，尤其是人口、产业的密度如何考虑和安排；
- 2) 城乡的用地布局 and 结构怎样优化；
- 3) 城乡用地、人口总量如何管控；
- 4) 城乡各自安排哪些产业，为何；
- 5) 人地关系怎么协调，即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如何协调；
- 6) 交通与土地利用如何配合；
- 7) 管治（governance）如何在解决城乡问题中发挥最大作用；
- 8) 财政和城市化的相互关系怎么处理；
- 9) 物权（property right）对于城市化的意义；
- 10) 美学如何渗透到城乡建设和管理当中；
- 11) 社区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2 本书的核心内容

本书的核心内容，可以分解为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作者从全球、全国和本地的视角，审视城乡发展（城市化和城乡统筹是核心）、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与之相关的有关概念、经验和做法。对于读者而言，这一板块当中最精彩、最有新意和最有借鉴意义的内容，是成都视角下的城乡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

第二个板块，是成都为了做好城乡统筹，在各个子领域，所做出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这些子领域与上文提及的各国、各地区所面临的城市化的主要挑战相互呼应。

第三个板块，是作者关于中国城市化经验，尤其是成都城乡统筹经验的小结。对于成都经验，作者指出它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整体性、长效性的规划；区域性的规划；全面的政府、经济、行政和城乡规划制度的改革。相关改革实现了物质形态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整合，促进了以逻辑和数据为引导的科学规划，减少了主观臆想引导的规划。

3 本书作者的背景、新视角或素材

过去 30 余年中国的巨变，为海内外的城市研究者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鲜案例和材料。基于此，部分海外研究者，例如伦敦大学学院的吴缚龙教授、布朗大学的约翰·洛根（John Logan）教授开始在国际上传播“城市中国”（urban China）的“好声音”。本书作者参与了成都经验的创造，在此基础上小结成都经验，无疑为国际城市中国研究加上了另外一些特别的“好声音”。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改善城市公共空间”试点项目——汉口租界区二曜路公共空间“Block by Block”实践

洪孟良 亢德芝 柳应飞 成伟

导读：近年来，城市公共空间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解读“人居III”关于公共空间及其应用的议程基础上，介绍了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公共空间方案，并以中国首例“中国改善城市公共空间”——汉口租界区二曜路试点公共空间“Block by Block”项目为例，对社区参与公共空间设计，促进规划实施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社区参与式城市规划和创新可视化平台对促进市民权利意识的成长，营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具有重要作用。

引文格式：洪孟良，亢德芝，柳应飞，等.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改善城市公共空间”试点项目——汉口租界区二曜路公共空间“Block by Block”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2): 148-150. DOI: 10.22217/upi.2017.581.

2018年第3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国城市雨洪管理

胡宏 /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国城市雨洪管理进展与启示

孟婷 / 美国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研究

克里斯·克朗普顿, 彭舰, 丹尼尔·阿普特, 马克·格雷, 著; 李雅, 译 / 加州奥兰治县低影响开发: 实施和评估中的挑战与对策

胡宏 /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雨洪管治策略——以费城为例

西奥多·赵·林 /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社区复兴——以华盛顿特区为例

刘佳玉 / 城市复杂建成环境下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径流的水质水量影响及规划布局研究

李雅 /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以西雅图为例

城乡研究

黄燕玲, 著; 张丞国, 译 / “城市繁荣指数”体系: 指标、分析及政策的联结

吴巍, 宋彦, 洪再生, 卢一华 / 国外城市形态对住宅能耗影响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邹志翀, 冷红 /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风险相关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规划研究

朱静宜 / 生态视角下的“城市之城”: 来自“博洛尼亚七城”结构规划的思考

戴伟, 孙一民, 韩·梅尔, 塔聂尔·库聂考·巴顿 / 走向韧性规划: 基于国际视野的三角洲规划研究

杜伊, 金云峰 / “底限控制”到“精细化”

——美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的代表性方法、演变背景与特征研究

廖开怀, 蔡云楠 / 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

甘惟 / 国内外城市智能规划技术类型与特征研究

陆明, 付婧莞, 杜江涛 / 欧洲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

实践综述

王宁 / 传统田的现代演绎: 荷兰兰斯塔德乡村地区建设策略

王建竹 / 非洲英属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实践: 1851—1960年的港口之城拉各斯

程鹏 / 滨海城市岸线利用方式转型与空间重构——巴塞罗那的经验

王思思, 李畅, 李海燕, 袁冬海 / 老城排水系统改造的绿色方略——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2018年 第3期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国城市雨洪管理进展与启示

胡宏

摘要：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被不透水面分割，呈现破碎化和硬质化，导致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雨水溢流和水体污染困扰。绿色基础设施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吸收、减缓和过滤雨水。已有研究证实绿色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城市水质、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经济效益、促进社区价值提升，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内容。美国现有 772 个城市采用雨污合流排水模式。中国在综合雨洪管理方法和实践上起步较晚，运行效果有待检验，相应的规划策略和治理方法仍需完善。本专辑选择美国雨洪管理的前沿热点话题和东西海岸的代表城市，梳理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阐述低影响开发的实施评估手段与成效；总结城市尺度的雨洪管治策略；研究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社区复兴路径；归纳绿色基础设施的水质水量影响及组合布局策略；最后解析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

引文格式：胡宏.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国城市雨洪管理进展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2. DOI: 10.22217/upi.2017.416.

美国现有 772 个城市采用雨污合流排水模式。由于传统的雨污合流管网老化，而升级改造的财政预算有限，近年来美国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选择将大型城市排水管网与小规模分散的绿色基础设施相结合，进行雨洪治理。绿色基础设施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吸收、减缓和过滤雨水，有助于改善城市水质，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经济效益，促进社区价值提升，是建设健康城市的重要内容。

美国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雨洪管理主要依靠对现状建成环境的更新改造，即建设不同尺度、多样化、分散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形成网络，减轻雨水管网的负担。为达成这一目标，地方政府除了通过公共投资在公共用地上建设示范性项目外，还采取两种途径促进市场和公众在私人土地上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第一种是设计经济激励项目，鼓励市场投资；第二种是进行公众教育，培养社会对城市雨洪危害和绿色基础设施效益的认同。如今美国已逐步形成了包括政策管理、技术研发、财政支付、公众参与和后期维护在内的全方位城市雨洪管理策略。

当前美国东西海岸城市都在进行综合雨洪管理实践，覆盖了公共用地和私人土地、商业用地和居住社区、不透水面改造和河道修复、激励政策和技术创新。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美

国城市雨洪管理”专辑选择美国雨洪管理的前沿热点话题和东西海岸的代表城市，梳理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阐述低影响开发的实施评估手段与成效，总结城市尺度的雨洪管治策略，研究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社区复兴路径，归纳绿色基础设施的水质水量影响及组合布局策略，最后解析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专辑文章包括《美国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研究》、《加州橙县低影响开发：实施和评估中的挑战与对策》、《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社区复兴——以华盛顿特区为例》、《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雨洪管治策略——以费城为例》、《城市复杂建成环境下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径流的水质水文影响及规划布局研究》和《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以西雅图为例》。

中国城市雨洪问题是高密度建成环境下的复杂问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运用系统方法，将城市雨洪管理与区域规划、流域规划、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居住小区设计等不同尺度规划策略协调，提升城市雨洪管理的兼容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多样化的政策机制组合、定量的雨洪管理评估、实施过程的持续监测和定期反馈调整，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创造更宜居健康的绿色人居环境。

美国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研究

孟婷

摘要：随着雨洪管理日益受到关注和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雨洪管理成为美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雨洪管理实现有效和实时调控的热点发展方向。通过在基础设施上安装智能传感组件，与管理中心发生交互，完成雨洪信息搜集、分析、处理、控制和调整，智能雨洪管理扩展了基础设施的功能范围，增强了自动化操作和管理的灵活性，降低了长期维护成本和人力投入，有利于提升雨洪管理的效率和成果。本文以智能雨洪管理的发展背景为切入点，辨析智能雨洪管理的相关概念，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美国雨洪管理的应用现状、发展重点、现实阻碍和有效推广途径，以期对我国未来雨洪管理的智能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智能感测；智能控制；雨洪基础设施

引文格式：孟婷. 美国智能雨洪管理途径与发展前景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3-8. DOI: 10.22217/upi.2017.425.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快速城市化和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雨洪管理系统需要在原有的控制和利用基础上升级，从而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高效合理地处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过量径流，降低水环境污染，维护水域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包括传感器的更新升级、无线通信设备的日益成熟、大型数据平台的搭建和管理，以及各个智能组件成本的显著降低，都为智能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技术保障和经济可行性。智能技术和雨洪管理系统的有机结合为雨洪系统的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智能雨洪管理已成为美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雨洪管理实现有效和实时调控的热点发展方向。本文以智能雨洪管理的发展背景为切入点，辨析智能雨洪管理的相关概念，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美国雨洪管理的应用现状、发展重点、现实阻碍和有效推广途径，以期对我国未来雨洪管理的智能化提供借鉴。

智能雨洪管理的发展背景源于两股力量的互相作用：一是对雨洪管理系统的新需求，另一个是日益成熟的智能技术及其在水利系统中的应用。智能雨洪管理扩展了基础设施的功能范围，增强了自动化操作和管理的灵活性，同时有效降低了长期维

护成本和人力投入，有利于提升雨洪管理的效率和成果。

目前的智能雨洪管理多集中于政策和监管的需要和学术分析，大规模采用和推广还相对有限，然而不乏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中，水量控制、水质监测、提高系统功能和效率，以及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的探索尤为突出。结合实例分析发现，智能雨洪在集成雨洪管理的资源和废物管理双重性，以及水量和水质的协同控制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美国智能雨洪管理推广的重点在于完善智能管理的框架和思路，分析各地各部门对雨洪管理的具体需要，研发多样的智能基础设施系统，完成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有机结合，探索有效的发展和推广途径。

我国目前的雨洪管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通过科学的雨洪管理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控制城市径流，降低水污染和保护水环境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我国传统的雨洪控制利用系统存在着资源利用理念落后、控制利用模式单一、决策和管理相对滞后等突出问题。智能雨洪管理在美国的尝试、发展和经验，都将对中国的雨洪管理智能化的潜在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加州奥兰治县低影响开发：实施和评估中的挑战与对策

克里斯·克朗普顿 彭舰 丹尼尔·阿普特 马克·格雷 著 李雅 译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从严重破坏自然溪流形态、栖息地和水质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向平衡城市开发前后水文特征和自然环境的低影响开发历程；然后总结奥兰治县在实施和评估低影响开发绩效方面的逻辑框架和创新方法。奥兰治县通过参与区域低影响开发项目评估研究、制定低影响发展指导文件、创造评估低影响开发性能的系统框架，将低影响开发的实施和评估标准化，而在低影响开发受限区域则利用水质信贷交易建立替代性项目。本文通过对两个实际案例（格拉塞尔园区评估项目和莱格西园区水质交易项目）的分析，认为低影响开发设计前的场地调查、模拟和监测工作，实施后的标准化监测和数据共享，以及灵活的水质交易机制是低影响开发项目成功的关键。奥兰治县经验可为中国城市进行低影响开发实施和评估提供方法借鉴。

关键词：低影响开发；奥兰治县；实施；评估

引文格式：克里斯·克朗普顿，彭舰，丹尼尔·阿普特，等. 加州奥兰治县低影响开发：实施和评估中的挑战与对策[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9-15, 40. DOI: 10.22217/upi. 2018.026.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雨洪管治策略——以费城为例

胡宏

摘要：新一代城市雨洪管治不只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是将多元主体纳入雨洪决策和实施，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的复杂动态过程。本文分析美国雨洪管治的主要模式，回顾费城雨洪管治策略——“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的实施过程，梳理其基于地块尺度的精细化雨洪管治演变历程。费城雨洪管治是水利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过程，强调绿色基础设施与传统设施结合，在确立整体雨洪管理目标后，通过空间用地对目标进行系统分解，保证目标实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最后，本文借鉴费城案例提出我国城市层面雨洪管治需要建立跨部门跨尺度的协调机制，将城市雨洪管治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各个层次，注重布局的公平性，实现数据可视化与成本控制。

关键词：绿色基础设施；雨洪管治；多主体参与；费城

引文格式：胡宏.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雨洪管治策略——以费城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6-22. DOI: 10.22217/upi.2017.419.

在地块尺度建立绿色基础设施，进行精细化的雨洪管理已成为当前美国城市雨洪管治的趋势。费城（Philadelphia）通过“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率先在城市尺度践行了新一代雨洪管治理念。费城现存的污水系统建设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叶，市内污水处理系统有 60%是传统的雨污合流系统，不透水地面占市区总用地的 54%。2009 年 9 月，费城水利局向宾夕法尼亚州环保局提交了“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内容覆盖绿色街道、绿色学校、绿色公共设施、绿色停车场、绿色开敞空

间、绿色工业和商业、绿色巷道和绿色住宅。该计划提出用 25 年时间，投资 24 亿美元，改造 1 万英亩（约 40.5 km²）城市不透水地面为绿色地面，预计减少 85%的雨污溢流。

雨洪管治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复杂过程，它涉及城市管理的多方面内容和多主体利益。费城雨洪管治策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实施以前，完全以费城水利局为主导，市民顾问委员会协助的单一目标强制管理阶段。第二阶段是“绿色城市，清洁水体”计划实施初期，

费城水利局寻求跨部门合作，以综合雨洪管理为目标的探索磨合阶段。第三阶段是当前多元主体达成相互理解的稳定提升阶段。费城案例说明，在制定雨洪管治方案初期就应将相关部门纳入参与主体，充分了解其他部门辅助实施雨洪管治方案所面临的政策障碍和其他难题，有助于修正管治路径，减少资源浪费。费城水利局通过对居民和商业团体的激励措施，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引入雨洪管治。

雨洪管治的信息公开与可视化也是费城水利局促进公众参与的一项措施。2010 年以来，费城水利局为顺利推进新的雨洪管理方案，专门增加面向雨洪收费的用户服务项目，并设置了商业用户服务

小组，提前多次发出通告函解释雨水管理政策的变化细节。同时，提供网络可视化工具为用户对自身地块的绿色基础设施改造提供概念设计方案、成本和收益估算。并持续进行公共教育，多次举行研讨会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对雨水管理政策的反响。对于每一个已建成的绿色基础设施（不包括社区住宅内），水利局都进行效果监测。开放雨洪等环境监测数据，设计良好的用户可视化平台，方便公众了解绿色基础设施的多重效益，有助于将绿色雨洪管治建立成一种社会思维范式。

费城案例在机制创新、规划融合、数据公开等方面为我国城市层面的雨洪管治提供了宝贵经验。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社区复兴——以华盛顿特区为例

西奥多·赵·林 殷一鸣

摘要：绿色基础设施利用雨水蒸发和下渗的自然过程就地管理雨水径流已得到城市规划领域的广泛认同。除了提供雨洪管理服务，绿色基础设施还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包括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增加社区服务设施、净化空气，甚至减少犯罪。美国联邦政府的雨洪管理法规对城市水质的要求日益严格，但改造老化的传统基础设施成本高昂，故绿色基础设施便成为实现雨洪管理目标更加有效的途径。本文追溯美国雨洪管理法规的发展对华盛顿特区社区政策之影响，在既有绿色基础设施与社区复兴的研究基础上，探讨由市场驱动的社区复兴其绿色基础设施的布局特征，并通过对政府雨洪政策、市民主动参与以及市场投资等因素进行叠置，分析不同社区类型可能建设的绿色基础设施情景。结果表明社区间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概率存在差异，再投资比例高的社区其布局绿色基础设施的可能性最高。

关键词：绿色雨洪设施；基础设施法规；社区复兴；空间分布式基础设施

引文格式：西奥多·赵·林. 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城市社区复兴——以华盛顿特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23-31. DOI: 10.22217/upi.2017.423.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雨洪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广泛认同，并付诸实践。绿色基础设施利用雨水蒸发和下渗的自然过程吸收并储存雨水，将其转化为资源，同时创造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多种效益，提升城市宜居性。为此，华盛顿特区将其作为城市复兴战略，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创建舒适社区，吸引居民回流。

在美国雨洪管理法规和政策演变的背景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向社区尺度深入。为解决城市雨水径流的污染问题，198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水法》修正案，将雨水径流污染的控制纳入国家污

染排放许可证制度。1994 年，美国环保署出台合流制溢流控制政策，确立了社区在雨洪管理中的重要性。随着美国环保署意识到雨洪管理过程中源头控制的重要性，作为当前源头控制的主要措施——绿色基础设施的应用得到进一步重视。

为响应联邦号召，消除雨污合流溢流，华盛顿特区通过多种途径推广绿色基础设施。首先，特区修订长期控制计划，加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次，通过《分区及土地发展条例》（《分区条例》）、《华盛顿特区市政管理条例》强制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其中，《分区条例》要求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时，

房地产商需要通过雨水最佳管理措施就地控制雨水径流，因此绿色基础设施布局受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除此之外，特区部门还通过智慧河流计划、雨水滞留信用交易系统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居民在私有产权的土地上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的推广与布局受到政府政策、居民参与、市场投资、经济激励措施等多因素的影响，将多种影响因子等权重叠置分析，模拟不同社区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情景，研究发现社区间的绿色基础设施假设概率存在差异，在投资比例高的社区布

局绿色基础设施的可能性最高。为保障居民公平地享有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规划师应有意识地在边缘化的社区布局绿色基础设施项目。

随着我国海绵城市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应逐步完善社区层面的雨洪管理法规及激励政策，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与管理模式。通过适宜性评价等科学分析方法评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次序与空间布局，注重社会效益与环境正义。

城市复杂建成环境下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径流的水质水量影响及规划布局研究

刘佳玉

摘要：本文比较了美国城市典型绿色基础设施的建成环境，以及其对水质水量的影响，通过分析纽约和费城城市范围内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提出绿色基础设施在中国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与灰色基础设施的改建相结合，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设施和布局，促进路边绿色基础设施在城市中的建设；（2）双管齐下，同时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在公共区域和商业区域的建设；（3）重视绿色基础设施定期维护，制定相应的维护规范；（4）长期监测、科学管理，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搭建中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布局和数据管理平台。

关键词：绿色基础设施；城市复杂建成环境；水质水文；布局

引文格式：刘佳玉. 城市复杂建成环境下绿色基础设施对雨水径流的水质水量影响及规划布局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32-40. DOI: 10.22217/upi.2017.421.

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下垫面环境的复杂化和不透水地面占比增加，使得雨水进行地下水补给的通路大幅度减少，雨洪风险增加；同时，雨水携带大量有机或无机污染物，通过相对集中的地表径流汇入自然水系，易造成水体污染。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致力于尽快将雨水导出城市，从而避免积水和洪水的发生。雨水最终通过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或者溢流到地表水源，不仅增大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和花费，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表水污染问题。

绿色基础设施是新兴的、基于低影响开发的雨水处理方法。绿色基础设施利用“土—水—植物”系统拦截雨水径流，雨水一部分经过滤下渗到周边土壤，一部分被蒸发到空气中，还有一部分被暂时滞留，然后返回污水系统。在美国，一些城市通过在复杂城市环境建设各类模拟自然雨水汇流过程

的绿色基础设施进行雨洪管理，达到降低和延后洪峰、减少地表径流量和净化水体的效果，改善了城市化对土地、植被和自然水体的负面影响。城市中典型的绿色基础设施包括：雨水花园、透水路面、屋顶绿色基础设施、地下绿色基础设施、雨水搜集回用系统。

本文比较了美国城市典型绿色基础设施的建成环境，及其对水质水量的影响，通过分析纽约和费城两城市范围内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案例，提出绿色基础设施在中国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与灰色基础设施的改建相结合，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设施和布局，促进路边绿色基础设施在城市的建设

首先，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改建紧密结合。建设具有成本效益的灰色基

基础设施，是保证绿色基础设施城市化建设的基础。由于绿色基础设施的雨洪调节效能和排出水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布局地点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应根据当地的地形特征和污染源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设施，并根据不同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和优缺点进行综合布局 and 加强改造，从而达到最优化的效果。由于道路在城市不透水表面总量中占很大比例，而道边绿色基础设施具有布局灵活的特点，所以应该重点和大胆地建设道边绿色基础设施。

(2) 双管齐下，同时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在公共区域和商业区域的建设

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一方面可以促进多部门合作，大力推行绿色基础设施与公共建筑的结合；另一方面应加强对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宣传和理论普及，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鼓励和刺激商业机构计划、建造和维护绿色基础设施。

(3) 重视绿色基础设施定期维护，制定相应的维护规范

参考有经验城市对于绿色基础设施的维护计划，重视植物生长周期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影响，根据当地绿色基础设施和环境特点具体制定相应的维护规范。

(4) 长期监测、科学管理，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搭建中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布局和数据管理平台

加强对绿色基础设施运行的长期监测，可以积累水文水质资料，为模型的完善和后续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在数据累积的情况下作出迭代、灵活的决策，从而在未来情形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合理地分配投资和资源；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以期为中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布局和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提供借鉴策略。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以西雅图为例

李雅

摘要：城市化导致城市河道渠化和生态退化。通过生态修复重建城市河道的自然动态过程，有助于提升河道生态系统功能，促进城市流域健康。本文概述城市河道修复的内涵和方法；以西雅图市河道修复项目为例，阐述修复设计与城市功能、雨洪管理整合的方法和过程，并评估其结果和价值。研究表明：河道修复是促进西雅图重构城市流域生态连接的重要手段，以及未来绿色基础设施网络规划的关键廊道和节点；在建成环境的限制下，西雅图发展了局部渐进的修复策略，为城市可持续开发、社区复兴提供了良好契机；各利益群体的参与和协作是实践得以推进的保障；评价应基于多元目标及价值。这些经验可为中国“城市双修”工作提供具体思路，促进城市可持续转型。

关键词：河道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城市流域；生态系统；社会效益

引文格式：李雅. 绿色基础设施视角下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以西雅图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41-47. DOI: 10.22217/upi.2017.424.

“城市繁荣指数”体系：指标、分析及政策的联结

黄燕玲 著 张丞国 译

摘要：本文为制定“城市繁荣指数”提出了一个更稳健和灵活的框架，力求让指标和数据分析与城市规划师及政府决策者的政策需求实现关联。联合国人居署新近制定的“城市繁荣指数”，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城市繁荣，采用的是更为渐进与平衡的政策议程，此举已引入一种更全面的政策路径，将生产力、基础设

施、生活质量、平等与社会包容，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整合为一个贯通的体系。以这个国际性议程为基础，“城市繁荣指数”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仍有可修正和提升的空间。或许我们也能以渐近的方式，让它成为更理想的政策工具，使其能真正应对城市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让不同区域的城市在各自的社会—空间情境下，实现可持续的繁荣。

关键词：城市繁荣指数；联合国人居署；指标；城市规划；空间动态；城市变化

引文格式：黄燕玲.“城市繁荣指数”体系：指标、分析及政策的联结[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48-54.

DOI: 10.22217/upi.2016.050.

国外城市形态对住宅能耗影响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吴巍 宋彦 洪再生 卢一华

摘要：明确住宅能耗的影响因素，提高住宅能耗的使用效率是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有效途径。城市形态作为影响住宅能耗的重要因素，国外早已从多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通过归纳现有研究成果，文章首先概括了城市形态对住宅能耗的影响机制；其次分别从住宅形式、树木、地表覆盖物、密度、社区布局等五个方面介绍了各因素与住宅能耗的关系；最后从未来研究和规划建议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形态；住宅能耗；低碳城市

引文格式：吴巍，宋彦，洪再生，等. 国外城市形态对住宅能耗影响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55-61. DOI: 10.22217/upi.2017.331.

当前，发达国家住宅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22%。而我国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高速发展，国内住宅建设总量不断攀升，加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住宅能耗也呈逐年升高的趋势。因此，分析影响住宅能耗的主要因素，探讨并制定有效政策进行引导，对于建设低碳城市意义重大。

罗比内特（Robinette）等一批国外学者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从城市形态角度展开了对住宅能耗影响的研究。通过梳理收集到的国外文献资料得知，城市形态中各因素或者若干因素的组合可以改变住宅周围的微气候，例如室内的热交换、室外的热岛效应和风环境等，进而对住宅能耗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五类：住宅形式、树木、地表覆盖物、开发密度和社区布局。其中，住宅形式包括住宅类型和面积，它对能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室内热交换方面，不同类型的住宅蓄热性能有所差别，一般体形系数【体形系数指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体积的比值】越小的住宅能耗相对较低，面积小的住宅能耗相对较少。由于室内热环境对能耗的影响较为直接，所以住宅形式对能耗的

影响程度高于其他因素。树木和地表覆盖物主要通过热岛效应改变局部的微气候来影响住宅能耗。阿克巴里（Akbari）等人的研究认为树木是对室外微气候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通过遮挡控制太阳射入、蒸腾作用以及自然通风来影响住宅能耗；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地表覆盖物由于其太阳能反射率的不同会对住宅能耗产生影响；开发密度和社区布局对住宅能耗的影响相对较弱。现有研究结论中关于密度和布局对能耗的影响存在争议，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环境下住宅能耗需求有所差异，所以有利于节约能耗的开发密度和布局形式亦有所差别。

由于人口密度、土地成本和发展阶段等诸多原因，国外城市建设与我国差别很大，无论是容积率、建筑密度，还是住宅类型和社区环境。

因此，在研究我国城市形态与住宅能耗的关系时应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形态指标。此外，还应该注意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住宅所处的气候特征不同，则能耗需要亦有所差别，同一指标在不同环境下对住宅能耗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例如，寒冷地区住宅供热能耗需要大于制冷能耗，而在热带地

区则恰恰相反，同样的建筑密度在寒冷地区有利于住宅节能，而在热带地区或许会增加住宅能耗。所以一种节能的城市形态不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城市。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结合区域特点，分析特定环境下有利于节约能耗的社区形态。

为了保证研究设计出的节能城市形态可以落

地实施，笔者建议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在编制城市总规时首先应提出具体的住宅节能总目标，再基于总目标对各类城市形态指标分别提出具体的节能实施策略，最后应针对前述目标和策略开展评估，多方位地促进低碳城市建设。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风险相关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邹志翀 冷红

摘要：自然灾害是生态系统的原生组成部分，当它与城市系统发生冲突时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适应性的城市规划能够基于对灾害规律本质的认知，避免或有效降低灾害的冲击，进而减少灾害风险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有其独特的发生、发展、蔓延和演化的规律。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长足发展为其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对不同学科在澳大利亚森林火灾规律、城市火灾风险和社区火灾脆弱性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分析，并简要介绍现行的澳大利亚首都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中的火灾保障区和火灾缓冲区的设置方法。澳大利亚多学科交叉的火灾相关研究促进了其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的发展，其中的宝贵经验和科学做法对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澳大利亚森林火灾；自然灾害风险；灾害风险脆弱性；火灾缓冲区设置

引文格式：邹志翀，冷红.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风险相关研究进展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62-72. DOI: 10.22217/upi.2016.027.

国内外城市规划工作中受到普遍认可的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是以理解和尊重自然生态客观规律为前提，倡导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平衡发展的开发方式。森林火灾是澳大利亚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火灾都会烧掉几千万公顷的灌木、草地和森林。对于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居民来说，森林火灾带来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森林火灾经常造成房屋损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为了解决人类活动与自然灾害的冲突，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空间上优化布局，减小火灾蔓延到城市区域的可能性。当火灾与城市的冲突在空间上不可避免时，城市规划需要在充分理解并尊重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的基础上，提供合理的抵抗、规避和疏散方案，以减小灾害的冲击和影响。

澳大利亚火灾适应性规划研究工作成果是基于城市规划师在空间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统计学和管理科学等

众多学科在火灾和城市研究领域的协调发展。众多相关学科的长足进步为制定和落实可靠的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方案奠定了必要理论基础。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案，将众学科的研究成果凝聚在以保障社区安全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中，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以城市规划为核心引领其他学科共同解决城市问题，是城市规划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下称“首都特区”）是典型的森林火险高危内陆地区，在应对森林火灾威胁时有其先天的脆弱性。目前依据首都特区总体设计规范要求，堪培拉的城市及其周边任何的土地开发活动必须首先进行综合自然风险评价，任何住宅区的开发必须首先完善火灾保障区和火灾风险缓冲区的设计。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的预测,首都特区整体的森林火灾风险暴露度将会有显著的大幅度升高。首都特区土地利用与规划管理局根据上述预测,以草地火灾风险指数、森林火灾风险指数、火灾燃料荷载和起火可能性为主要指标,计算得到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风险暴露度;以森林火灾强度、当前应急救助点状况和消防设施密度为主要指标,计算得到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风险敏感性;同时,综合考虑环境因素、人口因素和社区文化因素的火灾脆弱性。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包括对火灾暴露度、敏感性和脆弱性三个方面的评价。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主要是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划定森林火灾易发区、火灾管理区、森林火灾缓冲区以及政府用地管控。

虽然澳大利亚有完善且详尽的联邦规划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但是具体的规划项目往往优先采用州政府出台的法规和标准作为规划依据。在防灾、交通和遗产保护等专项规划研究工作上往往“专事

专办”,在遵照联邦和州立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采用由相关学科研究提供的相对前沿的“本地参数”。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细化联邦和州立标准的使用,使得规划方案更符合地域性需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其他学科提供更多能服务于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成果,吸引更多其他行业专家共同解决城市规划问题。

受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城市自然灾害暴露性将会有所增加。如何在灾害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解决好未来的城市矛盾,澳大利亚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道法自然,充分理解并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是适应性城市规划的基础。恰当地将地域化参数引入相应的专项规划研究,不仅能够解决国家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过于宽泛的问题,而且能够吸引更多其他行业专家共同解决城市规划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城市规划为核心,倡导并引领其他相关学科共同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是未来城市规划研究发展的方向。

生态视角下的“城市之城”:来自“博洛尼亚七城”结构规划的思考

朱静宜

摘要:世界范围内,城市普遍呈现分散化与多元化趋势。这种碎片化一方面来自固有的自然地理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的不均衡与多样所致的复杂的人口流动而越发明显,单一的城市逐渐演变为“城市之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战略性规划需要有新的思路与工具。本文以班纳姆的“生态”为出发点,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市结构规划为例,探讨“城市之城”背景下的“生态”规划思路,指出采用“生态”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认知城市内在的特质,建立对城市现有特征与未来发展目标的结构性认知,从而引导城市在复杂与差异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城市之城”;博洛尼亚;结构规划;生态;城市片段

引文格式:朱静宜.生态视角下的“城市之城”:来自“博洛尼亚七城”结构规划的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8(3):73-82. DOI: 10.22217/upi.2016.107.

全世界范围内,城市普遍呈现碎片化趋势,这种碎片化一方面来自固有的自然地理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的不均衡与多样而复杂的人口流动而越发明显。原有的紧凑城市逐渐解体、城市边界趋于模糊的状态,产生众多的城市斑块与城市碎片。

面对物质形态与生活方式的越发丰富,当代城

市将发展演化出新的特征。单一化的城市将进化为“城市之城”(City of Cities)。“城市之城”是近年来流行于欧洲规划界的概念,描述了当代城市整体清晰结构的缺失与其越发复杂的构成,指出其斑块的特征,并强调多元的物质空间形态和经济发展及多元的人口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反馈关系。

“城市之城”首先是认识城市现实的新观念与

描述城市现实的新框架。它承认城市中愈发多样的人口组成与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试图整合城市的不同功能，包容或简单或复杂、或开放或封闭的多样城市形态。当代城市不再是均匀与连续的，而是由众多不同形态的城市碎片聚合而成的复杂聚合体，每一种城市形态都需要不同的理解方式与具有侧重的发展策略。

同时，“城市之城”也是重要的规划手段与工具。对于今天的城市而言，承认多元独特的空间与社会特征的城市片段的共存是重要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要为它们的共存创造新的发展框架与新的规划手段。由于已有的城市项目、相应政策与未来行动计划目标的不同，城市片的特征越发明显，而整个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正有赖于对这些城市片的特色的识别与差异性对待。“城市之城”作为规划手段的意义在于识别并最大程度利用城市片之间的差异，集中不同的资源，提出不同的发展方向，而非试图用统一的框架将所有城市地区一并包容。

“博洛尼亚七城”城市结构规划就是利用“城市之城”的思路对城市进行认知与操作的一次实践，其最富有创见的规划手段在于利用这一概念对七个各具特色的城市区域，即“博洛尼亚七城”（Le Sette Città di Bologna）的识别。“博洛尼亚七城”以区域内最重要的元素命名，包括铁路之城、环城路之城、山丘之城、雷诺河之城、萨维纳河之城、西

艾米利亚大路之城与东艾米利亚大路之城。这些地区有各自富有地方特征的城市建设项目以及政策与法规，区域之间既有鲜明的对比又有紧密的联系。七城各自有不同的空间和人口组成，人们在这些“城市”中有着不同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城市图景的想象。今天的博洛尼亚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性而成为丰富多彩的城市范本。制定城市结构规划的目的，就是在于最大化地利用这种丰富的差异性，避免将整个城市地区错误地当作均质的单一连续体，而在识别它们差异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实行不同的城市发展策略。每座城市最终都成为一项城市重组项目，将过去的建设项目、城市的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并给予其一个统领全局的图像。七城既是对现有城市特征的总结，也是对城市未来的展望。这种描述方法重现了城市中的生活，分析了城市扩张的过程，描绘了一幅幅对整个大都市区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图景，并通过制定具体的目标，为提升物理空间的品质提出具体发展策略。

“城市之城”的概念来源于对欧洲城市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思考，对今天我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无疑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无论是区域发展规划，还是城市总体规划，面对的城市都不再是单一连续的，而是多样碎裂的。如何认知差异化的城市碎片并用新的规划手段赋予它们新的结构，是值得思考与实践的议题。

走向韧性规划：基于国际视野的三角洲规划研究

戴伟 孙一民 韩·梅尔 塔聂尔·库聂考·巴顷

摘要：本文针对三角洲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分析了韧性规划对未来三角洲城市发展的指导意义，从研究方法、管理手段及空间组织策略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韧性理念下三角洲城市规划理论与工程实践现状；重点剖析了美国、荷兰等国家的三角洲城市规划典型案例；阐述了我国三角洲城市规划需考虑的基本原则、制定步骤与存在的困难，提出未来三角洲城市韧性规划研究中五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城市发展；规划与设计；韧性；三角洲城市

引文格式：戴伟，孙一民，韩·梅尔，等. 走向韧性规划：基于国际视野的三角洲规划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83-91. DOI: 10.22217/upi.2017.384.

随着高速城市化的进程，生态失衡、水网受损改变了三角洲的自然本底适应能力。如何平衡自然本底与城市发展的需求，使三角洲发展适应气候变

化，已成为政府、规划部门和研究机构面临的重要任务。针对三角洲生态本底脆弱、发展导向不确定、系统内部要素变化复杂、系统外部扰动频繁等要因，

正确认知韧性城市的概念并实践其规划方法对于未来三角洲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认知方法上，韧性城市强调系统中要素的联动变化规则，强调多元与多样、冗余与模块、多尺度网络、自组织的要素组织方式。在规划与设计实践中，韧性城市强调对系统科学的理解，强调对多时空协同演进的探索，强调对扰动的预判，强调历史研究、预测模拟与情景规划的综合应用。

韧性规划目前是国际三角洲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核心内容。研究方面，垂直分层研究，经济系统—生态系统耦合性研究，韧性管控研究，智能预警与防护计划研究均成为有益的探索。实践方面，荷兰鹿特丹、美国纽约、美国新奥尔良等城市应对不确定性的规划与设计，虽然其类型、尺度都不同，但韧性规划的理念已扎根其中。

综合而言，科学系统的韧性规划需要结合研究与实践。笔者基于对理论的理解和对案例的总结，认为其可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1）明确焦点问题；

（2）明确对象尺度、控制参数、控制模型等；（3）对象特征剖析及风险评估；（4）对象多时空动态演进规则探索；（5）情景规划与绩效分析；（6）制定规划路径；（7）建立评价体系；（8）实施中的规划调整。

我国三角洲城市规划在借鉴西方优秀案例的同时，应处理好发展转型、自然条件变化、产业转型、人口流动、综合性土地利用、管控兼顾性等问题，跳出传统，从分析研究系统的复杂性、平衡性与不确定性入手，充分发挥韧性规划在未来三角洲城市规划中的作用，促进三角洲城市韧性发展。

“底限控制”到“精细化”——美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的代表性方法、演变背景与特征研究

杜伊 金云峰

摘要：提升城市休闲功能是城市更新的研究内容之一。公共开放空间作为城市休闲功能的主要载体，其规划如何引导城市生活空间良性发展值得关注。首先，对中美公共开放空间及规划概念作相关阐述；以美国为例，概述美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历史及代表性方法；从人口统计数据的运用、总体规划框架下的发展、游憩学研究的支撑以及与空间分析技术的结合等四个方面讨论规划演变的背景与思想，并且从规划应用、规划内容以及规划数据分别探讨“底限控制”与精细化的特征；最后从价值、指标、方法等方面反思对我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的启示。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共开放空间；底线控制；精细化；规划方法

引文格式：杜伊，金云峰。“底限控制”到“精细化”——美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的代表性方法、演变背景与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92-97, 147. DOI: 10.22217/upi.2017.405.

公共开放空间是城市休闲游憩活动主要载体。在我国，传统所说的公共开放空间主要指城市公园绿地、广场绿地等，属于狭义概念的公共开放空间。在国际研究领域，公共开放空间包括公园和绿色空间以外的街道、广场、沙滩以及更为广泛的河流、运河、水库等非公园空间。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已进入城市更新阶段，需要从有限的土地中置换和升级城市功能，而存量用地之间存在博弈，城市绿地难以维持快速大规模增长，但城市居民的休闲游憩需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

在不断累积增加。未来可行的路径是扩展公共开放空间的用地载体，并且相比于在数量规模上达到公共开放空间的指标，更应在实践中关注步行可达性、设施、质量等因素。

美国在公共开放空间的规划与方法发展中，出现了比例法、系统规划法（LOS 法）和复合价值法（GRASP 法）等代表性方法。复合价值法作为诞生于 2001 年的最新评价方法，由于兼顾质量、条件、位置、舒适性、便利性等复合特征被广泛认可，已在美国 23 个州的 120 多个公园与游憩服务项目中

得以运用。

GRASP 法的主要公式为：

复合价值得分=要素功能总分×修正项得分×
设计与舒适性得分×所有者修正变量

其中的关键是要素（components）与修正项（modifiers）。

计算步骤是由专业人员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弄清社区具体需求，对比 GRASP 法的要素标准化清单进行社区内公共开放空间的要素收录，进而为修正项打分，最终要素的复合价值以图形、地图以及管理表格等方式进行信息存储。

GRASP 法不是简单视服务为一个整体，而是拆解了公共开放空间内部所有空间和设施的服务，是对每个居民点获得服务水平的精确描述，可以直

观反映不同居民点步行范围内能享有的公共开放空间服务差异。

美国公共开放空间规划与方法演变与人口统计学、规划体系、游憩学、空间分析技术等学科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逐渐由“底限控制”转型为“精细化”，两者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美国经验从价值、指标与方法对我国未来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具有启示。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中提出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说明我国官方已逐渐关注小尺度、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精细化规划，这是发展必然也是未来趋势，值得更多学者参与研究，为未来我国存量规划中公共开放空间与其他用地的博弈协同发展提供依据。

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

廖开怀 蔡云楠

摘要：巴塞罗那具有悠久的街区公共空间复兴历史。近年来，出现了以复兴街区道路空间为目的，倡导把道路归还给行人的“大街区”规划革新。本文介绍了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产生的背景，探讨了大街区规划方案的理念，以及其与传统街区、封闭社区之间的不同，并阐述了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方案的内容和实施机制，旨在为我国推广街区制居住模式和街区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巴塞罗那；大街区；步行性

引文格式：廖开怀，蔡云楠. 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98-104. DOI: 10.22217/upi.2017.304.

巴塞罗那近年来提出了“大街区”(superblock)规划革新。旨在解决机动车的大量使用带来的城市 NO₂ 和 PM₁₀ 排放超标、环境噪音严重、局部交通拥堵和道路资源闲置等诸多问题。大街区规划理念倡导把城市道路空间归还给市民，让街道充满生活。通过减少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和使用，降低环境污染，创造更绿色、更干净和更加适于步行的街区城市。

大街区的规划方案设计把 9 个相邻的传统街区单元组成一个尺度约为 400 m×400 m，居住人口 5 000~6 000 人的交通管制区。大街区内部道路禁止公众汽车通行，仅允许街区居民的汽车和消防、救护车等服务性车辆出入，并限制汽车的通行速度（小于 10 km/h）和直线穿行。

大街区常常被误解为当前流行的封闭社区居住模式；实际上，大街区有别于传统小街区和封闭社区的概念。大街区具有用地规模适中、功能混合、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服务范围大和步行性强等特点。

大街区方案强化了对街区道路步行性的设计。相比封闭式社区，行人在传统街区的步行虽然没有围墙的阻碍，可以直行，但是由于街区规模小，街区之间的红绿灯多且等待时间长，降低了步行的流畅性、便利性和安全性。大街区方案可以保障步行的流畅和安全，规避了上述问题。在时间上，直行穿越大街区要比穿行 3 个传统街区节省约 15% 的时间，同时由于大街区内部道路对机动车限行限速，步行更舒适和安全。

巴塞罗那大街区总体规划以大街区为基本单

元对城市空间肌理进行了新的组织和梳理，全市共规划了约 500 个大街区，规划实施后城市路网由密变疏。通过交通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对大街区内部道路的使用。如巴塞罗那拓展区的街区道路交叉口面积普遍偏大，约为一个小型市民广场的面积。实施大街区规划方案后，可将 120 个十字路口（面积共 23 hm²）转换为小型广场，并将 60% 的道路空间转变为市民公共活动空间，行人道路总面积

由原来的 74.5 hm² 增加到 750 hm²。

巴塞罗那具有悠久的街区公共空间复兴历史，从采取“针灸法”的街区内部空间复兴，到现在的“大街区”规划革新，不断塑造和增强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巴塞罗那实施大街区建设后，城市道路得到重生，恢复了活力。规划方案获得西方国家的好评，并被法国巴黎和美国曼哈顿等西方城市所借鉴。

国内外城市智能规划技术类型与特征研究

甘惟

摘要：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在城市规划领域逐步形成智能规划的技术方法。本文首先对城市智能规划的概念进行研究界定，认为城市智能规划是通过多种智能技术辅助城市规划理性分析和科学决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整理了过去 30 年以来形成的四类城市智能规划技术，分别是：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城市定量分析技术、城市动态模拟技术以及城市智能交互技术。之后对每一类城市智能规划技术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提出城市智能规划的五项技术特征，分别是：大数据、自动化、交互性、复合型和生长性。最后，作者介绍了城市智能模型平台（CIM）——可以作为未来城市智能规划的一种可能的技术载体，整合城市时空大数据及运行各类城市模型，从而支撑城市规划的智能决策。

关键词：城市智能规划；城市模型；信息技术；智慧城市

引文格式：甘惟. 国内外城市智能规划技术类型与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05-111. DOI: 10.22217/upi.2017.420.

人工智能的概念自 1956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以来，一直以机器模仿和执行人脑的某些智力功能为研究目标。2016 年 3 月，以 AlphaGO 战胜围棋世界冠军为标志事件，以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语义识别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到今天，各行各业都能或多或少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子，甚至引发了人类对于未来就业岗位及伦理道德危机的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反观城市规划学科与行业的智能水平就显得意义重大。

城市规划，从早期的建筑学、市政工程领域融入设计美学的感性创造和 20 世纪初兴起的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之后，已演变成一门包罗万象的复杂科学。城市规划方法，也经历着由传统的基于美学修养和经验知识的感性判断，向人工

智能技术支撑的理性规划转变的过程。笔者试图给出一个广义的“城市智能规划”概念，即，通过多种智能技术的应用来完成一部分在过去城市规划过程中必须由人脑完成的工作，进而更加高效、精准地实现规划目标。

早在 1950 年代就出现了城市模型研究，这一时期恰恰是城市规划理论从艺术向科学转型的关键时期，诞生了系统规划、理性主义及控制论等经典理论，为后来大规模的计算机动态模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本文中，笔者将近年来出现过的智能规划技术归纳为四类：（1）计算机辅助建模技术，从繁重的绘图工作中解放了规划师的双手；（2）城市定量评价技术，解放了大量数据分析的脑力工作；（3）城市动态模拟技术，解放了预见未来的创造性工作；（4）城市智能交互技术，将人的干预与城市

发展联动起来，大大增强了城市计算的可靠性。

笔者在 2012—2015 年师从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期间，就曾尝试开发过城市智能规划的原型系统，并抽象出一种人为干预与计算机自主评估推演之间的智能化反馈机制，为研究积累了不少技术实践经验。

本文最终提出，目前的城市智能规划技术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1）大数据；（2）自动化；（3）交互性；（4）复合性；（5）生长性，已能够依

靠真实的城市数据，通过计算、反馈、迭代的方式模拟复杂系统中的关联影响，预见并展现城市发展的未来。然而，与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语义识别等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相比，城市规划领域的智能化仍处于极为初级的阶段，甚至还谈不上达到弱人工智能水平，相关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笔者期待本文可以为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更深层、更精细地应用在城市规划领域提供一些技术参考。

欧洲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

陆明 付婧莞 杜江涛

摘要：我国对于太阳能的研究在建筑层面已经比较成熟，但在城市层面才刚刚起步。通过对欧洲太阳能城市前沿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在太阳能城市的设计框架下，针对规划过程中城市分析与建模、太阳能潜能估算、城市文脉保护以及太阳能一体化质量评估的不同阶段总结了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并以太阳能地图的制作与应用为例展示了实践成果，同时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城市风貌、规划实施与教育宣传。对于国内城市层面的太阳能利用可以在理论研究、规划方法、设计工具与政策体系上借鉴欧洲经验，建设本土的太阳能城市。

关键词：太阳能利用；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太阳能地图；欧洲经验

引文格式：陆明，付婧莞，杜江涛. 欧洲太阳能城市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12-117. DOI: 10.22217/upi.2016.149

欧洲国家为了在历史传承与快速城市化中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以缓解能源危机，通过积极推进太阳能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来实现零能耗的目标，将太阳能利用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风貌等相结合，达到太阳能利用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我国将太阳能资源在城市中的应用作为未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但在城市层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本文通过总结欧洲太阳能城市的研究进展，从理论研究、规划方法、设计工具与政策体系等方面总结经验，促进太阳能城市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太阳能城市规划的核心在于将城市中经济、社会、空间和政策等因素与太阳能利用进行统筹规划。太阳能城市的规划设计包括目标定位、数据分析、规划设计和实施评价四个阶段。利用该设计框架，可以对城市区域进行建模分析，获得太阳能城市规

划前后的太阳能利用情况对比，提高城市的能源效益。要实现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城市空间规划与太阳能利用进行交互设计。

太阳能城市规划中涌现出很多新方法。地理城市单元划分模型（GUUD: Geographical Urban Units Delimitation）通过提取城市形态中各个单元的典型特征，对比分析不同街区形式中建筑屋顶对太阳能的利用情况，为城市中太阳能的利用与管理提供依据。建筑与光伏一体化的太阳能潜能估算法（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为太阳能城市的选址与优化提供依据。Leso-QSV（Quality-Site-Visibility）方法在促进太阳能利用的同时，为保护城市风貌提供了评估依据。

太阳能地图（Solar Map）不仅作为面向市民的前端平台，告知他们自家屋顶的太阳能利用潜力；同时也是面向城市管理者的后端工具，成为能源利

用决策的基础。

国际能源署 51 号课题提出的研究框架强调，太阳能城市未来的研究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现状评价和应用阶段中的技术方法，还要关注景观风貌与城市文脉、强化宏观层面与规划实施，以及重视专

业教育和社会传播。我国作为国际能源署的一员，可以从以下方面借鉴欧洲太阳能城市的发展经验：

（1）注重跨学科研究；（2）发展太阳能空间规划策略；（3）建立太阳能应用数据平台；（4）平衡城市多方需求；（5）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传统田园的现代演绎：荷兰兰斯塔德乡村地区建设策略

王宁

摘要：在中国休闲经济和消费时代背景下，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区所展现出的生态和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有关城郊乡村地区保护与建设方式的探讨也在不断增加。荷兰兰斯塔德作为开放型城市群的典范，其当代乡村建设策略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借鉴意义。本文分别从景观塑造、保护机制和功能组织等三个方面，梳理兰斯塔德乡村的现阶段特征与建设策略，并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兰斯塔德田园景观在经历农业现代化进程之后，逐渐向传统与质朴的营建理念回归；第二，尽管兰斯塔德城市群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问题，但对于区域结构性绿地的保护贯彻始终；第三，兰斯塔德乡村的休闲功能正在不断强化与完善，并且由多层次的空间系统和慢行网络进行支撑。本文旨在探索国际成功经验，为我国类似地区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兰斯塔德；乡村景观；开放空间保护；休闲功能

引文格式：王宁. 传统田园的现代演绎：荷兰兰斯塔德乡村地区建设策略[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18-124. DOI: 10.22217/upi.2016.508.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所著的《发现乡土景观》一书中写道：“对乡土景观的认识可以加深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行走在荷兰的田园之中，并逐渐认识兰斯塔德的乡村建设历程，的确会让人收获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源自于当地人们对于这片土地所倾注的深厚感情。荷兰人热爱并追求田园生活，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对家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都进行精雕细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散发出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会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访客产生强烈共鸣。荷兰乡村的优美图景以及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共鸣，是本文写作的最初动力。

在我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空间的扩张，紧邻大城市的乡村地区通常充斥着十足的发展契机与发展动力。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诉求，都市人群日益增加的休闲活动需求在此交织叠加，原本脆弱的乡村环境备受压力，优美而秩序化的田园环境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近年，中央高度关注乡村发展与环境建设，国家对乡村环境的保护以及生态资源价值的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供给端视角的乡村

空间研究也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荷兰，兰斯塔德地区在持续的大城市扩张压力之下，至今仍保持着高品质的乡村环境和清晰的城乡空间边界，与此同时，该地区乡村的休闲特质被不断强化，田园空间被逐渐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价值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本文基于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以乡村空间为立足点，重点梳理兰斯塔德乡村地区在景观塑造、结构性绿地保护和休闲场所营建三方面的策略，总结其成功经验，希望能够对中国当代语境下的乡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有以下三个核心结论。

（1）兰斯塔德乡村建设自以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前提

对城市之间的乡村环境进行保护，是兰斯塔德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实现保护的途径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持续政策支持以及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首先，荷兰国家空间政策始终将建立开放的城市群结构和紧凑的城市内部结构作为主要目标，绿心和缓冲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撑。在绿心地区，政

府通过持续的限制性政策，配合新城建设，以及对住宅和工业发展征税等手段控制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在缓冲区，主要通过政府的财政和立法支持，发展休闲功能等策略，实现乡村空间的保护。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撑以外，民间组织也是推动乡村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其在保护与建设的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兰斯塔德结构清晰的乡村空间系统承载着丰富的休闲游憩活动

兰斯塔德具有层次鲜明、结构清晰的开放空间系统结构，并且承载着丰富的休闲娱乐功能。首先，荷兰西部城市之间保留着以绿心和缓冲区为主的高品质乡村环境，紧凑城市等政策使城乡之间保持着清晰的边界。第二，随着观念的转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呈斑块状分布的自然保护区在绿心和缓冲区内逐渐增多，它们大多由森林、湖泊、湿地、沙滩等自然景观构成，并以纯粹的休闲游憩功能为主。除此之外，在城市边缘地带，小尺度的家庭农场补充了高密度城市相对缺乏的绿地、花园和私人休闲空间，并通过自身地位的不断稳固，逐步融入城市绿地生态结构之中。在此基础上，人们利用圩田中的乡间小路和田埂建立起自行车网络，依托历史上的拖船河道开辟出水上游船系统。蓝绿交织的慢行系统，不仅使得大尺度田园环境具有了网络化的空间特性，同时将分散的自然保护区与休闲娱乐场所紧密联系起来。各个村庄在这一系统中主要起到服务节点的作用，一方面提供餐饮、住宿等基本服务，另一方面集聚了露营地、游船码头等休闲娱乐设施，同时，还作为城乡公交和自行车的转换节点。

(3) 兰斯塔德乡村景观营造以尊重历史和回归质朴为核心理念

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简单质朴的追求是兰斯塔德乡村景观塑造的核心理念。首先，荷兰乡村的圩田是一种人工化的历史景观，它是在水利系统建设

以及法律、土地权属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在经历 20 世纪初由农业现代化所引起的景观变革之后，政府及公众重新认识到了历史景观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对农业历史景观的保护成为新的趋势。除此之外，兰斯塔德地区的村庄建设始终将历史环境的保护和新旧风貌的融合作为重要原则，并且，有一批新乡土风格的建筑逐渐出现，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蕴含着当代气息。在环境小品的塑造方面，无不透露出简单、质朴的特质，以及与田园环境相融合的设计理念。

兰斯塔德地区的乡村建设，为我国相类似地区提供了以下三方面启示：首先，在建设理念上，乡村环境的利用或建设，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而不是新建或“重塑”的过程，对于自然和历史环境的保护是首要原则，并且需要整体性的思路和持续性的政策作为保障。

第二，从休闲功能方面来看，目前我国一些城市或地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城郊乡村环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并试图对这类地区进行开发和利用。从荷兰的乡村建设来看，发展休闲功能应以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作为主要目标，而非经济利益，无论是新增的自然保护区域还是新建的休闲游憩设施，都是为了让公众更好地接近自然，享受田园环境，并提升周边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品质。因此，在城郊乡村环境建设中，应避免变相发展城郊休闲产业而导致建设用地的不断增加，以及乡村环境的持续破坏。

第三，在乡村风貌塑造方面，应更加注重对乡土和自然环境的尊重，以及对简单、质朴设计理念的回归，而不应为了风貌而刻意“塑造”风貌，为了特色而“创造”特色。如何构建能够真正融入乡土，并符合当代语境的乡村环境，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非洲英属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实践：1851—1960 年的港口之城拉各斯

王建竹

摘要：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城市规划的研究仅限于个别英文文献，而殖民时期的空间政策或是其略作修改的版本仍主导着当前非洲的空间发展计划，倘若没有对殖民空间政策和目标的充分认识，这些空间发

展的尝试与努力将难以获得成功。本文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城市，也是殖民时期英国在西非最重要的殖民城市——拉各斯为例，对 19 世纪中叶—20 世纪中叶非洲英属殖民地的城市规划进行探讨。文章阐述了殖民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主要空间政策与规划实践，并结合欧洲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分析了殖民城市规划的历史和哲学基础，最后对殖民城市规划和殖民现代性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殖民城市；城市规划；殖民现代性；拉各斯；非洲

引文格式：王建竹. 非洲英属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实践：1851—1960 年的港口之城拉各斯[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25-132. DOI: 10.22217/upi.2017.057.

滨海城市岸线利用方式转型与空间重构——巴塞罗那的经验

程鹏

摘要：以港城空间关系演变为线索，回顾了巴塞罗那滨海岸线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重点分析和评价了巴塞罗那滨海岸线的利用方式与功能格局、公共设施与开放空间、交通体系、景观体系和岸线设计等空间发展要素与格局。一方面，解读其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认识滨海岸线利用的阶段特征；另一方面，关于空间发展要素与格局的解读对于我们适时开展滨水地区规划实施评价、塑造地方特色等具有启发性。

关键词：滨海城市；岸线利用；空间重构；巴塞罗那

引文格式：程鹏. 滨海城市岸线利用方式转型与空间重构——巴塞罗那的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33-140. DOI: 10.22217/upi.2016.318.

我国城市大规模的滨水地区规划建设和再开发已进行 20 余年，目前这一进程仍方兴未艾，同时大众对于滨水空间的需求日益提高，而滨水空间普遍缺乏地方特色等问题也日益显现，探索岸线资源的适时合理利用方式、优化滨水区域与城市空间的整体协调关系、塑造滨水区域空间特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聚焦巴塞罗那滨海岸线利用和滨水空间格局的分析与评价，以期在空间分析与实施评价方面积累一定的研究基础。

以港城空间关系演变为线索，文章首先回顾了巴塞罗那滨海岸线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历史的荣光和与大海的隔绝、大海在城市的背面，以及城市向大海开放。港口的发展经历了布局、拓展和专业化阶段，引导了巴塞罗那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在岸线利用与功能格局方面，岸线功能的适宜性成为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的首要原则，遵循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的原则，巴塞罗那的生产性岸线分布在南部的深水区域，生活性岸线分布在水深较浅的北部区域，顺应了后工业时代交通运输方式的转型和城市消费空间的发展需求。用地功能的耦合性体

现在腹地功能与岸线利用相匹配，使得城市活动与城市肌理得以向滨海岸线区域延续。

开放空间与公共设施方面，确保滨海岸线的公共性是城市居民和游客共同享有这一开放空间的基本保证，巴塞罗那生活性岸线区域的开放空间包括沙滩浴场、游艇码头、公园绿地和道路广场等类型，9 块向公众开放的沙滩构成了开放空间的主体。多元化的公共设施体系是良好的空间环境之外吸引城市居民和游客的又一重要因素，包括滨海岸线公共休闲带的多元业态和沙滩浴场完善的配套设施。

更加重要的是，滨海岸线与城市特殊的空间关系要求强大的道路交通体系扩展到这一城市边缘区域，以保证滨海区域良好的可达性，支撑富有生机的多样化活动。工业时代遗留下来与海岸线平行的铁路以及环城快速路构成了巴塞罗那城市与海岸线之间巨大的障碍，通过拆除沿海铁路线、快速路入地和道路上跨等一系列改善道路交通体系的措施，巴塞罗那成功缝合了城市与海岸线之间的裂痕，也延续了传统城市肌理格局。

景观体系与岸线设计方面,“山—海—城”历来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景观要素,随着城市向大海开放,滨海景观愈加成为巴塞罗那城市意象的主导因素。通过建筑高度和视线通廊控制等手段,巴塞罗那保护了山体景观和历史风貌格局,滨海岸线与城

市、山体之间建立了具有丰富层次性的景观格局。针对不同岸线的区位以及与城市腹地的关系,巴塞罗那采用了不同的岸线处理方式,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格局和亲水体验性。

老城排水系统改造的绿色方略——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王思思 李畅 李海燕 袁冬海

摘要:我国目前正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老城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对美国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实施过程、监测评估以及成本效益进行介绍,并针对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挑战及解决方案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期为我国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的方略、目标、建设方案的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绵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纽约市

引文格式:王思思,李畅,李海燕,等.老城排水系统改造的绿色方略——以美国纽约市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8(3):141-147. DOI: 10.22217/upi.2017.220.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不透水表层的比例不断增加,致使城市下垫面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水循环系统,使得城市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及水环境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为了解决城市化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我国掀起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热潮。而老城由于面临地上和地下问题的特殊性,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焦点与难点。纽约市为解决合流制溢流污染问题,采用绿色基础设施和灰色基础设施相结合的改造方略。通过回顾和分析《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及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为我国当前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1 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带来最直接的效益包括削减雨洪峰值,减少雨水径流量,控制雨水径流污染,降低合流制管网系统的溢流量及溢流频率。此外,绿色基础设施还可以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效益,包括区域土地增值,降低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绿化率,增加绿色空间,净化空气,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为市民提供舒适的居住及娱乐场所,提升城市固碳能力等。这些优势都是通过传统方式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所无法比拟的。

2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通过灰绿结合的方式处理雨水径流污染及合流制溢流问题,从而提高老城的排水能力,改善水体水质。此规划的目标是改造雨污合流制区域的 7 875 英亩(约 32 km²)不透水区域,到 2030 年实现不透水面积减少 10% 的目标,并将目标分解为四个五年去实现,即第一个五年内改造 1.5%,第二个五年内改造 2.5%,第三个五年内改造 3%,第四个五年内改造 3%。

从 2011 年开始,纽约市每年编制《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年度报告,对当年的主要进展、新形成的制度机制、各类项目的实施情况、目标的落实情况、适应性管理情况、经验教训以及典型案例等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年度的具体计划。在纽约市排水系统的绿色改造过程中,对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工作的重视程度被不断提升,甚至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对生态效益的评估将直接影响城市的政策制定和政务的审批流程。纽约市对绿色基础设施生态效益的重视,与这个时期美国政府重视温室气体减排,积极推动“碳减排”,倡导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老城排水系统的绿色改造方略在成本上优于传统的灰色改造计划,它大大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的改造投入以及日后的升级费用,同时对化石能源的

节约也使得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更为经济。在初期阶段，由于需要新建大量绿色设施，所以其建设和维护费用会比灰色设施略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设施的成本会远远低于灰色设施的成本，因为管道的建设、修复和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扩建会使成本居高不下。

3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在纽约市，对地上和地下空间进行大规模改造的难度极大。在近几年规划实施过程中，有限的空间、时间及地质土壤等本底条件都是制约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阻碍了工程施工的推进。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如纽约市的雨污合流制管网系统达 2/3 之多，建材采购时间过长、工程建设资金来源、公民的游行反对及城市中其他的一般性限制因素均成为工程如期进行的极大挑战。

纽约市环保局为了实现改造目标，在老城的诸

多问题瓶颈面前，通过采用适应空间条件的设施、改良本底土壤条件、开发新设施等工程措施，以及科学规划选址、修订标准规范、合理拆迁腾退、优化施工过程以及公私合作募集资金等非工程措施，推进老城排水系统绿色改造方略，这与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推进思路是一致的。

4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老城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纽约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许多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从现状问题到解决策略都很相似，对我国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借鉴意义：（1）老城排水系统升级改造中，采用灰绿结合的理念；（2）多部门协同，通过制度标准建设、资金补助、税收减免、试点项目建设、监测评估、教育宣传和公众参与等手段来力保实现规划目标；（3）充分预测我国老城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新老城区特点制定改造时间、目标和标准。

2018年第4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美国规划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罗震东 / 经验、规律与知识：新时期国际规划历史研究的任务

罗震东, 宋彦 / 变与不变之间：二战以来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张文博, 宋彦, 邓玲, 田敏 / 美国城市规划从概念到行动的务实演进——以生态城市为例

姚之浩, 曾海鹰 / 195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的演化与规律特征

高洁, 刘畅, 陈天 / 从“永久清理”到“全局规划”

——美国棕地治理策略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侯鑫, 王绚, 丁国胜 / 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

章征涛, 宋彦, 丁国胜, 李志明 / 从新城市主义到形态控制准则

——美国城市地块形态控制理念与工具发展及启示

城乡研究

邱婴芝, 李志刚 / 21世纪初“星球城市化”研究进展述评

刘超群 / “占领伦敦”：土地产权与公共性之争

干靓 /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

朱菁, 范颖玲 / 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

王森, 肖渝, 黄群英, 张纯 / 基于社交大数据挖掘的城市灾害分析

——纽约市桑迪飓风的案例

边防, 吕斌 / 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刘连连, 尉闻 / 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的国际经验

规划研究

徐南南 / 面向实施的规划制度设计：美国1920年代的两部规划立法示范

谭文勇, 冯雨飞 / 百年英美城市规划教育演变与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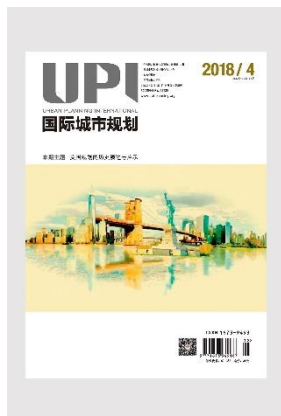
赵力 / 论荷兰《空间规划法》规划制定权力的垂直分配与纠纷解决

实践综述

施媛 / “连锁型”都市再生策略研究——以日本东京大手町开发案为例

专题研究

张楚楚, 肖超伟 / 北非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演变



2018年 第4期

历史研究的任务

罗震东

摘要：新时期的国际规划历史研究必须服务于新时期中国城乡规划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求。一方面，基于对国际城市发展与规划学科互动演进机制与规律的研究，预判中国城市与规划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全球视野的比较和分析，探索城乡规划的普世真知，通过学科知识的中国化，实现中国知识的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已经经历较为完整的城镇化历程，其不同城镇化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产生的问题以及规划和公共政策的应对机制，对于中国的规划转型日益显现出巨大的价值，是国际规划历史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规律；知识；规划历史；美国

引文格式：罗震东. 经验、规律与知识：新时期国际规划历史研究的任务[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3. DOI: 10.22217/upi.2018.136.

变与不变之间：二战以来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罗震东 宋彦

摘要：美国的土地使用总体规划作为指导城市综合发展的全局性规划，在二战以后逐步发展完善，形成集规划设计、公共政策与增长管理于一体的综合规划。土地使用规划在 70 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规划理论巨变、支持系统基本不变以及规划编制方法渐变的历程。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以及恐怖主义等各种威胁的加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土地使用规划开始出现新的发展趋势。韧性、系统思维、社区参与、公平、适应以及关注实施等理念开始成为土地使用规划追求的目标。梳理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演化过程与趋势，对于思考中国城乡规划转型以及“多规合一”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土地使用规划；学科知识；演进；美国

引文格式：罗震东, 宋彦. 变与不变之间：二战以来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4-11. DOI: 10.22217/upi.2017.415.

纵观全球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历程，美国二战后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有着很高的类比性，因此借鉴价值较高。美国二战以来已经完成相对完整的城镇化历程，期间出现的很多政策和发展特征，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2 年以来的中国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研究美国城乡规划学科二战以来的演进，对于判断中国城乡规划的转型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聚焦直接反映规划实践或服务于规划实践的核心知识点——土地使用规划，总结 21 世纪以来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变革动因、演进趋势与转型逻辑，探讨中国规划转型的可能方向以及多规合一的可能路径。

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学科知识的真正形成始

于 1950 年代，也即二战以来的知识生产和实践总结。美国二战以来的土地使用规划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 年代和 1990 年代是两个主要的转型时期。1970 年代以前，以物质形态设计为主的传统总体规划（general plan）是规划的主流（家族树的树干）。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即规划的目的就是为私人 and 公共的物质开发以及城市再开发进行综合政策的决策、沟通与实施。1970 年代之后，美国的城市规划开始转型，土地使用规划开始出现新的类型。在传统的以物质形态设计为主的使用设计规划之外，文字型政策规划、土地分类规划以及开发管理规划等新的分支开始出现。四类规划各有侧重，土地使用设计与交通的

关系最紧密，文字型规划与公众参与更紧密，土地分类规划侧重环境保护，开发管理侧重实施。四类规划在 1990 年代以后开始融合，形成整合设计、政策和管理的综合规划。

美国土地使用规划学科知识的系统演进最为直接地反映在五版《城市土地使用规划》教材的发展与更新上。从 1957 年由斯图尔特·查平教授编著以来，分别于 1965 年、1979 年、1995 年和 2006 年进行了四次更新。通过分析五版的内容可以看出，查平教授从一开始就为城市土地使用规划的学科知识奠定了基础性框架，规划理论、规划支持系统与规划编制方法三大板块的学科知识构成在五版中始终保持。

进入 21 世纪，美国的土地使用规划对于可持续发展予以高度关注。相关学者在论述 21 世纪综合规划的模式时指出，综合规划不应是聚焦于土地使用和物质空间发展的一般性政策文件，而是在处理问题的同时体现出社区所表达或追求的价值，以区域的视角解决问题。

通过对美国土地使用规划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到，规划学科知识的构成中，三大组成部分的演进程度并不一致。规划理论或曰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常常出现显著甚至剧烈的变化；规划支持系统或曰相关知识的构成保持稳定，虽然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地更新和丰富，但主要是在具体知识点层面；规划编制方法则随着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改进、调整。三大板块，巨变、小变与渐变的总体特征，美国如此，中国大体也是如此。规划理论方面，当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对于城乡发展关系的认识都是不同的。尤其作为一门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显学”和活跃的实践活动，中国城乡规划理论的发生常常是被动的、输入的、衍生的，规划思潮也往往在内生与外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重二元交织语境下，呼应时代脉搏

的波动。而规划相关知识的构成则保持稳定，比如经济分析、人口分析，即使在大数据时代，测度方法、工具更加精细和准确，但测度的目的和内容总体一致、变化很小。规划编制方法则不断渐进调整、创新，方法上的积累和迭代为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巨大发展建设需求提供了有效的支撑，渐进的、边缘创新的特征非常明显。

从二战后美国土地使用规划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多规合一”的过程。美国土地使用规划领域的四类规划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逐渐开始融合，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整合设计、政策和管理的综合规划。

中国对应领域的主要规划与美国土地使用规划领域的四类规划在功能和内容上有着很高的相似度。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不同功能规划的出现基本有着相似的分工需求，而从分工走向整合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仅仅从学科知识角度，中国多规合一实践的发展方向其实是清晰的，具体的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构建战略导向的多规合一规划，重点定战略、定分工和协调机制，其他部门各自的规划依然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优势，但必须统领于这一战略之下。模式二，基于城市总体规划构建集设计、政策和管理于一体的综合规划，进一步区分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政策引导和实施管理职能，有效地在前端和后端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推动多规在职能和尺度上的整合，形成优势互补。目前，自然资源部的设立已经在中央层面开启了制度调整的进程，相信城市层面的制度变革也将很快推进。

基于多规合一发展的需求和可能趋势，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一味试图简化或“瘦身”的思路似乎并不合理，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或许才是破解困境的出路。

美国城市规划从概念到行动的务实演进——以生态城市为例

张文博 宋彦 邓玲 田敏

摘要：从 1970 年代提出以来，生态城市经历了从构想和概念到目标体系，再到具体行动的演进过程，是美国城市规划理念应用和务实演进的典型代表，研究其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对总结美国城市发展规律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发展阶段来看,生态城市可细分为理念探索,目标设定和应用,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和广泛实践、完善和务实推进四个阶段。在城市规模扩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及各类主体对城市治理诉求增加的背景下,美国的生态城市理念也产生了新的内涵和特点,在目标体系方面,更加注重经济的生态化转型、社会进步和以人为本,更加突出目标体系对行动的指导性和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强调基于“目标—行动路线”的建设模式,在建设行动方面,更加强调行动的针对性和系统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管理手段的信息化。总结美国生态城市理念的务实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有利于推动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关键词: 生态城市; 务实演进; 评价体系; 目标—行动路线

引文格式: 张文博, 宋彦, 邓玲, 等. 美国城市规划从概念到行动的务实演进——以生态城市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2-17. DOI: 10.22217/upi.2017.410.

生态城市自 1970 年代提出以来,经历了从概念到目标,再到具体行动的演进过程,是美国城市规划理念应用和务实演进的典型代表,研究其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对总结美国城市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态城市的务实演进历程可以分为理念探索、目标设定和应用、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和广泛实践、完善和务实推进四个阶段。1970 年代—1980 年代是生态城市理念的探索阶段,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保罗·索勒瑞(Palo Soleri)等学者提出并完善了生态城市的理念和目标;1990 年代是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细化和初步应用阶段,生态城市理念细化为具体目标,并形成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21 世纪初是生态城市评价体系构建和广泛应用的阶段,许多城市通过构建生态城市的目标体系将生态城市理念融入城市规划,生态城市进入应用和实践阶段;现阶段美国生态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完善和务实推进阶段,在目标和行动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

现阶段美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善,而是扩展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且更加强调目标体系对建设行动的指导作用。在经济发展方面,现阶段美国生态城市更加强调智力资源驱动经济发展,如波士顿、旧金山等将集聚智力资源、优化创业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纽约、芝加哥等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在社会进步方面,反映社会公平性和社会交流等方面的指标不断增加,如纽约将公平性和安全性作为城市发展的四大目标之一,西雅

图、亚特兰大等将增加城市交流空间列入目标体系。在宜居性和普惠性方面,现阶段美国生态城市更加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除了设定保障性住房的数量指标,还增加了对住房选择的多样性、便捷性和申请难度等指标。

目标体系的演变也带动了建设行动的转变,现阶段美国生态城市的建设行动在推进机制、参与主体、管理手段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首先是建设行动更加系统化,生态城市建设改变了环境生态化改造的单一模式,而更加注重经济、社会、交通、生态等系统的整合和协同,出现了公交导向的土地开发(TOD)、绿色空间赎买、绿色交通规划等新举措。其次是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生态城市建设更加重视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体的诉求和参与,如波特兰由政府 and 市民组织共同制定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加州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由企业主导生态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再次是技术手段更加科学化,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手段被应用于生态城市的建设行动中,如环境最优治理手段(Environment BMP)、清凉屋顶(Cool Roof)技术、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等。最后是运行管理更加信息化,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城市的动态监测和信息整合能力,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对照美国生态城市的演进历程,我国生态城市建设仍处于评价体系构建和应用阶段向完善和务实推进阶段的过渡时期,仍需要把握生态城市建设的最新趋势,在经济绿色转型、城市空间优化、公众参与机制、住房保障,以及提升社会活力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创新。

1950 年代以来美国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的演化与规律特征

姚之浩 曾海鹰

摘要：美国的城市更新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贫民窟清理,随着城市蔓延以及内城衰败等问题的加剧,城市更新从单一的贫民窟清理、消除破败转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目标的综合治理。1950 年代以来,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来自税收融资、土地调控和发展管理三方面。通过文献研究,本文重点剖析了这些政策工具的内涵与演变,进而发现在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制度背景下,城市更新的思潮变化推进了政策工具的创设与更替;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的实施在响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试图兼顾私有产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但也存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导致政策目标偏离的问题。我国城市更新受制于传统物质规划思维和城市建设管理部门权力的分割,缺乏连续性、系统性的政策工具供给,导致完美的空间更新方案难以转变为实施蓝图。借鉴国际经验,创设、整合实施政策工具是城市更新面临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城市更新; 政策工具; 税收融资; 土地调控; 发展管理

引文格式：姚之浩,曾海鹰. 1950 年代以来美国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的演化与规律特征[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18-24. DOI: 10.22217/upi.2017.413.

美国的城市更新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贫民窟清理,随着城市蔓延以及内城衰败等问题的加剧,美国进入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时期,城市更新从单一的贫民窟清理、消除破败转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目标的综合治理。虽然城市更新依附的制度土壤不同,但是美国城市更新的政策思路与规律仍有借鉴价值。

1950 年代以后,美国城市更新的资金投入机制决定着公私部门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和角色此消彼长。以资金投入为脉络,美国城市更新可分为联邦政府主导(二战后—1960 年代)政府与市场共治(1970 年代—1980 年代)和多向合作综合治理(199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随着 1949 年美国启动新的《国家住宅法案》、州政府的城市增长管理法以及地方区划条例的完善,不断涌现出各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用于城市更新。与城市更新密切相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来自税收融资、土地调控和发展管理三方面。其中税收融资工具包括税收增额筹资(tax increment financing)和商业改良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土地调控工具包括土地公益征收(eminent domain),土地银行和信托(land banking and land trust);发展管理工具包括激励性区划(incentive zoning)、叠加区划(overlay zoning)和以容积率红利(density bouns)、容积率转移(floor area ratio flow)、容积率转让(transfer

development right)、容积率储存(far reserve)为代表的增长管理工具。

在城市更新权限从联邦下放到地方的过程中,更新政策工具随着更新思潮的变化和公私部门在更新事务中的角色变化而变化。首先更新思潮的演化推进了政策工具的更替,城市更新的目标导向变化、“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思潮兴起,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准则等理念的引入引导城市更新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考量影响了政策工具的制定,左右着城市更新公私利益的平衡。例如,对城市更新中 blight(衰败、破败)一词的界定左右着美国城市更新政策的发展,都市更新倡议者和参与投资的私人财团通过解读及形塑 blight,影响政策工具的制定。1980 年代以来,城市更新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导致政策工具目标偏离。过度依靠市场投资导致政府在城市改造领域中的控制力下降,各财团利用更新政策工具追逐城市再开发的利润。包容性区划、激励性区划、社区土地信托机构等新事物的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扶持了社会低收入阶层的设施供给,但是投资商往往将提供社会福利的成本转移到其他更新项目中。

当前,我国城市更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危房改造为目的的物质性更新阶段,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土地产权重构、社会财富分配、产业转型等深层次地方性社会经济议题,城市更新的

公共政策属性日益凸显。我国城市更新实施更多地依赖地方各部门出台的实施办法、规划，缺乏系统性的政策工具指引。城市更新主要通过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来填补一次性高昂的赔偿成本和城市新空间开发的土地成本，导致空间绅士化与分异加剧、

外来人口排斥与食利阶层得益等一系列问题。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城市更新应尽快创新完善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区别更新政策工具的实施方式、加强更新政策工具的实施评估、侧重更新政策工具的社会导向。

从“永久清理”到“全局规划”——美国棕地治理策略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高洁 刘畅 陈天

摘要：采用美国环保局相关棕地数据及文献资料，分析美国棕地问题兴起背景及其治理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行政理性阶段、经济理性阶段、环境公正阶段及调整阶段三个阶段，逐渐实现棕地治理从“永久清理”向“全局规划”的转变，有效地协调了棕地治理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和基于土地再开发的经济社会效益。美国公共行政角色的转变、对棕地内涵理解的升级以及治理政策的细化是促其转变的重要因素。演化特征表现为联邦与州及地方政府的权利变更，以及从惩罚性的监管框架向强调公平、奖励及社区利益的合作框架的转变。责任认定模式、财税激励模式以及公共参与模式是棕地治理中的关键因素模式。平衡全局的风险管理和责任认定机制、兼顾公平的多元可持续融资机制以及面向实施的公众利益表述平台为我国棕地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思路。

关键词：棕地治理；责任认定；财税激励；公众参与

引文格式：高洁，刘畅，陈天. 从“永久清理”到“全局规划”——美国棕地治理策略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25-34. DOI: 10.22217/upi.2017.412.

生态环境恶化和用地资源紧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城区污染场地数量凸显，成为城市更新的藩篱。生态修复和以存量规划内涵推动精明发展的双重要求使得我国棕地修复再利用成为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部门迫切的议题。当前，我国尚未建立针对棕地修复及再开发的有效运作机制，面临无成熟标准、无可适用技术、无经典案例的困境。美国具备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棕地治理体系，本文通过对美国棕地问题兴起背景及其治理历程的分析，为我国的棕地治理体制建设提供有效的经验与思路。

纵观美国棕地治理历程，总体上是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角色变迁及互动响应实现自下而上、逐步精细化的发展过程。根据价值导向的演变，美国棕地治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行政理性阶段、经济理性阶段和环境公正阶段。行政理性阶段主要涉及再开发的政策和监管问题，重点在于联邦政府主导下的环境保护；经济理

性阶段形成了棕地经济复兴和房地产开发的框架，向纵向协同治理下的再开发转变；环境公正阶段主要关心土地污染和逆工业化对低收入、政治无力社区不成比例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形成多元主体合作下的综合规划。这三个阶段逐渐实现棕地治理从“永久清除”向“全局规划”的转变，有效地协调了棕地治理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和基于土地再开发的经济社会效益。演化特征表现为联邦与州及地方政府的权利变更，以及从惩罚性的监管框架向强调公平、奖励及社区利益的合作框架的转变。美国公共行政角色的转变、对棕地内涵理解的升级以及治理政策的细化是促其转变的重要因素。

责任认定模式、财税激励模式以及公共参与模式是棕地治理中的关键因素模式。在责任认定上，美国形成了联邦责任豁免和州责任豁免的双层豁免机制；在财税激励上，形成了以超级基金为主的联邦政府融资模式以及包括直接财政支持、税务优

惠激励、土地利用控制和特定程序支持四类政策工具的州及地方融资模式；在公共参与上，社区福利协议和新泽西州的棕地开发区域倡议是社区参与棕地项目的典范。

从“污染者付费”到“受益者付费”的责任认定制度、多样化的财税激励措施以及公共参与平台

的实体化建设都体现了美国棕地治理策略的精细化调整。建议我国建立起平衡全局的风险管理和责任认定机制、兼顾公平的多元可持续融资机制以及面向实施的公众利益表述平台，在明确自身发展阶段和地方具体管理体系的基础上优化棕地策略，推动共同振兴愿景的达成。

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

侯鑫 王绚 丁国胜

摘要：对区划法实施和城市蔓延问题的反思促进了美国规划界对城市形态控制方法的探索，精明准则即是这一反思过程的重要成果，它是基于精明增长理论和新都市主义规划原则的一种城市发展与形态控制的开发管理工具。本文分析了美国精明准则编制方法的产生背景、定义内涵及特点，梳理了国内城市设计导则的发展现状及问题，针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不足提出重点借鉴的三个方面，并在文末指出精明准则是基于美国社会现状的，需要针对中国国情进行改良。

关键词：精明准则；城市设计导则；形态设计准则；断面控制

引文格式：侯鑫，王绚，丁国胜. 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35-41. DOI: 10.22217/upi.2017.411.

从新城市主义到形态控制准则——美国城市地块形态控制理念与工具发展及启示

章征涛 宋彦 丁国胜 李志明

摘要：城市蔓延是美国规划界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城市无序蔓延带来的一系列城市形态问题，美国规划师们向物质空间设计层面回归，先后提出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形态控制准则等城市形态控制理念和工具。其中形态控制准则是针对城市地块形态控制的工具。本文对美国城市形态控制与调整工具的发展脉络以及相互联系进行分析；对形态控制准则进行详细阐述；最后，针对当前我国城市蔓延问题初显，及在城市形态控制工具不足等矛盾下，从发展理念、操作工具及行业发展三个层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市地块形态控制工具；新城市主义；形态控制准则

引文格式：章征涛，宋彦，丁国胜，等. 从新城市主义到形态控制准则——美国城市地块形态控制理念与工具发展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42-48. DOI: 10.22217/upi.2017.414.

可持续的城市形态和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一向是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理想。针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的开发建设活动，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核心的空间开发控制体系。但是，从实施效果上看，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的引导和控制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微观层面的城市设计作为空间品质提升工具，受到

重视和推广。然而，当前城市设计还远未达到成为控制和调整城市形态工具的程度。因此，如何开发适合我国地块层面的形态控制和调整工具是值得关注的话题。美国对城市形态的控制工具，特别是地块层面的控制方法值得借鉴。

美国在应对传统区划制度（zoning）过于强调功能划分而不重视空间和场所营造，导致普遍的城

市蔓延、城市缺乏特色的问题，美国规划师们向物质空间设计层面回归，先后提出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形态控制准则等城市形态控制理念和工具。相比于传统区划采用禁止式条文和抽象参数所带来的“模糊形态”，城市形态控制工具则着重于微观层面的建筑形式、建筑布局、市民活动空间等方面对建成环境进行控制。

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物质空间设计的理念，从区域、城镇和城区这三个层面指导公共政策、开发行为、城市规划和设计，为精明准则和形态控制准则提供了理论基础；精明准则（smart code）偏重于区域和城市层面，对城市内的形态要素提出控制，通过源自生态学的断面划定，用“形态过渡”的方法来区分七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形态，它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建设特点和形式，提出了一套如何将区域性规划原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规划区内部的指标体系和形态控制法则，包括从自然、农村、郊区、城区、城市中心到城市核心，以及特殊分区。

形态控制准则（form-based codes）是针对城市地块形态控制的工具，重点是形成对地块（建筑）层面的控制内容。它通过类型学的方式，从各种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形态出发，通过横断面的校核，抽取不同分区关于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的标准，配

以示意图表达，取代传统区划的抽象数值。它强调了形态控制优于功能管制的核心，以愿景式、说明性的开发规则，描述“要求建成什么”形态。主要从控制性规划（regulating plan，与精明准则类似）、建筑形式标准（building form standards）、公共空间标准（civic space standards）等几方面提出控制要求。

可以说，美国规划理论发展本身始终坚持了物质形态的方法，尽管这其中出现了积累、迭代、综合的规划理论体系，但是，形态控制（土地使用）的内容却一直贯穿于整个规划理论脉络中，呈现出一幅形态控制工具不断演变和丰富的画面。总之，城市形态控制工具的发展脉络反映出美国城市规划路径向物质空间设计或曰空间形态的回归，以此寻求改革城市功能和空间感受。

美国城市形态控制与调整工具发展对我国城市规划具有以下启示：从城市发展理念上来看，应强调功能混合，注重微观层面的场所营造，塑造具有特色的公共空间和城市风貌；从城市形态控制手段来看，应重视发展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形态引导与控制的工具；从规划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警惕规划与其他学科跨界融合中放弃形态设计的传统。

21 世纪初“星球城市化”研究进展述评

邱婴芝 李志刚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城市空间剧烈重构，大城市密集区迅速扩张，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城市环境等各维度均呈现一体化趋势，长期存在的各种地理和空间分割（如城乡二元、南北半球分化、社会自然分割）均面临解体和重构。在此背景下，近期西方城市研究尤其是所谓批判城市研究中出现对“星球城市化”现象的热切关注，探索城市理论本身的转型与重构。本文系统解析相关理论的新动向，通过梳理“星球城市化”研究的最新进展，评述和解析当前“星球城市化”的形势、理论及其发展脉络，并结合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实践进行讨论，展望未来中国城市研究，以此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星球城市化；城市理论；城市化；城市研究

引文格式：邱婴芝，李志刚. 21 世纪初“星球城市化”研究进展述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49-55.

DOI: 10.22217/upi.2017.234.

1 星球城市化的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的推进,城市现象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传统核心地区的功能及基础设施持续向外扩散,边缘城市、新城现象不断增多;部分城市通过区域整合形成更大尺度的大都市区,城市群、城市带等日益增多;多国政府积极推动跨国甚至跨洲际的城市空间开发(如“一带一路”)。“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边界正逐渐淡化,出现 Desakota(“乡村—城市”)、城中村等复合性空间景观。同时,“自然”系统已经成为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满光伏电站的沙漠、铺设电缆的大洋底、充满人造卫星的大气层等,均被整合到全球物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生产、循环系统之中,用以支撑城市的持续扩张和全球城市网络运行。面对如此剧烈的空间变动,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和研究应运而生。

2 星球城市化的内涵

星球城市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近期主要由布伦纳(Neil Brenner)、斯密德(Schmid)、梅里菲尔德(Merrifield)等学者推动发展。星球城市化并不是指全球发展成一个包含所有人口的城市景观,而是将整个星球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空间,不再区分“城市”、“乡村”、“自然”等空间类别,强调这些空间相互联系,构成具有多元景观的新系统。作为批判性城市理论,星球城市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1)批判传统地域主义的认识论,试图重新构建城市理论;(2)聚焦星球城市化下的政治实践,拓展城市权利的内涵;(3)关注星球城市化理论的应用。

3 对传统城市理论的批判

进入 21 世纪,传统的“城市”概念已经出现问题。长久以来,学界往往通过人口统计、行政区划或综合多个指标界定城市边界,区分城乡空间。但是,目前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充分把握当前城市化进程的超常规规模和多元化路径。

城市理论主流观点的局限。“城市的胜利”“特

大城市论”等观点多基于传统的地域化、类型化和大而化之的认识论,缺乏准确性和精确度,缺乏对城市及其区域联系的考虑,脱离实际和现实。

“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内涵需要重塑。1960 年代末,列斐伏尔提出“城市权利”概念,假定城市的中心性,与星球时代的无中心性相矛盾。梅里菲尔德认为,需要拓展当代“城市权利”的内涵,关注社会斗争舞台的“尺度上移”以及全球尺度上公民的重要力量。

4 星球城市化的核心观点

首先,需要重新界定“城市”。城市不是固定的形态、特定的空间类型以及有界的空间单元,而是一种动态的、有路径依赖的、多样化的全球社会空间重组,城市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空间转型进程。

其次,城市化的机制在于集聚城市化(concentrated urbanization)、扩散城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差异城市化(differential urbanization)这三个过程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构建。

再者,空间构建、地域管治、日常生活等三个维度是城市化内涵的分析框架。城市化包含诸如强化土地利用、开发新空间、建设物质与能量循环的基础设施等空间构建,受到特定地域管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

此外,需要发展能表征联系性、过程性的新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充分捕捉星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以及全球空间的急剧变化。

5 讨论与展望

借鉴“星球城市化”理论,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1)重视乡村、自然空间对城市的重要作用,揭示其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2)关注过程性、联系性的思路,推动研究方法、技术的创新;(3)更加注意协调多方利益,更加重视空间权利、社会公平和生态文明建设(4)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讲好中国城市故事,将其经验世界化。

“占领伦敦”：土地产权与公共性之争

刘超群

摘要：文章以“占领伦敦”为线索，聚焦其中围绕土地产权的各方权利冲突，以及公共权力与公众之间对“公共”话语的争夺。文章利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获取数据，结合对相关诉讼案件辩词、土地交易协议及历史档案的分析，指出是私有土地产权的排他性权利与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城市管理权共同导致了帕特诺斯特广场被封锁及圣保罗营地被清除的遭遇。占领者营地的社会组织与空间实践则充分显示出他们与城市政府对城市“公共性”的不同理解与追求。对“占领伦敦”的细致分析既帮助我们了解英国的土地产权架构及政府的城市规划权、土地强制征收权等管治权力，也促进了对公共空间固有困境的思考，这些都将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的土地制度、公共空间与公共性提供参考与启发。

关键词：占领伦敦；土地产权；伦敦城；公共性；公共空间

引文格式：刘超群. “占领伦敦”：土地产权与公共性之争[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56-66. DOI: 10.22217/upi.2017.140.

2011年1月我去往英国攻读人文地理学博士，彼时我最想在这个国家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看到的“私有制”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它和我们所谓的“公有制”有何本质区别。2011年10月，我的导师斯图尔特·埃尔登（Stuart Elden）建议我南下伦敦观察当时正沸沸扬扬的“占领伦敦”运动，未料它竟成为切入此问题的一个入口。于是，与其他研究占领运动的论文视角有所不同，来自异国制度与文化的我更关心的是热闹的运动背后所反映出的基本国家与社会制度——某些对英国学者和民众而言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尤其是英国的土地制度，包括所有权界定、法律条文、诉讼、交易，以及伦敦城的城市制度，包括它与国家和公司的关系，或者说它兼具这两者身份所折射出的问题。

“占领伦敦”运动最醒目的节点事件有两个。其一是2011年10月15日高等法院以禁令封锁帕特诺斯特广场（Paternoster Square）一事。那日数百名抗议者欲占领位于伦敦帕特诺斯特广场的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以抗议大型金融机构把持下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现象。伦敦证券交易所事先得知占领计划，故以帕特诺斯特广场是私有财产为由，向英国高等法院请求禁令，于是警察封锁广场，抗议者被迫转移至圣保罗大教堂外空地驻扎营地。其二是“伦敦城诉占领者”（City of London -v- Samede and others）一案，伦敦城政府在

此案中胜诉，因而合法强制清除了圣保罗营地。这两个事件分别涉及私有土地和“公有”土地，但都导致相同的占领者被清除的命运。

在“伦敦城诉占领者”一案中，伦敦城政府借助其作为城市管理者（即规划当局、地方政府和道路主管部门）的权力，而非城市公有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得到法律支持，从而将抗议者帐篷从城市所有的道路用地和教会所有的户外空间中移除。城市政府强调它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和责任，这些皆在英国法律中得到详细规定，体现出政府作为制度性安排的公权力的强制性。

而法院封锁帕特诺斯特广场这一看似直接维护私有产权人权益的举动，也是由司法达成。甚至这一地块属于大公司财团的历史，也是由国家权力参与创造。现在的帕特诺斯特广场曾许多民宅与商铺，也是圣保罗大教堂教士居住的地方，产权分散于众多私人手中。二战中大教堂周围损毁严重，几近废墟，被划作战后重建范围（declaratory areas）的一部分，即政府可有偿征收其土地。

政府委托拥有周边土地永久业权（freehold）的英格兰教会不动产委员会（Ecclesiastical and Church Estates Commissioners for England）代为收购、处置这片土地。针对三户不同意被收购的产权人，伦敦城政府下达“强制购买令”（Compulsory Purchase Order）获取土地并转交给教会，从而促成全部收购。之后教会将土地整体打包，几经辗转，才出现了当

前由三菱地产长期租赁、伦敦证券交易所等大商户入驻并作为金融中心的局面。帕特诺斯特地块先“公有化”、再“私有化”的历史说明，此地块从分散的私人主体落入大公司之手，并非私人主体互相争夺的自然结果，而是在关键时刻因政府权力干涉所致。

对这两个事件的挖掘显示，因“占领伦敦”而被热议的公共空间私有化有它的制度性、历史性缘由，而这其中，国家、政府所代表的公权力起到重要作用。伦敦城政府自身的性质也是一个绝佳案例，可揭示出公权力机构自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进而辅以解释城市公共空间的内在困境。

“伦敦城政府”的英文名称是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或 The City Corporation，其中 corporation 一词也可用以指代“公司”这样的营利性集团，在此指代伦敦城（City of London，全称 The Mayor and Commonalty and Citizens of the City of London，意即“伦敦城的市长、团体与市民”）的自治组织、地方政府和法人代表，也可以简单表达为“伦敦城市法团”。corporation 一词的公私兼指也是伦敦城政府身份的真实写照。伦敦城政府的公权力身份之一，即整个城市的法人代表，在它作为“伦敦城诉占领者”一案起诉者中有所体现，对帕特诺斯特广场的市民“通行权”协议也是由伦敦城政府与产权人签订。

而它作为伦敦城管理者的身份，其具体权责也散见于“伦敦城诉占领者”一案辩词。然而，伦敦城政府同时还拥有私有身份与功能，例如它始终拥有私有资金，即“城市资金”（City's Cash），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其他投资回报；再如，作为英国最后一个保持企业选票（business votes）的城市，其企业

选票在数量上完全压倒居民选票，而这些大型跨国企业被认为更多代表特殊利益而非市民利益。恰是因为伦敦城政府混入了明显私有成分，“占领伦敦”在抗议大型金融机构的同时也抗议政府与经济利益团体的勾结与共谋。

城市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的可疑之处，与所有城市土地皆处于城市管理权、“强制征收权”之下的现实，共同构成城市“公共空间”之困境：私人土地可能被私营业主垄断使用，或形成消费排斥；政府的所有土地仍有可能被封闭使用，如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对于开放的广场和街道，监控与管制也会始终存在；并且政府有其“特殊利益”，并不天然具备公权力所期待的理想的、全然的公共性。此文章又追溯了“公共”空间/土地观念的可能原因，指出“共有”与“公有”的区别：前者才符合人们对“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追求，英国共有地传统或可被认作它在现实中曾有过的实现；而当前英国法律与城市制度中则只有“公有”，即各级政府所有，因而无法符合民众所期待的对全然包容性的共治空间的想象与追求。

这或许正是“占领伦敦”真正的威胁：它占领一处城市空间，挑战现有土地制度与城市管理制度；同时试图以自愿、捐助、互助、自助为方式运行，拒绝资本主义资本累积与生产消费体系，也拒绝政府式的垂直性等级结构；“帐篷城”还发展出类似城市的各种功能，并在话语上宣称他们更能代表城市公众和公共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像是一个新的城市结社（incorporation），因而更不可能被宣称为“唯一”城市公权力的伦敦城政府（the Corporation）所接受。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

千靚

摘要：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对维护城市系统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较多关注交通、能源、建筑等维度的绿色人工环境塑造，而较少涉及城市生物生境系统的营造和修复。本文从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的视角，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征，归纳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剖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提出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需要从“提高生物基层质量”和“减缓人工环境

干扰”两维度优化建成环境的路径，从生态用地、植被格局、开发强度、人类活动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关键优化指标，为通过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城市建成环境；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要素；优化路径

引文格式：干靓.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67-73.

DOI: 10.22217/upi.2017.038.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对维护城市系统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较少涉及城市生物生境系统的营造和修复。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践文献的梳理，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征，明确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剖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提出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为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依据。

太阳、空气、水和土壤四项环境因子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其中太阳、空气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主要属于生物地理区系的影响；而水与土壤两个因子则深受人类开发活动的威胁，城市建设对水和土壤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笔者将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总结为两个维度：（1）直接承载生物本体的基层承载要素，即城市建成环境对土地资源及其结构和环境质量的改变机制要素；（2）人工环境对自然基质、格局以及生物活动的间接干扰要素。

生物基层承载要素主要包括承载植物的生态用地基层和承载动物的植物基层。生态用地空间形态结构特征的改变，通过生境斑块区位、密度、形状、异质性和连通性等改变了城市地区的生物物理过程。城市植被及其覆盖面积和比例、生物量的改变，以及不同的种类结构与配置方式，会对野生动物觅食、筑巢、栖息等行为的生态位产生效应，继而影响物种数量和分布。而人工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干扰则主要通过城市土地开发活动与生物基层竞争各类空间生态位，以及城市中的高强度人类活动改变生物本体的生理和群落适应性特征实现。

人类开发活动所带来的生境隔离，改变了生物生存和繁殖的自然过程，影响物种的繁殖、生长发育和种间关系等生物多样性变化过程与趋势。车流量、人流量等人类出行活动以及声环境、光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环境污染和微气候变化，影响植物生物节律和花期以及动物出行、觅食、筑巢、通信等行为模式，从而导致生理机能和种群结构的变化。

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需要从“提高基层质量”和“减缓干扰压力”两个维度予以考虑。宏观尺度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主要为整体开发强度、密度、集聚度以及绿地、林地、湿地、耕地、水域等各类生态用地的规模与结构，而植被格局数据在宏观尺度上较难获取。在中微观尺度，除了延续宏观尺度的具体地块开发强度要素，绿地和水体作为中心城区小尺度生态用地的载体，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有直接影响，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绿地为主、水体为辅分析其规模和空间形态特征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另一方面，为动物提供觅食、巢居、休憩生态位，并在小尺度进行测绘和调控植被的规模、结构和种植形态亦可作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要素进行分析。

生态文明战略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新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更明确和更高层次的生态转型要求。在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中维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导入生物多样性视角也是城市规划尤其是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的领域，可为未来的城市生态转型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与参考。

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

朱菁 范颖玲

摘要：国外研究表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有利于个人创造力的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出行幸福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居民出行模式日益多样化，出行时间与距离不断加大，但我国居民出行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较为缺乏，难以从政策层面为决策者提升居民出行幸福感提供基础支撑。本研究介绍了国外出行幸福感的概念和内涵，总结了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的常用量表（如出行满意度量表、瑞典核心情感量表、情绪平衡量表等）及基于量表的综合指数（如不开心指数、净情绪值等），从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距离、出行目的、出行途中做的事情和其他相关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我国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提出了我国未来在出行幸福感研究领域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出行幸福感；出行满意度；出行正负情绪

引文格式：朱菁，范颖玲. 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74-83. DOI: 10.22217/upi.2017.402.

国外研究表明，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有利于个人创造力的提升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出行幸福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居民出行模式日益多样化，出行时间与距离不断加大，但我国居民出行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却较为缺乏，难以从政策层面为决策者提升居民出行幸福感提供基础支撑。

本研究首先介绍了国外出行幸福感的概念和内涵，出行幸福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出行幸福感，既包含了人们对出行整体和出行中某方面的满意度，也包含了出行过程中的情绪感受。这一概念包括两个具体层面，即认知评判（cognitive judgments）和情绪感受（affective/emotional reactions）。认知评判层面，既包括人们对自我出行整体状况所进行的满意度评判（即出行满意度），也包括人们对自我出行行为中某一方面所进行的满意度评判，而在情绪感受层面，人们同样可以将出行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来感受并陈述其中的自我情绪变化。狭义的出行幸福感通常仅包含出行过程中的情绪感受，即正情绪（如开心、快乐、愉悦等）或负情绪（如痛苦、压力、难过等），不包含认知层面的出行满意度。

其次，总结了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的常用量表，

及基于量表的综合指数。主要包括李克特量表单因素评价、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以出行满意度 STS 为代表）、正负情绪量表（瑞典核心情感量表、情绪平衡量表），以及基于正负情绪量表的综合指数（不开心指数、净情绪值、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等。

再次，总结了国内外出行幸福感的研究进展。国外有众多学者分别从认知评判、情绪感受两个层面，分别从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距离、出行目的与途中所做的事情及其他相关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就研究趋势而言，对出行满意度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而对出行幸福感（狭义）的研究正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而我国相关研究与国外相比，仍处于较为初级的研究阶段，在概念区分、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反馈于城市规划、交通规划、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应用上，国内外有着显著差异。

鉴于我国相关研究与国外的差距，未来我国关于出行幸福感的研究可着重从以下两方面逐步推进。一是研究内容上，可研究多种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出行距离、出行目的、出行途中所做的事情对人们出行幸福感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上，建议采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出行行为量表、出行情绪量表与相关综合指数进行出行幸福感方面的研究。

基于社交大数据挖掘的城市灾害分析——纽约市桑迪飓风的案例

王森 肖渝 黄群英 张纯

摘要：在城市灾害频发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大数据在灾害分析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社交大数据挖掘和使用，主要体现在诸如灾情感知、信息编码、事件跟踪、灾难救援以及损失评估等领域。本文以 2012 年在美国多地特别是纽约市造成了严重影响的桑迪飓风为例，基于社交媒体网站推特（Twitter）以及相关数据库的信息，通过信息编码、分类以及空间网络的对接等方式，研究发现灾前准备、灾害发生、灾害响应和灾后应对等主题随时间、空间发展的趋势等特征。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描述并讨论了与灾情相关的解释性变量同推文数量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本文参照 MMAM 理论（1）讨论了推文灾情与真实情况的误差产生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推特信息的数量与人口规模和著名的地标性区域显著相关，个人属性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也对推特信息数量产生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信息化背景下社交媒体大数据信息的挖掘和分析，从社交媒体信息发布特征的角度认识灾害发生、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社交媒体；大数据；城市安全；减灾；数据挖掘

引文格式：王森，肖渝，黄群英，等. 基于社交大数据挖掘的城市灾害分析——纽约市桑迪飓风的案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84-92. DOI: 10.22217/upi.2016.096.

2018 年 7 月 15 日晚间开始，北京遭遇了持续近 50 个小时的强降雨。这场强降雨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因其快速、自发、实时，以及蕴含丰富信息量等特征，在描述和应对城市灾害中的作用不容小视。然而，因受制于用户、媒介以及灾害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社交媒体的数据在描述和解释灾害中也存在着一些偏差和局限。当前我国学界对于社交媒体信息在城市灾害中的影响缺乏充分的讨论。

本文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在灾情感知、检测、救援与评估中的作用，并以 2012 年给纽约市造成严重影响的桑迪飓风为例，对与桑迪飓风相关主题推特信息的数量、内容、时空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并理解与灾害相关的社交媒体信息，从而为城市防灾减灾提供支持。

对于社交媒体数据在防灾减灾中的研究分为四个方面，包括态势感知和信息编码，事件检测与跟踪，救灾救援，以及损害评估。在纽约的案例中，通过聚类得到的社交媒体数据信息在这四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在灾害随时间发展的四个阶段，即预备期、响应期、影响期，以及恢复期中，社交信息

主题又有所差异。在桑迪袭击纽约市之前的两天，与备灾相关的推文出现峰值；飓风到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受灾及响应的推文达到非常高的数量；飓风过境之后，灾后恢复成了热门的讨论主题。

此外，信息数量和内容随灾情位置和冲击程度的不同也有所差异。受飓风中心的移动和破坏性程度的影响，曼哈顿中、下城以及布鲁克林沿哈德逊河周边地区的推文数量高于其他地区，而在受灾极其严重的地区推文数量又有所下降。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和重要的公共场所也产生了大量的推特信息。在一些特定地点，推文的内容产生了差异。比如在机场，对于航班延误和飞机受损的报告就明显高于其他推文；而在公园中或主要交通节点中，相应的主题又会变为树木折断或道路（隧道）封闭。

基于 MMAS（即人口数量，灾害严重程度，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以及使用动机）的泊松回归模型，发现人口数量和受淹地区比例与当地推文数量呈现正向相关性，而社会经济因素则在其中表现出更加复杂的影响。比如年轻人、中等收入者，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推文数量相比其他人群要多。流动性强的人口，比如游客和非当地居民也有可能居住在常住人口较少的地区发送较多的推文，典型的地点包括中央公园和拉瓜迪亚机场等地。

社交媒体数据在通报灾情和辅助救灾等方面

有其自身的优势，然而通过对于目前的应用和案例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缺陷，比如单纯依据与灾情相关数量来评估灾害情况存在偏差；又如社交媒体的使用人群和动机受社会经济及实际情况的影响存在着局限性等。

在中国城市的防灾减灾中应该重视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的时空特征、基础设施、影响人口等方面的潜在解释及效用，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管控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的能力。

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边防 吕斌

摘要：社区作为城市基本空间单元，是城市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比较视角，系统梳理和分析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和模式，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城市社区治理发展背景、治理目标、治理参与主体以及组织方式来比较其中异同。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分析和评估美国、英国、日本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即不同国家在所处特定阶段治理目标和政策实施效果之间的差别来更好地厘清不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和差异。其中，第三方力量的崛起为美国社区治理带来生机；英国治理模式则具有较强政策驱动性；日本则更依赖其较高的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同时，美国、英国和日本社区治理具有一定共性。例如，政府和社区关系相对分离；公私部门互动合作较为紧密；居民参与意识及水平普遍较高；社区治理具有较强政策和资金支持。文章通过对中国社区发展阶段的反思，提出在引入和借鉴国外模式需要将“政府与社区关系”、“第三方组织参与程度”以及“居民自治能力”三个要素纳入考虑范围，同时，需要因地制宜地培育符合自身发展诉求的社区治理模式。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发展；比较研究；公众参与；非政府组织

引文格式：边防, 吕斌. 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93-102. DOI: 10.22217/upi.2016.136.

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社会空间单元，历来是各个国家及地区联系“政府”与“市民”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则是通过动态决策和多方共同参与来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及过程。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及地区由于所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以及当地社会经济水平的不同，在培育适宜自身发展诉求的“社区治理”模式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相较之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尚且处于发展阶段，在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过程中，往往由于难以“因地制宜”地汲取并发展适宜自身情况的社区治理模式，而无法实现相应的目标和效果。

本文基于“社区治理”的“行动体系框架”，以比较研究的视角梳理和探索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异同。不仅如此，笔者通过对比三

个国家城市社区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目标、治理政策、治理主体、治理组织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结合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进行适用性分析，希冀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提出建议与指引。

通过比较和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不难发现各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和成型与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社区发展诉求以及其当地城市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

美国：在城市社区贫困、环境衰败以及民权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城市社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规划治理权，政府和城市社区关系相对分离；社区发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英国：作为“老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英国城市社区治理主要起源于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城市社区贫困和社区环境恶化等主要问题，其旨在

通过多方互助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协同合作，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

日本：针对历史街区保护、抵御自然灾害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社区营造”；具有较高的社区自治水平及自组织能力，町内会和市民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美国、英国和日本社区治理发展具有一定共性：（1）政府和社区相对分离；（2）第三方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3）市民参与意识普遍较高；（4）市场机制的介入。以上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除此之外，我国在引入和借鉴国外成熟社区治

理模式的过程中，需要妥善理顺和处理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三大关系”：（1）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在发展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行政“越权”和“错位”需要逐步解决，同时，应逐渐赋予社区更多自治权利；（2）政府、社区及第三方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政府需适当降低社会团体和市民组织成立门槛，并且通过政策和法规手段对其进行支持和管理；（3）社区与居民的关系。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社区活动等手段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总而言之，中国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社区治理能力，适当借鉴国外成熟社区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培育适合自身发展诉求的社区治理模式。

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的国际经验

刘涟涟 尉闻

摘要：步行性反映了一个地区建成环境的步行友好程度。步行性测量与评价的系统方法是改善地区步行环境品质的重要部分。目前，欧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发了多种用于评价步行性的方法与工具。本文首先解释了步行性的起源与概念，并概述了步行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了欧美主要的步行性评价范围、指标与标准设置；最后比较了各类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的特征与差异。这将为构建适宜我国城市步行性评价系统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步行性；步行环境评价；可步行指数

引文格式：刘涟涟，尉闻. 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的国际经验[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03-110. DOI: 10.22217/upi.2016.039.

步行环境的品质已经成为衡量人性化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自 1990 年代开始，建设步行友好环境成为美、英等欧美国家城市转向人性化、生态化发展的重要目标，步行性（walkability）成为反映地区步行友好程度的专有名词。欧美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城市步行相关不同层面的现状与问题，开发了相应的步行性测量与评价工具，作为改善其步行环境的有效依据。

1 步行性概念的起源及其相关评价方法的发展

1990 年代末，美国的交通研究中最先提出了步行性的概念，它涵盖了与步行交通相关的建成环境维度。从狭义来讲，步行性反映了与步行交通相关的建成物质空间环境质量，仅体现了步行交通与建成

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广义说，步行性则体现了交通、环境与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自 21 世纪开始，欧美国家陆续开发用于邻里层面的步行环境测量工具与评价方法。一类是基于实证调研，以主观定性评价为主的步行性评价方法。如英国的行人环境评估系统（PERS: Pedestrian Environment Review System），美国的邻里环境步行性测量表（NEW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Walkability Scale），步行环境质量指标（PEQI: Pedestri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及新西兰的社区街道评估（CSR: Community Street Review）；另一类是网络步行性评价工具。如美国的“步行指数”（Walk Score）和“步行性指数”（Walkability Score），

欧洲 Walkonomics 公司的步行性评价移动端应用 Walkability APP。

2 基于实证的步行性评价指标

2.1 英国的行人环境评估系统（PERS）

英国 PERS 可以快速捕获和构建传统的行人问题，如城镇中心的可达性、到学校的安全路线和住区环境的建立，从而改善行人的步行路线和公共环境。PERS 在步行路线和人行横道的每一个环节中为个人评估行为（Individual assessment）创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审查，根据行人的环境和周围的变化，镇中心会被划分为几个部分，采用不同的参数去评估步行环境。

2.2 美国的邻里环境步行性测量表（NEWS）

最新修订的 NEWS-CFA 版本包括：邻里住宅类型、邻里服务设施的步行距离、服务设施的方便程度、邻里街道、步行设施质量、邻里周边环境、交通危机、邻里安全等 13 个方面，共 67 个具体问题。其中，除了对邻里住宅类型和邻里服务设施可达性的评价有独立的评级标准，其他方面均设定了四个评价等级。

2.3 新西兰社区街道审查（CSR）

社区街道审查系统是将社区街道审核（CSA: Community Street Audits）与量化评级系统结合的一个新的调查技术。包括两套评价体系：

评级系统——能够在确定的问题地区对其步行条件进行定量评价；

CSA 是评价街道和空间质量的方法，是“从使用者的角度，而非管理者的角度，对公共场所，如街道，房产，公园和广场的质量进行定性评价。”

2.4 步行性测量与评价方法的比较

从开发动机与评价范围看，英国 PERS 和新西兰 CSR 都是由交通部门发起，开发人是交通专家，其目的是改善当地的步行环境。PERS 针对的是行人活动的步行环境，CSR 针对的是社区范围内的街道，两个系统侧重于步行交通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质量评价。美国 NEWS 创始人是行为医学专家，针对的是邻里住区，更关注整个邻里住区环境的步行友好程度对人健康的影响。

从评价的类别与指标看，美国 NEWS 面向整个邻里住区，评价类别最广，步行基础设施是其中一大

类别，步行道和交叉口是其中的评价参数。而新西兰 CSR 针对调查区域内的每一段道路和每一个交叉口，其评价参数相对更为细致。英国 PERS 的评价目标则涵盖了与行人相关的多种交通空间。

由上述三种调查方法与评级标准可见，它们的评价都是来源于对目标的实证调查；从评级标准来看，基本是来自于调查员（使用者）的直观感受，即满意度标准。客观环境评价是以定性为主，通过量化使用者满意度进行评级。

3 步行性的网络评价工具

3.1 步行指数（Walk Score）

Walk Score 通过一个获得专利的系统衡量任何地点的步行性。针对每一个地址，Walk Score 分析上百条到达邻近服务设施的步行线路，根据到达某服务设施的距离评分。5 分钟以内可达的设施给予最多分。对于更远的设施则采用衰减函数，步行 30 分钟以上的设施不得分。

3.2 Walkonomics 的步行性评价移动端应用（Walkability APP）

Walkability APP 主要是根据各国提供的开放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并以此评价每条街道的步行性。例如，道路宽度、犯罪率、交通水平，甚至（纽约）街道上的树木数量等数据均可用于计算分数。综合当前的研究，Walkonomic 认为创造步行友好街道的关键在于以下八个方面：（1）道路安全；（2）易穿越；

（3）路面/人行道质量高；（4）道路坡度平缓；（5）具有导向性；（6）免于对犯罪的恐惧；（7）智慧与美丽；（8）趣味与休闲。以此评价每条街道，综合后以 5 星评级，并以颜色编码标记在谷歌地图上。此外，Walkonomic 采用大众资源（crowdsourcing），允许市民对每条街道评分，创始人希望它最终会成为一个如维基百科或开放街区地图那样的自组织的大众资源系统。

3.3 美国 Maponics 公司的 Walkability score

Walkability score 是一套具有三种步行性评级的体系，包括总体指数（overall score）、设施和服务可达性指数（amenities score）、休闲可达性指数（leisure score）。考虑因素包括街道密度、交叉口复杂性、兴趣点（POIs: Points Of Interest，如餐馆或公园）的存在、人口密度等。分数越高表明地区内的兴趣点步行

可达性越高。其他因素如街道类型、汽车限速和街道交叉口等也能够增加或减少分数。

3.4 三种步行性网络评价工具的比较

从开发动机看, Walkability APP 的设计初衷在于通过找到影响步行性的因素, 改善街道、社区和城市的可步行性。而美国的 Walk Score 和 Walkability score 主要是为购房者寻找适宜步行可达的房产。步行性作为人们遴选房地产的条件, 是人们选择居住、工作、娱乐和购物的重要因素。

从评价参数看, Walkability APP 的评价指标较为全面, 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Walk Score 和 Walkability score 针对房地产的评价指标更为简洁和实用。Walk Score 和 Walkability score 主要依据地点的可达性进行步行评价; 相比之下, Walkability APP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步行性评价标准, 评价因素涵盖步行道宽度、标志、清洁度和趣味性等重要因素。

从评价有效性看, Walk Score 和 Walkability score 主要是基于现状客观条件数据的网络自动计算, 而 Walkability APP 的评价基于客观数据与大众点评资源结合, 是客观定量评价与主观定性评价的结合。

4 结论与启示

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美国 NEWS、英国 PERS 和新西兰 CSR 系统主要是专业人士从使用者角度, 对步行环境的直观感受为主的定性评价, 以及步行满意度的量化评级。步行性网络评价工具, 如美国的 Walk Score 和 Walkability score, 以及 Walkonomics 公司的 Walkability APP, 其使用对象以普通市民为主, 例如针对其购房的步行环境友好需求, 基于其居住步行环境的物质条件数据采集分析的定量评价。美国的 NEWS 和 Walkability score 系统的开发核心是步行性的经济利益; 而步行性对人与环境的益处则是英国 PERS、新西兰 CSR 和欧洲 Walkonomics 公司的 Walkability APP 开发的核心理念。

同欧美相比, 我国现有的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 借鉴国外相应类型的步行性评价方法与工具, 依据我国城市步行环境的现状条件, 在评价范围和指标设置方面需进行相应的修订, 这是构建符合我国发展现实的步行性测量与评价方法的一项重要步骤。

面向实施的规划制度设计：美国 1920 年代的两部规划立法示范

徐南南

摘要：《区划条例立法示范》和《城市规划条例立法示范》编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 奠定了美国规划制度的基础。本研究纠正了既有文献对两个文件名称的误解性翻译。通过分析这两个文件所设计的部分具体制度, 并与我国的类似制度设计相比较, 发现两文件为美国设计的规划制度更面向实施。研究分析了这一特点的成因, 指出其面向实施的制度设计对解决我国规划制度“重编制, 轻实施”的问题有所借鉴。研究提出在更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就规划实施作出具体的程序性规定的政策建议, 并设想了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规划实施立法咨询委员会, 为地方政府规划立法编制“立法示范”的实施方法。

关键词：美国规划；区划；规划实施；规划制度；立法

引文格式：徐南南. 面向实施的规划制度设计：美国 1920 年代的两部规划立法示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11-116. DOI: 10.22217/upi.2017.338.

学过西方规划史都知道, 美国有个区划授权法, 早在 1920 年代就有了。如果真正去看看这部“法律”就会知道, 教科书上讲得不大准确。实际上这个区划授权法并不是法律, 而是一个研究报告, 是美国联邦政府组织编写的“立法示范”, 告诉各州政

府如何制定区划法规。同样道理, 还有一个报告是教州政府如何制定城市规划条例的, 两个文件的英文原名分别是 A Standard Zoning Enabling Act 和 A Standard City Planning Enabling Act, 正确的译名应当是《区划条例立法示范》和《城市规划条例立法

示范》。

我们在理解他国规划制度的时候往往“推己及人”，以本国的制度推测他国的制度。我们有一部全国性的《城乡规划法》，就想象着美国也有这么一部法律，所以就把这个报告翻译为《区划授权法》了。美国是联邦制，我们是单一制，这其中的差别很有意思。美国实际上并没有相当于我们的《城乡规划法》这样的全国性规划法律，因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进行空间规划的权力。按照美国宪法的逻辑，所有没在宪法中写明由联邦政府行使的权力都可以由州政府行使。

所以，欲对空间进行规划，非得由州政府来立法不可。两个文件中“enabling”一词——之前翻译为“授权”——是要授什么权呢？按照美国政制的法理，是由代表全州人民的州议会授予权力给地方政府制定区划（zoning），即将土地划分功能区，按照分区对使用土地的活动进行控制。这是一件侵犯个人财产权的事儿，所以必须郑重其事地授权，谨慎地施行。城市规划也如是。美国以自由立国，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深入人心，由一个政府机构来“规划”城市的发展，是违背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同样需要谨慎地授权施行。

今天如果看美国各州的区划和城市规划条例

就会发现，二者大同小异。原因是它们都脱胎于这两部立法示范。这就要看到推动立法的人——胡佛商务部长和 1920 年代的时代精神了。虽然美国崇尚经济自由主义，但是 20 世纪初垄断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纷争，以及经济发展给人、自然环境和生产活动带来的破坏都越来越要求政府积极主动地立法、行动、干预经济。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运动时代（progressive era）。赫尔伯特·胡佛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商务部长，他就是个进步主义者。他认为，政府的干预会让社会更加进步，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说的那样，扭曲市场。是他积极推动两部立法示范的编写，并随之产生了 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美国规划立法运动。

我们今天看美国近百年前的规划立法示范的意义何在？在于学习他们的立法技术和以实施为导向的制度设计。这实在也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制定规划法规和编制规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否则就会面临违宪诉讼。在全面依法治国、设区的市被赋予立法权的新时代，学习借鉴美国的规划立法大有裨益。想了解其中详情，还请继续关注《国际城市规划》将要刊载的笔者文章《面向实施的规划制度设计：美国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两部规划立法示范》。

百年英美城市规划教育演变与启示

谭文勇 冯雨飞

摘要：通过对英国和美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百年来发展历程的整理与分析，发现两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演变动向与规律基本一致。文章归纳出英美两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发展的五个阶段与轮回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的现状，认为应该从明晰学科拓展和规划本体的关系、平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关系、发挥教育评估委员会的积极作用等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

关键词：城市规划教育；演变；英国；美国

引文格式：谭文勇，冯雨飞. 百年英美城市规划教育演变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17-123. DOI: 10.22217/upi.2017.240.

英国和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有着百年的历史，百年来，他们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1 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发展历程

粗略地看，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实践设计阶段。20 世纪初到二战以前，美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以物质性的空间形态设计为导向，课程以市政设计、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设计为主要内容，教学方法以实际项目设计和工作坊为主要手段。研究与设计并重阶段。二战后到 1965 年前，以

芝加哥大学掀起的“芝加哥经验”为标志，城市规划的专业教学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空间形态规划，迈向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城市研究与空间设计并重的阶段。

多元化阶段。196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被视为金科玉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方式受到挑战，社区运动、社会批判、倡导性规划、沟通行动成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体回归阶段。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城市规划界掀起了“寻找规划核心”的运动，认为城市规划应该回归（home-in）到其实践学科的本质中，城市规划教学中物质空间形态设计的内容重新被重视。

2 英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发展历程

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的城市规划教育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形成阶段。英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是从建筑学、工程学和测量学中发展出来的，成立之初的英国城市规划专业同美国相比，更偏重于建筑学，非常强调工作坊（studio）的教学方式，特别注重单色及彩色渲染等绘图技巧的训练。

巩固阶段。二战以后，英国的城市规划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大学和社会学界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与加强。受大洋彼岸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开始尝试向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拓展。

碎片化阶段。1970年代，随着学生数量的扩大，教师的数量和来源渠道也扩大了，城市规划专业开始向外拓展，皇家城镇规划协会的指引由注重规划设计的技术过程向关注社会与环境冲击的规划决策进行转变。到1980年代，城市规划成了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专业，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在学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重构阶段。1990年代，城市规划的教学体系再一次从社会科学扩展到自然科学。规划师被鼓励充分利用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生物、地质、建

筑、工程、房地产等学科领域的知识，专业无限拓展的结果使其成为一个“多层蛋糕”（layer cake）。

成熟阶段。2000年后，当城市规划的学科领域拓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范畴后，对空间领域的关注日渐淡薄，专业核心空洞化和专业边界含糊化的现状引起了学者的热议，向空间性回归成为找回专业核心的重要手段。

3 英美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轨迹与启示

（1）英美城市规划教育的演变轨迹

总体看来，虽然美英两国城市规划专业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起止时间有所不同，但大体的演进轨迹和动向是一致的，都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市政设计—综合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研究与政策管理—社会批判、生态可持续与沟通行动—回归规划本体。

（2）对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的启示

明晰学科拓展和规划本体的关系。纵观百年来英美两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历程，都经历了起步—发展—空心化—本体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提醒我们，空间性是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当前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在强化学科领域的宽泛性，增加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等相关学科知识点的同时，始终要围绕学科的核心——空间性来建设，避免重走英美曾经走过的弯路。

平衡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关系。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有很强的研究性，又有典型的实践性、应用性，因此，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需要在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中找到平衡点。

4 结语

从实践设计为导向（design-oriented）转向理论研究为导向（research-oriented），再回归到空间性（return to spatiality）的这一个轮回，应该最能概括英美两国城市规划教育的范式与转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英美两国的经验教训，完善我国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体系，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

论荷兰《空间规划法》规划制定权力的垂直分配与纠纷解决

赵力

摘要：在荷兰地方分权的单一制背景下，空间规划权力以“自治原则”和“权责统一原则”为原则在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享有编制体系规划和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市级政府则享有编制体系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为了保障中央规划目标的实现、维护地方自治权力的发展空间，荷兰设置了协商机制、强制性规划、规划指令和规划诉讼等制度对于中央和地方利益进行平衡。荷兰经验对于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的改革和规划体系内部的良性运转机制的建立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单一制；地方分权；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引文格式：赵力. 论荷兰《空间规划法》规划制定权力的垂直分配与纠纷解决[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24-131. DOI: 10.22217/upi.2017.124.

荷兰是一个实行地方自治的单一制国家，空间规划权力在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之间本着自治和权责统一原则进行划分。如果各级政府能够按照理想的权力分工各司其职，那么大家也也就相安无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各级政府之间经常上演权力冲突与争夺的戏码。如何有效分配规划权力，一方面让地方政府能够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合理安排地方土地利用事宜，另一方面又能有效防止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冲突，或防止更广泛的省乃至国家利益成为地方利益的牺牲品，这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为了保障中央规划目标的实现、维护地方自治权力的发展空间，荷兰设置了协商机制、强制性规划、规划指令和规划诉讼等制度，以平衡中央和地方利益。荷兰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享有编制体系规划和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市级政府则享有编制体系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体系规划是对空间开发的总体设计；土地利用规划是对于规划区范围内允许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等内容进行的计划和安排，是荷兰空间规划制度的核心；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是指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规划部长有权依法批准适用于特定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该规划是在事前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强制

实施的一种规划。在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的规划范围内，省和市编制的土地利用规划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为了保证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之间的沟通无效时国家规划权力的实施，荷兰授予上级政府制定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以及颁发规划规则、规划指令的强制性权力。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中央政府过于强势，侵犯地方的自治权力，授予省、市级政府对于强制性土地利用规划、地点的明确且不具有变通空间的规划指令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试图通过司法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来约束上级政府规划权力的行使。

我国的单一制体制，以及《城乡规划法》所建构的以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主体的城乡规划制度体系，与荷兰有一定的相近之处。而在我国城乡规划制度内部，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上级规划与下级规划之间的冲突齟齬却使得规划的制定批准程序烦琐漫长、规划实施步履维艰。究其原因，除了实施层面的问题，规划制定权的建构上也仍有改进的空间。荷兰的制度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连锁型”都市再生策略研究——以日本东京大手町开发案为例

施媛

摘要：大手町地区位于日本东京经济中心，寸土寸金的土地使其聚集众多全球性企业总部大楼，高层与超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平均容积率高达 7.0 左右。如何使如此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区在保障众多企业正常运营

的同时实现都市再生,是大手町地区城市更新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本文系统剖析大手町地区整合周边资源、以种子基地为引擎、不动产证券化、产官学三方合作等都市再生策略,详细解读其“连锁型”接力更新过程;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我国城市更新提出政策保障、设计策略、服务管理三个层面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 大手町; 连锁型; 都市再生; UR 都市机构

引文格式: 施媛. “连锁型”都市再生策略研究——以日本东京大手町开发案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32-138. DOI: 10.22217/upi.2016.131.

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短缺,传统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发展新城新区的粗放式规划已经难以为继,城市更新成为现今城市规划的主旋律,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大手町地区位于东京的经济中心地,自 1986 年实施都市再生计划以来,面对高密度的挑战,以及更新过程必须保障众多企业正常运营等一系列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连锁型”都市再生策略,通过第三方机构以及运用种子基地的置换手法,先带动面积 1.3 hm² 的“大手町重划地区”的更新,随后循序渐进地推动整个区域 40 hm² 范围内的老旧建筑全部活化,最终,大手町蜕变为符合现代需求的国际商业据点。在渐进式地改善城市空间环境的同时,延续了城市的空间格局。

大手町地区通过整合周边资源,营造成熟的市场环境;以种子基地为引擎,持续“连锁”更新;不动产证券化,筹措民间资金;产官学三方合作,共同谋划城市发展等都市再生策略。总结其针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包括:(1)政策保障层面:以政

府引导为前提,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城市更新运营机制;(2)设计策略层面:以更新最小化为原则,建立可持续的市场开发模式;(3)服务管理层面:以“民”为本,搭建平等的信息互动平台。

随着我国城市功能布局、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传统大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集约、环境友好和内涵发展的模式所取代,城市更新将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成为带动城市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城市更新区域也会由传统的老城区、工业厂房扩大到中心区、居住区甚至新城区等更加广义的范围。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城市环境,城市更新如何在政策制度、设计策略、服务管理等层面予以应对,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文章以日本东京大手町开发案为例,系统地剖析其整合周边资源、种子基地为引擎、不动产证券化、产官学三方合作等都市再生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城市更新的相应策略。希望借此案例剖析,能够拓展我国城市更新的设计思路。

北非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演变

张楚楚 肖超伟

导读: 北非地处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的交界地带,是世界上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该地区城市发展演变深受历史及多重文化的影响。文明交往的过程既伴随文化的共存与融合,也带来文化的冲突与摩擦,而城市作为文化的载体与结晶,成为此种冲突的重要外显。将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以及独立时期。通过分析北非城市在多次文化激烈碰撞下的剧变,我们发现,以城市为依托的文化融合与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文明交往与冲突致使城市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城市职能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密度、地标等城市物质空间的改变;道路命名、节日庆典、宗教活动等抽象空间的改变。笔者实地调研发现,北非城市在空间结构、尺度、密度、风格等方面差异显著;北非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需要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延续不同区域的城市肌理,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基础上,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城市规

划和开发项目。

引文格式：张楚楚，肖超伟. 北非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演变[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3): 151-158. DOI: 10.22217/upi.2017.229.

北非地处阿拉伯半岛、非洲与地中海的交界地带，是世界上多种文明的交汇之地，该地区城市发展演变深受其历史演变及多重文化的影响。首都开罗既有古埃及时期建造的吉萨金字塔群，又有阿拉伯时代建造的老城区，还有独立后建造的新城区。不同时代风格迥异的城市肌理交融共存，汇成北非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的步伐空前加强。然而，笔者在对北非地区的深入调研和对北非地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的采访过程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参与当地规划与建设时，常常出现由于前期不了解不同区域、城市及街区在空间结构、尺度、密度、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后期成本大幅增加的问题。本文探讨北非多次剧烈的文明更替的历史对当代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影响，为思考当前北非的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以减少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北非城市的演变历程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古埃及与迦太基时期、罗马及拜占庭统治时期、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欧洲殖民时期与独立时期。在不同历史阶段，该地区在城市人口构成、城市职能、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抽象空间、城市发展规划与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城市的物质空间层面，由于历史上的征服者根据本土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改造被征服城市，北非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现出多种文明的特色。其结果是该地区当代的典型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独立后新城、殖民地时期新城、阿拉伯与奥斯曼老

城并存的多中心结构，且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城市肌理相互交织的特点。

其次，在抽象空间层面，不同文明在进入北非之时，都将本土语言作为征服地区的官方语言，同时通过宗教输出、文化输出等方式改变这些城市的抽象空间结构，以期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例如布尔吉巴大街，当地人称之为 Avenue Habib Bourguiba，其中 Avenue 为法语“大道”之意，Habib Bourguiba 则为突尼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的阿拉伯语名字。道路两旁的布局仍然是法式布局，而且保留了圣文森特德保罗大教堂，但就在教堂边不远处，屹立着中世纪著名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aldoun）的雕像。

此外，在人口结构及城乡差别层面，在历史长河中，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乃至法国人对北非的征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的控制，因而诸多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对人口和空间结构的影响局限于沿海城市，北非广大乡村与偏远山区依然保留着血缘家族、部落首领权威和柏柏尔民族文化传统，并且，由于缺乏公共基础设施，城与乡、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二元风貌及地域分异。此外，由于当代该地区首都城市吸纳了各地的资源，首都城市与地方中小城市在发展速度和所处阶段上也出现巨大的差异。

由此看来，针对北非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开发，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在保护历史文化建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和融合不同时代、地方、功能的建筑与城市肌理，开展符合当地特色的城市的规划和开发项目。

2018年第5期文章目录

本期主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当代城镇化

亚瑟·敏赛特, 著; 曹康, 刘梦琳, 译 / 中小城市是非洲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

周君, 周静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镇化陷阱及破局之路: 论中国投资对非洲城镇化的影响

柏露露, 赵胜波, 王兴平, 郑洁玲 /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

王佳文 / 殖民城市、贫民窟和新城: 安哥拉共和国首都罗安达的城镇化模式

邵丹 / 津巴布韦首都地区城镇化特征和问题探讨

黄正骊 / 非洲当代城市中的贫民窟与非正规社区: 以内罗毕为例

韩笋生, 埃里克·盖伊西耶, 杨跃龙 / 加纳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研究

王沐塔, 孙浩, 殷成志 / 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对埃塞俄比亚城市减贫的影响:

以亚的斯亚贝巴为例

许闻博, 乔基姆·迪特尔, 王兴平, 徐嘉勃 /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城乡研究

田宗星, 李贵才 / 基于 TOD 的城市更新策略探析——以深圳龙华新区为例

王倩娜, 谭敏, 何昕, 罗言云 / 高密度都市区绿地系统规划的构成及特征研究:

以东京都 23 区为例

王卉, 谭纵波, 刘健 / 英国大伦敦地区建筑高度控制探析

规划研究

罗超, 王国恩, 孙靓雯 / 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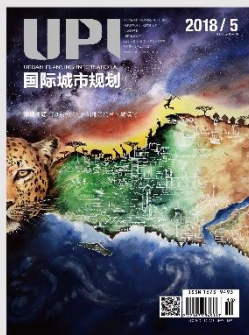
周姝天, 翟国方, 施益军 / 英国空间规划的指标监测框架与启示

李志林, 包存宽, 沈百鑫 /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实践综述

张博程, 赵志庆, 王清恋 /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研究及思考

傅舒兰 / 日本《景观法》制定过程的基础研究——聚焦关键人物西村幸夫及其方法框架



2018年 第5期

中小城市是非洲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

亚瑟·敏赛特 著 曹康 刘梦琳 译

摘要：非洲城镇化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居民低于 30 万的小城市的增长占到近期城市增长的 58%。这种增长势头会加速，至 2030 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 8.24 亿人。少于 100 万居民的城市对这一增长的贡献将达 77%。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可能会影响到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败。城乡之间的强力联系为提高产能和减贫提供了巨大潜力。如果没有合理的计划，快速城镇化将导致高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约 62% 的非洲城市人口可能已经生活在非正式居民点内。非洲治理空气污染花费了 4470 亿美元，占其 GDP 的 1/3，这还是在非洲尚未工业化的情况下。而较小的城市并不具备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每年在治理污染方面花费不到人均 1 美元。55 个非洲国家可划分为 5 个主要类型来显示非洲大陆的多样性。每个群体中的中阶城市可以发挥特定作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联盟设定的“2063 年议程”。如今，只有约 16 个非洲国家有国家城镇化战略，且只有不到 10 个国家了解中阶城市为国家发展所能贡献的潜能。在众多需要采取的行动中，开展有效的多层次治理改革将有助于中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关键词：非洲城镇化；工业化；中阶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层次治理；产业集群

引文格式：亚瑟·敏赛特. 中小城市是非洲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28. DOI: 10.22217/upi.2018.328.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镇化陷阱、破局之路：论中国投资对非洲城镇化的影响

周君 周静

摘要：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特的城镇化路径。之后分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所隐含的陷阱，尤其是制约当地工业化发展的多种原因。文章第三部分从城镇化和工业化在空间和经济层面的关联入手，试图寻找破解资源型非洲国家城镇化困境的办法，并以中信建设集团在安哥拉首都建造的 K·K 新城以及泰达集团在埃及建设管理的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对非投资如何以产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输出“产城融合”以及高品质新城新区的营建模式。

关键词：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工业化；中国对非投资；K·K 新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引文格式：周君，周静.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镇化陷阱及破局之路：论中国投资对非洲城镇化的影响[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29-38. DOI: 10.22217/upi.2018.264.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加速城镇化和城市增长。有别于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模式，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镇化路径较为独特。一方面，由于缺乏现代工业体系的支撑，其城镇化缺少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资源出口型国家为主，这些地区的农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体量较小且生产率较低，资源开采本身所创造的就业有限，但资源出口带动的丰厚收入导致了

本地消费的增加，间接催生了服务于本地的生产和服务岗位，成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城镇化效率低、质量差，削弱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过来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特征，如蔓延割裂的城市格局、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直接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较差、工资水平偏高、企业运营成本高，城市集聚所能带来的规模效应和

溢出效应难以发挥。与其他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的情况不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呈现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相互掣肘的态势。

未来几年，非洲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达到 50% 的转折点，破解资源型非洲国家的城镇化困境，必须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联入手。通过改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引导工业向城市聚集、优化特殊经济区等手段，可协助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有助于实现工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和稳步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投资成为影响非洲城市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深度参与非洲产业发展，承担了大

量基础设施建设，并以中非经贸合作方式营建了大量园区。

其中，安哥拉的凯兰巴·凯亚西社会住房项目（简称 K.K. 新城）通过打造高品质城市社区提升了当地的城镇化质量，对产业和就业的带动也一定程度增强了本地的工业化基础，但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卧城”的色彩；而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我国在非洲投资的首个境外合作区，其集群式招商和“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模式创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破解城镇化困局问题上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

柏露露 赵胜波 王兴平 郑洁玲

摘要：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为阐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的发展关系，文章对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整体协调度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失衡。文章进一步解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的内在原因，探讨了中非合作如何推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角色，并指出了深化合作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制造业；中非合作

引文格式：柏露露，赵胜波，王兴平，等. 撒哈拉以南非洲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39-45. DOI: 10.22217/upi.2018.259.

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也称“黑非洲”，泛指撒哈拉大沙漠中部以南的非洲，包含非洲东中西南部共计 47 个国家。近十年来，随着区域政治环境趋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产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经济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也逐步提高。2015 年，撒哈拉以南城镇化率达 41.8%，而制造业产值（MVA）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 9.2%，制造企业也多为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出口产业以初级产业为主。该区域内城镇化率排名前三的国家（加蓬、吉布提、佛得角），工业化率皆未达到区域平均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城镇化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学术界的实证研究皆证实了城镇化与工业化间存在协同发展和互动促进的客观规律。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工业

化程度的重要表征，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率较高的国家，其制造业发展水平却不一定高，与人们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的认知相悖。

文章借鉴杜传忠等学者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系统耦合模型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量化测算和验证、说明。实证结果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关系总体协调度不高，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从区域差异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协调最好，其次为中部和西部，东部国家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问题显著。

就城镇化的内涵和本质而言，城镇化不仅仅包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聚的“人口城镇化”，也需要同时实现城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城市功能

的提升转变。即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发展，入城人口实现由农业从业者向城镇工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的职业转变，城镇基础服务设施逐步改善，城镇人口在城镇中可获得更好的生活，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和扩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发展与“中国经验”相悖，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相背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与制造业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以制造业发展推进城镇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中非合作走进新时代，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矫正产业结构、推

动城镇化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中国发展经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通过引入和转译中国园区模式、联合人才培养、合作共建设施，有望提升其工业化发展水平、增强城镇化产业支撑、优化城镇就业结构、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使产业城镇化、就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与高速发展的人口城镇化相适应。对于中国而言，基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需求，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合作，也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中国制造由“产品走出去”到“模式走出去”的重大现实机遇。

殖民城市、贫民窟和新城：安哥拉共和国首都罗安达的城镇化模式

王佳文

摘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综合发展长期处于世界最落后水平。本文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为例，分析了自16世纪欧洲殖民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种城镇化发展动力（欧洲殖民、自发集聚、当代国际社会对非洲大规模投资），并重点从城镇化发展背景、城市空间布局形态、住房条件和基础设施等角度，对三种类型的城市空间形态（欧洲殖民城市、非洲贫民窟和国际化新城）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应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城市建设成功经验，为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提供借鉴。

关键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城镇化模式；城市殖民；贫民窟；新城

引文格式：王佳文. 殖民城市、贫民窟和新城：安哥拉共和国首都罗安达的城镇化模式[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46-53. DOI: 10.22217/upi.2018.258.

津巴布韦首都地区城镇化特征和问题探讨

邵丹

摘要：研究概括了津巴布韦在南部非洲国家的特殊性，描述并分析了国家独立以后的人口发展与城镇化进程，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关系密切的过程。通过对全国城镇化地区、城市人口及就业分布情况、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首都地区在国家城镇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在都市区范围吸引人口和就业聚集。研究指出，尽管国家总体发展水平停滞不前，但城镇化方面的问题正在累积和显现。城市单中心蔓延、中心区衰退、中低收入住房短缺以及基础设施瓶颈等，极大阻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限的政府应对措施将导致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下降。本文以哈拉雷新城规划建设建议项目为契机开展研究，希望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当代城镇化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关键词：撒哈拉以南非洲；津巴布韦；非洲城镇化；哈拉雷都市区

引文格式：邵丹. 津巴布韦首都地区城镇化特征和问题探讨[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54-61. DOI: 10.22217/upi.2018.235.

国内非洲研究专家舒运国指出，非洲国家的城镇化并非工业现代化的结果，而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农业经济发展不足，致使大量农业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的，相应产生的城市病问题严重。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非洲工业化程度落后于城镇化，本专辑第一篇主题文章的作者亚瑟·敏赛特也持这一观点，并基于此提出中阶城市在缓解非洲大城市病、提高农村生产率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本文以一个规划项目为契机，研究了津巴布韦首都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希望对宏观的城镇化研究有所补充。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进行了数据更新和文献的补充研究，作者所见所感已是三年之前（2015年），此后津巴布韦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读者加以甄别。

1 津巴布韦的独特性

津巴布韦国情在南部非洲国家中具有独特性。

第一，津巴布韦是非洲最晚独立的几个国家之一，也是少数独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国家，主要城市和基础设施基本完好，首都哈拉雷是南部非洲重要的大都市和宜居城市。

第二，独立前的津巴布韦被誉为“非洲面包篮”，农业经济基础较好，但独立后受国际关系和国内政策等影响，国内经济形势经常反复。特别是2000年政府发起的快速土改运动，使津巴布韦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是农场经济的崩溃和经济严重衰退，到2009年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一百万亿津元成为人类货币史上最大面额的货币。

第三，得益于独立后大规模的教育公共投资，津巴布韦识字率在整个非洲位居第一（92.5%），是非洲重要的劳务输出国家。

因此，津巴布韦的城镇化问题，难以用简单的人口自然增速高和农业经济发展不足来解释。事实上，政府长期执行了去中心化和放权地方政府的抑制城镇化政策，一定程度掩盖了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观察研究发现，尽管国家总体发展水平停滞不前，但城镇化问题正在累积和显现，可以说“穷病”和“富贵病”同时存在，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 穷病——容易理解、情况类似

（1）人口总体流出

从国家层面来看，除独立之初人口经历了短期

的快速增长，1997年以来人口出现持续的负增长，经济衰退是引发大规模人口外迁的主要原因。此后，虽然人口总量有所回升，但仍大大低于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持续的净流出。移民状况调查报告表明，净流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2%，移民既包括技术人才的流动，也包括贫困人口的移民，非正式移民和通勤人员也占比不少。据统计，前往南非和博茨瓦纳的日通勤人数达63万人，约有150万津巴布韦人在南非居留。

（2）城镇化水平低

非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快速城镇化，总体城镇化水平达到40%，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津巴布韦全国城镇化率约32%，按照一般经验已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但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止步不前。201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将其列入四个逆城市化国家之一。这一现象与快速土改运动有一定关系——一些城市居民返回农村。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受统计方法影响，大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蔓延可能未被计入有效统计。

（3）首都地区核心作用突出

首都哈拉雷的人口规模是第二位城市布拉瓦约的2倍，是第三位城市的4倍。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哈拉雷两次人口普查期间迁入人口比重超过30%，而同期其他城市人口，包括第二大城市在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遥感影像的分析，1984年建成区面积约118.6 km²，到2013年达到342.2 km²，人口聚集与用地扩张明显。尽管在此发展阶段一直有主张发展中小城市代替大都市的声音，但哈拉雷找工作的难度仍然最低（按雇员数/城镇人口数衡量），提升首都承载能力显然是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切实选择。

（4）基础设施状况恶化

哈拉雷的各项市政基础设施已疏于维护多年，供排水问题尤其突出。除供水规模缺口以外，城市水源是城市排水的主要方向，水源和水质难以保障。2018年9月，津巴布韦卫生部长宣布，哈拉雷因超过2000人感染霍乱，宣布进入霍乱紧急状态。而2008年发生的疫情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感染人数超过4万人。此次霍乱爆发即源于西南郊的高密度居住区，由于下水管爆裂导致水源被污染。

3 富贵病——殖民地的“特殊遗产”

(1) 大都市区蔓延式发展

中国在与津巴布韦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时期，并没有产生大都市区的概念。这与当时交通机动化水平不高、户籍政策限制等原因有关。而津巴布韦首都地区已形成都市区，由狭义的哈拉雷市与周边4座卫星城组成。卫星城的形成由来已久，例如奇通圭扎市（Chitungwiza）殖民地时期建设的非洲裔居民生活区，居民普遍在市区就业，具有明显的卫星城特征。其他大型居住区也不断向郊区蔓延，影像分析表明，近年开发的重点地区是距离市中心15~25km的区域。哈拉雷的城市住宅形态主要为低层院落，城市人口的低密度蔓延极大增加了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成本。

(2) 城市中心区衰退

市中心空心化一般指随着城市的发展，因出现交通拥挤、犯罪率升高等问题，使城市居民向郊区流动，而市中心衰退的现象，一般出现在发达国家。哈拉雷中心区的居住人口密度仅2000人/km²，与其高楼大厦的建成环境非常不一致，商业办公建筑空置严重。

这种情况也与其殖民地发展背景有关，按照过去法律，黑人在城市中心无法拥有土地和住房，而由于白人大量离开，原有资产被闲置。另外，经济衰退使原来城市中心的商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衰退，中心区的店铺出现较多关停或搬迁至郊区的情况，中心区出现了服务设施质量和数量的明显下降，甚至有本地学者称之为城市农村化。

(3) 居住标准高

2012年普查数据显示，哈拉雷的住房特征中，

94%为现代住宅，即具有坚固的建筑结构和一定条件的现代设施。76%的城市家庭接入电力，85%的城市家庭拥有冲水马桶，这一生活标准与其过去优越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关。而目前，城市供电保障率很低，家庭普遍使用自备发电机，而其汽柴油燃料依赖进口，成本很高。

此外，尽管独立后实施了严格的去种族主义政策，但居住社区的隔离依然存在。城东北地区多数为富裕阶层，西南地区居民收入普遍较低，新的房地产开发延续了隔离的模式，由于政府没有能力在短时期全面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成区环境的不断自我强化使居住社区差异不断扩大。

4 结语

其实所谓“穷病”和“富贵病”是相互关联的，然而，这并非本文的重点研究范畴。以上背景介绍更多是想说明殖民国家的特殊性——自1888年被称为英属南罗德西亚以来，津巴布韦经历了近100年的殖民统治，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建设。独立后，虽然一些政策借鉴了我国经验，但事实证明选择正确的道路终究要根植于本国历史与国情。

作为仅去过一个非洲国家的作者，难言对非洲城镇化有多少了解，但以此为契机，在与多方沟通的基础上，收集信息相对全面，期望对于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期间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对未知的非洲大陆、对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加关注”，了解到多样化的发展难题。中国在规划引导城市快速建设方面经验丰富，应能帮助很多非洲国家避免失序的城镇化现象，但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基于不同国情，在尊重其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措施，仍待进一步思考。

非洲当代城市中的贫民窟与非正规社区：以内罗毕为例

黄正骊

摘要：内罗毕正在经历的城市化体现出“多重飞地”的特征。在全球国际资本和本地人口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下所产生的城市贫民窟，在空间上有着拥挤混乱等显著特征，但同时具有复杂的内在组织力量。本文以肯尼亚内罗毕贫民窟为典型的这一高密度、低收入、非正规的贫困人口聚居形成的城市景观，通过探寻它的空间、社会、文化形态来探寻它在全球化和后工业时代的新身份，并结合城市非正规性理论，建立与当代城市相关的非正规社区体系。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及参与贫民窟的改造项目，针对内罗毕几个典型贫民窟的内部组织方式，从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住房建设、社区服务等四个方面来解读非正规聚落的组织形

态，同时对内罗毕作为后殖民城市的非正规性进行了梳理，将贫民窟放置在非正规城市化的宏观进程中进行研究，为研究非正规城市提供文本。

关键词：城市化；内罗毕；贫民窟；非正规城市；城市更新；贫困住房

引文格式：黄正骊. 非洲当代城市中的贫民窟与非正规社区：以内罗毕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62-69. DOI: 10.22217/upi.2018.246.

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发生快速的城市化，在这里出现大量以高密度、低收入、基础设施匮乏为特征的聚居现象，被称作“贫民窟”，有时也被称为“非正规聚落”。“贫民窟”一词带有负面影响，而“非正规性”又被看作城市规划的宿敌。但是作者在对内罗毕几个典型“贫民窟”调研后发现，这些社区不仅深深扎根于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同时具有强大的自我组织力量，不重新认识“贫民窟”，就无法真正认识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历史始于 19 世纪末，自那时起，正规的城市规划与非正规的城市发展之间就一直在不断博弈。殖民时期自上而下的规划打造了城市中心区的网格化街区，而大部分人口和经济增长却发生在这些网格以外，成为城市发展的引擎，也塑造了内罗毕的众多贫民窟。今天，内罗毕“贫民窟”具有各自的社区特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正规房地产市场无法提供的住房。此外，尽管外表简陋拥挤，贫民窟的住房价格实则令人意外地昂贵。内罗毕的贫民窟中租客数量与房东自住数量的比例为 92:8，尽管每个房客所交房租不高，房东仍然可以从高密度的房客那里获得高额的房租收入。根据笔者的取样分析，内罗毕贫民窟土地的单位面积租金远超过富人区，这种蓬勃而又隐形的房地产经济正是大半个世纪以来贫民窟在城市中发展的动力。

另外，尽管市政管理在贫民窟中脱节，贫民窟中的土地管理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则。贫民窟的土地证在市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不受承认，但在上万个

居民中却得以普遍流通，成为贫民窟土地管理的基础。同样，贫民窟内除了住房，还存在大量的服务空间，在街道巷弄里，每隔一两座房屋就可以见到餐厅、小卖部、发廊、小吃店、药店、棋牌室，在 50 万人的马萨雷谷，200 人以上的学校就多达上百个。

贫民窟不仅在内部拥有大量服务空间，也为整个城市贡献了丰沛的劳动力。数据显示，内罗毕贫民窟提供了城市 60% 以上的劳动力。早上 7 点站在内罗毕最大贫民窟“基贝拉”的“村口”，你会看到人们从家里蜂拥而出，涌进城市的餐厅、酒店、工地。贫民窟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工厂，并且他们内部的（非正规）社区网络正吸引更多的乡村移民。

在我们认识“贫民窟”的正常秩序中，“视觉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认为只有看起来有秩序、几何构图合理的城市才是合理、有效的城市。这种方法在研究贫民窟时显然失效了，因而针对贫民窟的“拆迁”工作也多失败了，这些所谓的“社会住房”项目，要么因拆迁代价太大而收效甚微，要么以居民无法负担维护费用而搬回贫民窟居住告终。

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在发生的快速城市化，伴随着贫民窟的迅速扩张，城市公共部门有效性的缺失，国际投资者和本土社区力量的博弈，这些突出特征都是以西方城市为蓝本的城市规划学科未曾触及的新问题。而研究这些城市 and 他们的社区，将为城市规划者打开新的思路。

加纳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研究

韩笋生 埃里克·盖伊西耶 杨跃龙

摘要：近 30 年来，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快速的城镇化。与此相伴，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也在许多非洲地区出现，且已成为当地实现城镇化的标志性现象之一。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居民点现象，

为进一步认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本文以南部非洲国家加纳为研究对象，考察非正规居民点对当地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以期对中国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镇化；非正规居民点；南部非洲；加纳

引文格式：韩笋生，埃里克·盖伊西耶，杨跃龙. 加纳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70-78. DOI: 10.22217/upi.2018.275.

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快速城镇化的缩影。70年来，其城镇人口的比例已从1948年的13.9%增长到目前的51%。同时，大规模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也在加纳城市中出现，成为城镇化的标志性现象之一。快速城镇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加纳的非正规居民点，为进一步认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加纳城市的非正规居民点在城市内和城市边缘都大量存在，非正规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约为45%~70%，它们分布在非法居民点、原住型居民点和购买型居民点中。非法居民点在1990年代高速城镇化时期大量出现，主要由贫困的城市移民私自修建，用于自住和工作。原住型居民点是一些传统的早期居民区，大都建于1945年之前，但由于年久失修和社区环境衰败，最终都成了贫民窟。购买型居民点是指那些根据传统习俗购买了土地所有权，但没有获得官方审批或获取规划许可而修建的居住点。非正规居民点往往都拥有自发的草根组织，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形成了一整套自我管理和组织模式。在各类地方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这些草根组织积极向政府争取权利，有效地保障了当地居民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

大量的非正规居民点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为城市低收入居民解决了住房问题，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也为整个加纳的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在加纳，约有565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5%）通过非正规居民点来满足他们的居住需求。这些居民通常从事零售、食品加工、安保、维修、建筑和手工制作等工作。在2000年，加纳全国80%的就业岗位是由非正规行业提供

的，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86%。与此同时，非正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加纳全国GDP的31.4%，占非农产业GDP的比重大约是58.3%。

关于非正规居民点对城市环境影响的评价仍存在分歧。主流观点认为，非正规居民点带来了城市环境污染，例如，修建在低洼地的住房以及非正规居民点产生的垃圾堵塞了排水沟，导致一些城市出现洪灾，给所在城市的环境品质和卫生安全带来隐患，对居民健康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非正规居民点内的贫困居民通过收捡垃圾和回收利用为城市垃圾处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对一个垃圾管理十分落后、全民缺乏垃圾分类意识的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在加纳，非正规居民点的形成是因为少数城市不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超出了当地城市用地、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迫使低收入群体依赖非正规渠道解决住房需求，最终导致非正规居民点的形成和壮大。虽然从整体上说城市非正规居民点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交通可达性差、环境卫生状况差、安全性差等，但这些非正规居民点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和当地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了积极的影响。它们帮助城市新移民快速融入社会、给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同时促进了城市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

对加纳快速城镇化中城市非正规居民点的研究可以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或完善城镇化政策提供启示。

（1）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有双面性的影响。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城镇化尤其是快速的城镇化还可能带来地区差距拉大、城市贫困人口聚集、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

（2）城市非正规居民点有其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而出现的城市非正规居民点能在政府能力有限的状况下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居住和

生活场所，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3) 城市非正规居民点的自组织能力在城市管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政府如果提供更

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咨询服务，将会更好地引导和帮助这些居民改善居住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融入城市生活。

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对埃塞俄比亚城市减贫的影响：以亚的斯亚贝巴为例

王沐塔 孙浩 殷成志

摘要：贫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掣肘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亚的斯亚贝巴市的案例研究，来评估该市2005年推出的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在何种程度上为减轻城市贫困做出了贡献，并评估在实施该计划方面遇到的挑战。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理论支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调查问卷作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通过随机和系统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增加了家庭收入和节约水平，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女性权益，保障了公民的居住权等，对城市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城市化；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城市贫困；减贫；亚的斯亚贝巴；政策评估

引文格式：王沐塔，孙浩，殷成志. 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对埃塞俄比亚城市减贫的影响：以亚的斯亚贝巴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79-85. DOI: 10.22217/upi.2018.254.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之角，与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南苏丹五国接壤，拥有100万km²的国土面积，全国人口超过90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贫困人口。该国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45%。由于常年干旱与饥荒，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城市人口骤增，城市贫穷加剧。联合国人居署的研究表明，在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半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城市居民失业率接近42%，女性的失业情况更为严重。居民每天的平均收入低于两美元且大约60%的收入来自非正规经济活动。从住房质量来讲，25%的住房没有卫生间，27%的住房没有厨房，50%的住房所在社区的道路泥泞不堪。从住房供给结构来讲，80%的居住区是贫民窟，70%左右的住房供应来自于政府发放的廉租房，97%的住宅是单层房屋。从居住权保障来讲，只有34.4%的住房是业主个人拥有。这些住房窘境导致乞讨和卖淫活动潜滋暗长，无家可归者不断增多，失业人群居高不下。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多伴随着工业化发生和发展，而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国家却正在经历“没有增长的城市化”。贫穷国家的城市化具有非

同寻常的艰巨性，在缺乏市场自然形成的发展动力的前提下，非洲国家需要因地制宜的配套政策来解决非正常快速人口膨胀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在世界银行综合发展框架指引下，一种新型的城市治理思想产生——“集成住房发展项目”。该项目意味着要通过物质、财政、人力和社会资产等各方面的集聚来补齐短板，实现协调发展。它紧紧围绕“补”“促”“减”“增”四个方向迅速推进项目并快速取得绩效。首先，以大规模住房建造来迅速补齐房屋短缺，改善住房质量；其次，围绕住房项目发展相关小微企业促进穷人创收，改善贫民的消费困境；第三，通过技能、商业培训提高居民的就业能力，减少无业游民的数量，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最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发展增强生产力，激发社会活力。

本文在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指导下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进行数据统计，力图全面评估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对埃塞俄比亚城市减贫的影响。文章以可持续生计评估框架作为理论支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调查问卷作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通过随机和系统抽样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为了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路径，评估系统囊括多维的政策参与者，

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

研究以家庭为单位，于 2016 年从亚的斯亚贝巴的 11 个市辖区中随机抽取 2 个市辖区——内法斯·斯力克·拉菲陶(Nefas Silik Lafito)和博尔(Bole)作为抽样框，针对该项目相关者，随机抽取 240 个样本。经过分析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集成住房发展项目能够积极促进城市减贫。集成住房发展项目通过改善居民经济和健康状况，提升妇女权益，保障住房产权，优化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状况等，对改善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境况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项由政府主导的住房改革项目不失为一项重

要的减贫战略。更进一步讲，非洲的城市治理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亚的斯亚贝巴的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在实践中证明了恰当政府主导项目对城市减贫的作用。这为广大非洲国家城市贫困治理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借鉴，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值得在非洲其他城市推广。

综上，本文在理论上将有利于促进非洲城市发展领域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实践上，将有利于各方明晰项目目标和效果，以致力于改进计划、推进项目持续进展。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许闻博 乔基姆·迪特尔 王兴平 徐嘉勃

摘要：埃塞俄比亚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历史上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在进入近代化进程以后，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规划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非洲国家城市规划历史的缩影。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既有国际先进理论与经验的影子，又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与现实约束。本文根据亚的斯亚贝巴建城以来的城市规划实践，分析了其百年来五个阶段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与特征，梳理发展脉络。认为其百年来的规划发展脉络受到政治环境变化与规划性质演变、技术方法进步与空间布局调整、绝对空间理想与规划实施的博弈这三组主要矛盾的强烈影响。本研究希望能进一步补充完善非洲城市近现代史学研究，并为非洲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与城市规划的发展提供经验与依据。

关键词：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规划史；非洲城市规划；非洲近现代史

引文格式：许闻博，乔基姆·迪特尔，王兴平，等. 亚的斯亚贝巴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86-92. DOI: 10.22217/upi.2018.262.

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是东非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国际交往中心。本文所研究的城市规划时间段为 1886 年建城至今埃塞俄比亚进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时期。从柯布西耶到阿伯克隆比等国际规划师，再到埃塞俄比亚本土规划师，均在亚的斯亚贝巴留下了丰富的城市规划实践。

纵观亚的斯亚贝巴百年来的规划史，可以清晰观察到以下三条脉络的变化。其一，随着政治环境变化，规划性质发生了从殖民主义的纯西方的输入式的规划，到具有一定计划经济属性的规划，再到经济发展导向的规划等重大改变。其二，技术方法层面，从柯布西耶规划到阿伯克隆比，历版规划方

案都紧追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进程，规划思路与技术传到的时效性很强。其三，各个版本的规划方案不断在理想空间与现实的规划实施之间摇摆，是一个“理想—折中—理想—折中”曲折的循环上升过程，面临理想方案与可操作性的反复。

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规划体系源于柯布西耶带来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又在各个时期接受了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一直在先进的规划理念与当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设水平之间曲折发展。如何在吸纳先进国际经验的同时，又能在有限的经济水平下实现城市规划效益的最大化，培育出符合当地情况的规划体系，是其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命题。在未来的对非工作中，如何总

结我国城乡规划制度与技术发展有效助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并思考其如何在非洲工

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提供相应的参考和借鉴，也是研究其百年来城市规划历史的必要性之所在。

基于 TOD 的城市更新策略探析——以深圳龙华新区为例

田宗星 李贵才

摘要：在土地资源约束和小汽车大量增加的背景下，传统的城市更新面临成本高昂、交通拥堵进一步恶化、社会分化加剧等困境。国内外研究表明，TOD 模式能够促进城市紧凑发展，降低小汽车出行，促进各阶层的融合，并带来公共交通沿线物业的增值。基于此，本文在总结 TOD 内涵和原则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合 TOD 理念的城市更新策略，从选址、功能定位和规划设计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并分析了可行性和有效性。然后，本文分析了深圳市龙华新区通过地铁 4 号线引导城市更新的应用实践，总结了该策略的实施路径及其成效。理论和实践分析证明，基于 TOD 的城市更新策略是可行的，能够应对传统城市更新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城市更新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公交导向开发；公共交通；城市更新；深圳龙华新区

引文格式：田宗星，李贵才. 基于 TOD 的城市更新策略探析——以深圳龙华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2018(5): 93-98. DOI: 10.22217/upi.2016.148.

在市场经济和小汽车大量增加的背景下，传统的城市更新面临着成本高昂、交通拥堵、社会分化等困境，亟须借助 TOD 理念转变更新策略。

1 基于 TOD 的城市更新策略探析

基于 TOD 的内涵和“5D”原则【合理距离(distance)、目的地可达(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高密度(density)、功能混合(diversity)、良好设计(design)】，本文从选址、功能定位、规划设计三个方面探讨城市更新的改进策略及其效用。

选址：城市更新要尽可能靠近公共交通站点，充分利用公共交通的运能和物业增值效应，提高项目的交通和经济可行性。

功能定位：城市更新的功能定位要尽量丰富和完善轨道沿线及站点地区的功能构成，提高公共交通目的地可达性，建立基于公共交通线路或网络的紧凑城市区域，使居民可以通过公共交通线路或网络达到较多的目的地，满足居民大部分的出行需求，降低对小汽车的依赖，从而进一步缓解城市更新项目的交通压力。

规划设计策略：站点地区的城市更新要进行与公交运能相匹配的高密度开发，为公共交通提供客流的同时，也给城市更新提供更大的盈利空间；城

市更新要提高项目本身和整个站点地区的混合度，包括商业、居住、公共服务等不同城市功能的混合，以及高、中、低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步行友好，设施齐全，尺度宜人，丰富有趣的街区环境设计是鼓励居民非机动车出行的重要条件。

2 深圳市的实践探索

龙华新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北侧，该区域面临以下几个严峻问题：用地紧缺、产业亟须转型、交通拥堵。

2.1 策略 1——轨道交通引导城市更新

轨道交通线路选址兼顾城市更新潜力。4 号线首先确定在原龙华镇中心周边设置站点，以缓解道路的交通压力。但是 4 号线并没有选择最近的路径连接这里，而是绕到工业用地集中的上塘和龙胜片区。因为最近路径需穿过数个城中村，而城中村内聚集的主要是村镇集体工业的务工者，对外交通需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城中村更新成本高、周期长、动力不足，不利于推动区域转型升级。相比之下，上塘和龙胜周边以工业用地为主，产权清晰，再开发成本低、周期短，能迅速带动区域发展新兴产业，改善区域建成环境。

城市更新项目选址靠近轨道交通。确定轨道交

通线路选址的同时，深圳市开始重点推动站点周边的城市更新工作，包括拆迁补偿谈判、土地收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调整、土地出让等。为加快轨道交通沿线的城市更新，深圳市和龙华新区采取了多种手段。首先，以容积率奖励提高开发商利润空间——站点周边的城市更新项目可以提高0.2~0.6的容积率；其次，在城市更新项目审批阶段，临近站点的项目具有优先权；第三，政府对于部分重点项目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加快更新进程，比如龙华地铁站周边原龙华镇中心边缘的工业区，龙华新区政府承担了大量现状调查、规划编制等前期工作。

2.2 策略2——公共交通导向的规划

规划原则和要求：在项目规划设计层面，深圳市在功能定位、开发强度、混合利用，以及站点保护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引导城市更新项目的规划设计符合TOD的要求。

（1）功能定位。为了保证4号线的客流，规划部门只批准居住、商业办公或新兴产业类的城市更新项目。

（2）开发强度。前文指出，深圳市为鼓励站点周边开发，提高了站点周边的容积率上限，与此同时，站点地区的法定图则还要求站点500m内的开发强度不得低于容积率上限的90%，以保证较高的开发强度。

（3）混合使用。深圳市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土地混合使用。尽管更新项目以居住为主，但是每一个项目都需要贡献3000m²以上并且不低于项目总用地面积15%的公共服务用地，并且按建筑面积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城市中心区在地铁站点1000m范围内，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为8%；如果在500m范围内，则再增加3%】、创新性产业用房、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及市政设施，均能获得相同建筑面积的奖励，而配建公交综合车站、垃圾转运站、变电站则能获得2倍的建筑面积奖励。

（4）步行友好。规划部门要求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要专门研究社区步行系统，并与市政道路的步行系统衔接。此外，城市更新项目如果在地块之间或与周边地块设置架空连廊，将按其对应投影面积获得1倍建筑面积奖励。

（5）历史建筑保护。城市更新单元拆除用地范围内，若保留符合规定的历史建筑并无偿移交给政府，将获得相应建筑面积的1.5倍奖励，如果历史建筑具有重大保护价值，奖励额还将提高。

2.3 效果评价

促进区域转型升级。在4号线和城市更新的带动下，龙华新区地铁沿线地区逐步由较为低端乡镇集体工业模式转变为新型现代化城区，低端的工业制造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生活社区，原龙华镇中心商业功能的规模和档次得到明显提升。

地铁客流明显增加。4号线开通初期，清湖站到深圳北站之间的客流相对较少，随着沿线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客流不断增加，地铁运能得到充分发挥。

地铁沿线物业增值效益显著。地铁沿线的城市更新项目得到市场的积极响应，2010—2015年，龙华新区内4号线沿线的房价涨幅超过200%，而非地铁沿线的涨幅为150%左右。

3 启示与展望

与传统的城市更新相比，基于TOD的城市更新在提高经济可行性、避免交通拥堵、促进社会融合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

深圳市龙华新区内地铁4号线沿线的发展实践表明，基于TOD的城市更新是可行的和有效的。第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更新要紧密配合，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选址要充分考虑城市更新的潜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城市更新构建公共交通发展走廊和TOD社区；第二，要制定合理的政策，鼓励市场主体在城市更新项目遵循TOD原则。容积率和可售建筑面积是开发商能够获取足够利润的关键指标，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奖励能够有效鼓励开发商遵循TOD原则进行项目开发。

高密度都市区绿地系统规划的构成及特征研究：以东京都 23 区为例

王倩娜 谭敏 何昕 罗言云

摘要：高密度都市区内人口密度大，土地价值高，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日本东京都下辖的 23 个特别区是全球最主要的高密度都市区之一。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日本绿地系统规划制度的确立历程；其次针对东京都 23 区“绿地基本规划”展开研究，从规划编制及规划实施两个方面分析了其构成及主要内容；最后，总结并讨论了 23 区绿地基本规划具备的全球视野、本地实践，嵌入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多渠道高密度都市区的规划响应，以及较完善的进程管理及公众参与制度等四项特征。以期借鉴东京的经验，对我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尤其是城市建成区及分区范围内的规划编制及实施提供启示及参考。

关键词：都市区；高密度；绿地系统规划；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东京都 23 区

引文格式：王倩娜，谭敏，何昕，等. 高密度都市区绿地系统规划的构成及特征研究：以东京都 23 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99-108. DOI: 10.22217/upi.2017.262.

高密度都市区人口密度大，土地价值高，是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较突出的区域。日本东京都下辖的 23 区面积 626.7 km²，土地面积占东京都 28.6%，集中了东京都 70.8%的人口。如何有效提升高密度都市区人居环境质量及市民满意度是各区重视的主要工作。日本的绿地系统规划有两个层级，一是都道府县编制的“广域绿地规划”，另一是市町村等自治体编制的“绿地基本规划”，23 区的绿地基本规划属于后者。本文系统地梳理了东京都 23 区的绿地基本规划，从规划编制体系、实施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归纳并讨论了 23 区绿地系统规划的特点，提出了我国城市密集区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和实施可参考的建议。

23 区的绿地基本规划充分体现了各区的特点，结合自身情况进行编排，并无固定的章节构成模式。整体而言，绿地基本规划由规划的基本内容（定位、现状调查、目标体系等），规划的实施（实施方针及策略体系、进度管理等），附录（资料集、问卷样本等）三个部分组成。编制内容方面，各区的绿地基本规划在应对高密度都市区方面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做法，如前期分析和调查中增加了城市热岛效应、视觉绿量、城市水环境等方面的主题调研；结合区民实感指标（满足度、绿感度），以及绿视率、绿化

活动团体数等指标进行目标设定。规划布局方面，重视城市蓝绿生态网络的构建，注重不同尺度间的衔接，针对高密度都市区易出现的城市内涝，提出对应的城市水循环再生修复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修整等措施。实施方面，实施策略体系的构建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它为实施的进度管理、责任主体的明确提供了保证。不同等级的制度保障、多来源资金渠道的建立、多方参与合作平台的搭建则是保障绿地基本规划实施体系顺利推进的坚实基础。

总体而言，23 区绿地基本规划受国家及东京都相关政策指引的痕迹明显，普遍显现出将本地绿地基本规划与更大格局的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热岛效应等问题的应对结合起来的特征。有趣的是，各区规划中均未明确提出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理念，但规划中通过生态网络构建、纳入绿道、小型生物栖息地、屋顶花园营造等方式，充分体现了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不同尺度上的应用拓展。

规划编制在前期调研、目标设定等各个方面，针对高密度都市区的土地利用特点进行积极的规划响应。此外，各区较完善的进程管理制度及多渠道的公众参与机制也是 23 区绿地基本规划的共有特征之一。

英国大伦敦地区建筑高度控制探析

王卉 谭纵波 刘健

摘要：建筑高度是城市形态和整体风貌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城市，控制建筑高度是保护城市历史空间特征的重要手段。但对于承担区域中心职能的大城市而言，单纯扼制城市高度的增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开发容量的需求。以大伦敦地区为例，在城乡规划体系的背景下研究建筑高度控制的理念和手段，探讨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如何在保护城市历史空间环境和促进土地开发之间寻找平衡。英国的城乡规划体系以发展规划为政策指导，以开发许可制度为实施机制，在此背景下的高度控制逐渐形成一个多层面的控制体系。其中界定建筑高度的属性，建立高度控制与规划目的的关联，明确高度控制的边界和范畴，在城市空间上区分不同的控制力度和方法值得我国城市规划借鉴。

关键词：大伦敦；建筑高度；控制；历史环境保护；发展规划

引文格式：王卉, 谭纵波, 刘健. 英国大伦敦地区建筑高度控制探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09-116, 125. DOI: 10.22217/upi.2016.274.

建筑高度是体现城市历史形态的核心要素，控制建筑高度是保护城市传统风貌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城市整体高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特别对于承担中心职能的大城市，适应人口增长且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高密度地利用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以英国伦敦为例，在城乡规划体系的框架下梳理建筑高度控制的思路和技术手段，研究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如何在保护城市历史环境和满足土地开发需求之间寻找平衡。

伦敦的城市规划以国家层面的《国家规划政策框架》为指导，从大伦敦地区和自治市两个层面入手，建立一个以发展规划为核心，以补充规划文件、规划指引、研究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为支撑，以开发许可制度为实施机制的建筑高度控制体系。规划的理念是将建筑高度与城市经济增长、住房、就业、交通、生活场所等内容相关联，重点考量高层建筑对提供办公空间、吸纳就业人口、塑造城市天际线、显现城市现代性等方面的作用，并划分城市空间，将高层建筑的建设限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

建筑高度控制的技术方法强调灵活性和适应性，主要体现在：（1）一般城市地区没有固定的指标控制和最大限高，主要在区位、空间布局、建筑设计等方面提出高层建筑应该如何建设和不应该

如何建设的规划政策，通过具体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加以落实；（2）分别从大伦敦地区和自治市层面，综合经济发展、土地利用、交通、历史遗产保护等因素将城市划分为“适合集中建设高层建筑的区域”“不适合建设高层建筑的区域”和“可以建设高层建筑的区域”，以此控制城市的整体形态和高层建筑的空间范围。从实施效果来看，高层建筑相对集中在某些片区；（3）对特殊地区如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建筑周边地区等进行严格控制，并出于保护城市景观的目的，对位于“眺望景观”和“地方景观”范围内的建筑进行明确的高度限制，在城市重要历史标志物和公众观景点之间建立景观视廊，控制建筑物的最大高度。

通过与英国城乡规划体系的比较，我国可借鉴其控制建筑高度的逻辑途径，建立建筑高度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对城市整体土地开发行为进行有内在逻辑和政策预设的管控。在控制方法上，明确建筑高度控制的范畴和边界，对不同的城市地区加以差异性对待，在空间上区别控制的力度和手段。对建筑高度的增加比较敏感的地区进行管控；在城市一般地区，从高效利用土地、塑造城市形态、体现城市现代性等多方面采用相对灵活的控制方式，局部地区可以放宽高度控制的要求。

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综述

罗超 王国恩 孙靓雯

摘要：空间规划是近年我国政府改革及空间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针对目前我国改革与研究中对空间规划认识不足的现象，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对空间规划概念的内涵演进、典型国家空间规划发展及改革进行剖析，揭示了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潜在的共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空间规划相关研究分析，对未来空间规划改革做出展望：规划目标上，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兼重发展与保护；权力划分上，适度分权，促进集权与分权双向强化；规划运行上，注重空间规划的整合与协调，保障空间政策的纵向传递。

关键词：空间规划；规划体系；规划改革；研究综述

引文格式：罗超，王国恩，孙靓雯. 中外空间规划发展与改革研究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17-125. DOI: 10.22217/upi.2017.013.

1 空间规划的内涵演进

作为区域统筹政策的空间规划：空间规划是根植于欧盟一体化背景下的政策性概念，最初作为一种宏观尺度的区域统筹政策出现。根据“欧盟大纲”，空间规划是公共部门用以影响各种行为未来空间分布的手段。

作为方法论的空间规划：全球化下“模糊空间”和“空间流”的产生，使得土地使用的不确定性增加，同时催生了越来越多新的空间形态，直接导致了传统规划针对既定边界实施空间管控的失效。这种背景下，统筹性的规划手段从区域向国家及地方尺度渗透。空间规划逐渐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物质形态规划的规划方法”，是“将土地使用政策与其他影响土地空间功能的政策的一体化过程”。

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当空间规划的方法论贯彻到不同的政体中，空间规划便体现出“制度属性”。空间规划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由多元角色参与的、对空间资源使用和收益进行分配及协调的治理过程。

2 欧洲典型国家空间规划发展演进

欧洲是空间规划概念的发源地，同时也是空间规划改革实践领域的先驱，英国、法国、德国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并不存在“标准模式”。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空间规划应对也绝非尽善尽美。如英国在“地方主义”分权改革下，空间规划重心的下移使得决策的过程被前置，旨在建立合作与利益协调机制的邻里规划，面对复杂的空间发展论证

与利益博弈过程，仍然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往往导致决策过程延缓，发展效率降低。另一方面，规划的邻里分权受国家规划中“假设支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影响，地方发展存在着较高的市场偏向；德国的空间规划对空间政策的整合仍然不足。欧盟框架下，部分部门政策有着强大的财政预算作为支撑，其运行的影响力往往超过空间规划，从而带来对规划实施的冲击；法国在一系列分权改革下，政府的空间规划调控能力大幅减弱，财权与空间治理事权向“地方集体”的转移促进了地方自治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另外，作为制度的空间规划，其发展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基于不同时空背景的自我修正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空间规划并不具备直接的制度输出功能。但其背后传递的相同发展趋势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强调可持续发展、综合性的观念；（2）注重集权与分权的双向强化；（3）重视规划内容的整合、机构的协调与实施机制的建立。

3 我国空间规划研究及改革展望（“重构规划”vs. “多规协同”）

“空间规划”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在我国空间规划部门分散，统一空间规划法律、行政机构、规划编制序列缺失的背景下，对于其内涵并没有公认的解读，更多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使用。横向层面看，我国空间规划由多个不同类别的规划序列组成，包括但不限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并且各规划序列有着

独立的行政程序、相异的技术衔接体系与覆盖范围。纵向层面看，依托于我国行政区划制度，各空间规划序列涉及从国家到省、地、县、乡等多个行政层级，形成了并不同步的映射关系。基于这一现状，我国空间规划问题主要暴露在编制（体系庞杂、内容脱节）、运行（公众参与不足、衔接无序）及法律（价值偏差、法律缺位、表述不明）等层面。面对这些问题，“重构规划”与“多规协同”是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

“重构规划”派认为，目前空间规划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政府计划型的要素管制方式和“增长主义”下地方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积累模式。面对复杂空间规划体系下多头的法律和机制障碍，重构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规”矛盾、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多规协同”派对于空间规划核心理念是规划间的互相协调。我国特殊的制度特征与基本国情决定了空间规划并非在一个体系中运行，而是由多元规划构成，一个行政层级往往并存着不同的空间规划，是一种并行体系。我国土地所有制“隐性”“国有”的两级土地

发展权体系，直接影响了我国空间规划的“责”“权”定位。因此，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应走协调发展的道路，不仅要考虑纵向不同层级规划的上下衔接（“引导性”与“实施性”的问题），还应该考虑同一层级横向不同规划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性”与“限制性”“政策性”与“功能性”的问题）。但在空间规划协同路径上并未形成共识，包括以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协同、以环境保护规划为核心的协同、以土地利用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行协同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空间规划仍带有明显的“政府工具”属性，政府主导下空间规划主要反映的是上下级政府及不同部门间的条块利益博弈，带有明显的“内输入”特征——由政治精英代替民众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在这一背景下，体系层面的“重构规划”或“多规协同”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我国空间规划的改革，需要遵循不同时空背景下空间规划发展的共性趋势，与时代背景相挂钩、与发展变迁下的空间诉求相适应、与我国政体特征相契合的整体制度创新。

英国空间规划的指标监测框架与启示

周姝天 翟国方 施益军

摘要：空间规划内容综合、影响深远，其实施过程的动态监测相比传统规划也更为重要与复杂。英国的空间规划起步较早，体系完善，其区域与地方层面的空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动态监测工作以相关法律为保障，以因地制宜、综合、系统的空间规划目标为基础，以政府规划部门为责任主体，通过目标导向的监测指标体系和可操作的监测框架，形成了制度化、常态化的动态监测机制。其动态监测框架的核心在于，通过定期测量监测指标变化来确保各项规划政策没有在实施中偏离其既定目标，从而在下一步实施中做出积极响应、理性调整和科学引导。本文首先梳理了英国空间规划监测体系的发展历程，然后以区域空间战略的构建策略和曼彻斯特地方规划的监测实践为例，具体分析其以目标为导向的空间规划指标监测框架，以期为我国开展空间规划试点工作和实施规划动态监测提供启示。

关键词：空间规划；动态监测；监测指标体系；英国

引文格式：周姝天，翟国方，施益军. 英国空间规划的指标监测框架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26-131. DOI: 10.22217/upi.2017.245.

英国的规划研究和实践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其空间规划体系的长期发展中，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纵横交错”的规划评估框架和保障制度。在英国，

制度化、常态化的空间规划动态监测机制以相关法律为保障，以因地制宜、综合、系统的空间规划目标为基础，以政府规划部门为责任主体，通过目标

导向的监测指标体系和可操作的监测框架具体实施。其动态监测框架的核心在于：定期测量监测指标的变化，确保各项规划政策没有在实践中偏离既定目标，从而在下一步实施中做出积极响应、理性调整和科学引导。

通过构建目标—监测指标体系，规划与监测主体可以将宏观的、定性的空间规划目标分解为具体化、量化、可测量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定期、系统的指标监测工作来确保空间规划目标的逐步实现。评价指标的选择标准包括“概念相关性”“政策一致性”“技术坚固性”和“易解释性”四方面要求。在收集更新指标数据后，规划机构需要在监测报告中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纵向和横向比对，并根据地区背景和发展形势进一步阐释分析结果。

区域层面，将《规划政策说明 1》（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 1）提出的五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空间规划的主要目标。2004—2011 年期间，英国各区域空间战略分别构建了各自的监测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从其他各类国家规划政策说明文件筛选出具体的监测指标。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RTPI）构建了区域空间战略的监测指标体系，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各区域规划机

构根据监测区间内各项指标的变化来监测空间规划在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方面的影响，在年度监测报告中明确该区域的发展现状、趋势和存在问题。

地方层面，在《国家规划政策框架 2012》的指引下，地方规划机构基于对当地 10 个专题的综合评估（包括住房、商业、基础设施、矿产、国防、安全、反恐和韧性、环境、历史、健康和福祉、公共安全、政策活力和传递性），在地方规划中提出地方发展愿景、空间发展目标和各项规划政策。如本文案例中，根据《曼彻斯特发展规划 2012—2027：核心战略》提出的空间发展原则、经济、住房、中心区、交通和环境方面的六大空间规划目标，提出了 69 条政策和 97 项包含具体目标的指标。每条政策都包含了各自的实施策略和项目计划，监测指标基线和监测计划，以及具体的负责机构和明确的资金来源，不仅便于规划政策的落实，也有助于年度监测工作的开展。

从英国的经验来看，我国的空间规划改革需要从法律上明确动态监测在规划实施中的必要性，建立、健全满足我国空间规划转型需求的动态监测机制，同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空间规划目标—监测指标体系。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志林 包存宽 沈百鑫

摘要：联动是指在时空、内容和程序方面存在一定交叉和重复的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决策，对其实施环境评价时，可以根据决策的属性与特点，界定不同决策评价的重点和范围，并借助环境信息和数据的共享、部门咨询和协调，保证重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在不同的决策层次可以得到合理有度的评价。本文从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入手，分别对战略环评联动的法律界定、目的、实施、类型进行分析，指出德国空间规划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依靠法律和制度规定，强化联动实施；通过部门合作，保障联动落实；遵循多方位交流，倡导双向性和对流性联动。我国在实施评价联动时需清楚界定其概念和作用、核查现有评价工具、拓宽当前联动的应用范围、强化法律界定和提倡信息交流和部门合作、鼓励推进联动的实验性研究以积累相关经验。

关键词：德国；空间规划；战略环境评价；联动机制

引文格式：李志林，包存宽，沈百鑫.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32-137. DOI: 10.22217/upi.2016.399.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研究及思考

张博程 赵志庆 王清恋

摘要：本文从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沿革入手，总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从初步确立到逐步规范的发展历程。对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的遗产构成、保护区划以及保护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遗产的整体分类和要素界定，归纳基于遗产密度、建造年代、遗产分布与区域特征的保护区划划分方式，以及阐述不同分区的保护措施。最后，得出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同时，提出针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遗产构成、保护区划及保护措施等方面的思考。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区划

引文格式：张博程，赵志庆，王清恋. 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研究及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38-144. DOI: 10.22217/upi.2017.111.

1969年列宁格勒市委员会颁布120号文件《关于历史、建筑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事项》，确定了新的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市）联合保护区方案。时至今日，历经50年的调整与修订，圣彼得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本文从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沿革入手，总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从初步确立到逐步规范的发展历程。对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的遗产构成、保护区划以及保护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遗产的整体分类和要素界定，归纳基于遗产密度、建造年代、遗产分布与区域特征的保护区划划分方式，并阐述不同分区的保护措施。最后，得出圣彼得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同时，提出针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遗产构成、保护区划及保护措施等方面的思考。

2002年俄联邦№73-Φ3法律文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作了界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是为了保护历史环境中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建立的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包括保护区、建筑和经济活动调节区和自然地貌保护区，或者是联合的保护区，以确保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区”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48年苏联部长级会议《文物保护措施改善》上提出的。1960年代中期至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实践的发展丰富了这个概念，不仅仅包含单一古迹的历史价值，还包括历史建筑环境以及与古迹相关联的人工和自然环境。1969—1989年是保护区初步建立阶段，该阶段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步从建筑单体发展到遗产区域的保护，1989年圣彼得堡历史中心区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0—2005年是保护区规模扩张阶段，该阶段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不断纳入新的文化遗产，区域面积和边界不断调整。2006年至今是保护区保护条例建立阶段，该阶段建立了保护条例并进行了修订。

圣彼得堡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首先从整体上对遗产进行梳理并分类，建立了“规划与景观历史要素”认定，明确了需要保护的遗产要素及其具体的保护内容，从遗产元素的保护细节到整体的保护数量和种类都得以考虑，为遗产保护的完整性提供了依据。其次，根据不同层级的遗产特征建立了层级式保护区划，为后续不同特征遗产的分类保护提供载体。最后，在保护区划和遗产构成的基础上制定了分区保护措施。

日本《景观法》制定过程的基础研究——聚焦关键人物西村幸夫及其方法框架

傅舒兰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日本《景观法》制定过程中的城市规划研究展开，着重剖析关键人物西村幸夫的研究影响和作用于国家立法的过程。文章通过整理研究者历年课题、著作，结合访谈对研究的组织、推进、展

开以及影响立法的方式进行了逐层解析,并将这个历史过程总结归纳为“地方实践、高校研究、国家立法”的联动模式。

关键词: 景观; 规划; 景观法; 西村幸夫; 城市管理立法; 日本

引文格式: 傅舒兰. 日本《景观法》制定过程的基础研究——聚焦关键人物西村幸夫及其方法框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5): 145-151. DOI: 10.22217/upi.2017.292.

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于 2016 年初同济大学刘刚、张松两位老师的组稿,希望我能围绕城市复兴与历史保护的专题,写一写日本。

当时正好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日本鞆之浦居民 2007 年起状告广岛县福山市填海架桥计划一案,终审判决居民全面胜诉。鞆之浦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港町,渗透了浓厚历史气息的优美风景与构造,还启发了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创作,是《悬崖上的金鱼公主》的背景地。广岛县福山市为了疏解交通,打算填埋港湾并跨湾架桥,为此遭到了鞆之浦部分居民的强烈反对。期间许多有识人士、大学和社会团体为表声援,开展了调研、宣传等工作,这也是我留日期间曾经活动过的场所之一。终审法官能势显男要求广岛县立即停止计划推进:“景观是原告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利益。同时,鞆之浦的景观具有文化历史价值,也是国民共同的财产。目前的计划案不仅缺乏足够调查,无法证明其确实能改善区域整体交通,还建立在牺牲如此重要的景观基础上。可认为是行政越权。”由此来看,判决的主要依据是 2004 年施行的《景观法》。

为此,我才产生了围绕这部在日本历史城镇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的《景观法》写一篇文章的想法。

在梳理既往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国内的学术期刊对于国外新生事物的介绍非常及时,已有许多论文从方方面面日本的《景观法》加以介绍。可以明确地说,日本《景观法》是基于维护城市景观的现实需求,在内容上参考德、法、意、英、美等国的相关城市规划法规而制定的。但是,对于该法从基础研究到制定颁布的整体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及其使用的研究方法,仍是模糊的。这与国际研究领域长期以来重视内容引进、忽视结合背景分析方式方法和思想来源的传统有关。尤其在将日本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时,我们

总是觉得日本很善于向外国学习,并能将外国经验很好地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但实际研读和剖析其究竟是如何学习外国经验的文章则少之又少。原因可能不仅在于没有意识,而且缺乏深度介入的机遇,毕竟“偷师”还是需要较为长期的观察才能避免人云亦云。正是基于一些人情地利上的即有条件,并怀抱着以上这些想法,我才写出了这篇乍看之下比较“特殊”的文章。

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景观法》的立法背景:(1)从 1960 年代末开始,日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其所导致的景观纠纷和实际问题促使地方政府早于国家开始了法律条例的制定。到 1980 年代,已通过大量的地方景观条例的制定充分积累了经验。(2)1992 年日本“地方分权”政令释放出中央与地方解除行政上下级关系的信号,进一步鼓励地方进行城市规划管理的探索,并在意识形态上开辟了“自下而上”总结地方经验制定国家法律的通道。随后,通过整理城市景观及保护制度的相关研究,确定了本文核心——日本各地从 1980 年代起广泛开展景观条例的制定,而推进并最终促成 2004 年国家层面《景观法》颁布的关键人物是者西村幸夫。

文章的主体部分从概述西村幸夫研究思想的形成轨迹开始,逐层解析相关研究的具体内容、构成、组织,以及影响作用方式。从研究成果来看,西村在总结 1980 年代开始的制定景观条例的经验、借鉴欧美实施景观控制规划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13 条直指景观法制定的建议。13 条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反映在了日本国土交通省于 2003 年发布的《建设美丽国度政策纲要》中,并有 6 条建议被次年通过的《景观法》完全采纳,2 条被部分采纳。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此大比例地直接反映在法律中,即便在日本也不常见,可能是继石田赖房的博士论文直接反映在《都市计画法》修订内容后的第二例。

从研究组织来看,通过松散的学术共同体“町

并研究会”，将日本国内研究不同国家景观规划的学者，以及具备第一线经验的规划实践者吸收进来。一是解决了研究者个人精力与时间有限，无法达到既全面铺开又兼顾研究深度的问题；二是使实践者直接参与研究的过程和讨论，不仅有利于日本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为欧美部分的研究提供本国对照，便于辨析外国经验是否可在本国运用，进而深化研究。从科研影响立法的作用方式来看，二者之间的直接联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研究者本人隶属审议会，直接参与议案提出和推动的各个环节；二是研究者在国家行政部委中组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向审议会提交报告。将以上内容作一总结，可见清晰的“地方实践—高校研究—国家立法”联动轨迹。

西村幸夫通过研究成功推动《景观法》制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学者对于研究问题的敏感性。西村幸夫早在学生时期就敏感察觉到保护运动这一社会新动向，较早投入并开拓了日本历史城镇环

境保护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其中相关的城市规划制度设计方面的内容更是为《景观法》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学术积累。第二，与所处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西村幸夫通过设立町并研究会的方式，将非团队成员以及实践领域成员纳入，既能短时间内有效扩充研究绩效，还能避免为获得实践经验参与实际项目而分散研究精力的问题。第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日本自 1990 年代以来推行的“地方自治”，为整个过程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影响并推动了城市规划领域内居民“自下而上”参与规划制定与城市管理制度设计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下，学者相对独立的研究才具备了向上作用于立法提案的可能性；而西村隶属于审议会，及其作为相关学术委员会组织者的身份，进一步提供了研究成果向上直接产生作用的便利通道。可以说，以上三点相互作用，缺一不可，最终实现了研究案例中“地方实践—高校研究—国家立法”的联动。

2018年第6期文章目录

特稿

谭纵波, 高浩歌 /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概观

城乡研究

蔡少燕, 陶伟 / 身体: 一个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

岳晓鹏, 罗浩, 王朝红 / “减增长”理念及其视角下的生态村实践

秦梦迪, 李京生 / 德国慕尼黑大都市区小城镇就业空间关系研究

李传成, 孟雷雷, 张婷 / 铁路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

侯爱敏 / 美国市县合并的五个突出特征及其对我国区划调整的启示

任俊宇, 刘希宇 / 美国“创新城区”概念、实践及启示

王侠, 焦健 / 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综述

郎崑, 李郇, 陈婷婷 / 从社会因素角度评估香港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规划研究

曹哲静 / 荷兰空间规划中水治理思路的转变与管理体系探究

甘欣悦, 龙瀛 / 新数据环境下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及其规划设计应用

姜玉培, 甄峰 /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及规划策略研究

刘泉, 赖亚妮 / 基于形态准则视角的 TOD 横断面分区分类管理

冯灿芳, 张京祥, 陈浩 / 嵌入性治理: 法团主义视角的中国新城空间开发研究

靳文博, 翟国方, 何仲禹, 陈伟 /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研究

实践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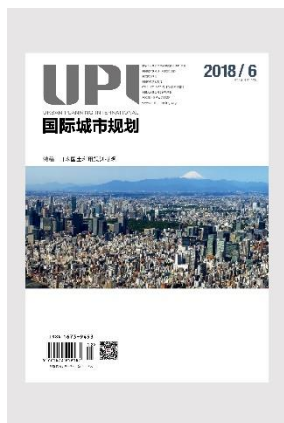
李明烨, 汤爽爽 / 法国乡村复兴过程中文化战略的创新经验与启示

蒋希冀 /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城市规划应对之启示

焦怡雪 / 政府监管、非营利机构运营的荷兰社会住房发展模式

书评

侯丽 / 《造城者》: 一首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的哀歌



2018年 第6期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概观

谭纵波 高浩歌

摘要：在我国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日本的国土规划作为可借鉴案例被反复提及。虽然有大量介绍或提及日本国土规划的论文，但从相关名词的翻译到内容的理解和解读，乃至对规划性质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是误读。为了准确掌握日本国土规划的真实状况，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提供扎实的基础，本文以日本国土规划体系中的“国土利用规划”为对象，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及原始规划文本的解读，对规划产生的背景、法律依据、规划目的、内容以及规划编制实施状况进行全面梳理，进而探究规划的特征和性质，为构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提供可供参照的经验及思路。

关键词：日本；国土规划；国土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空间规划体系

引文格式：谭纵波，高浩歌. 日本国土利用规划概观[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1-12. DOI: 10.22217/upi.2018.146.

相近的历史文化背景，夹杂大量可以“望文生义”汉字的日文，使得我们在了解日本相关事务时总有那么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的确，较近的地理距离、相似的历史文化乃至难以区分的生物特征使得我们在看待日本的事物时较欧美国家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也正因如此，堕入想当然“陷阱”的风险也同时存在。

在我国积极寻求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过程中，日本的国土规划作为可借鉴案例被反复提及。在其国土形成规划和国土利用规划两大系列中，由于后者所包含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具有协调城市、农业、森林等五类单项规划的职能，从借鉴角度来讲，更加与我国探索“多规合一”的背景相吻合。而我国现存的相关研究在翻译、理解和认识上并不统一。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相关法律、规划文件的原文以及日本国内研究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还原其原貌。

日本的国土规划首现于二战后的 1950 年代，1962 年首次发布“全国综合开发规划”，至 1998 年止共颁布了 5 次，即“一全综”至“五全综”，均以大规模投资促进国土开发、平衡区域发展为主要任务，属于开发导向的国土规划。

而国土利用规划最初是为了应对历次“全综”实施大规模开发带来的地价高涨问题。面对 1970 年代全国性的地价高涨、城市用地持续无序扩张，日本国会原本打算修订《国土综合开发法》以应对这些问题，但迫于舆论对“开发”的强烈抵触情绪，最终于 1974 年新颁《国土利用规划法》，试图通过

“国土利用规划”及土地交易管制措施来实现土地利用和交易的管制。

日本是一个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所有的政府行为，包括规划，均需得到法律的授权。《国土利用规划法》及配套规章详细规定了全国、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编制主体、程序及其应包含的内容。与现代政府架构相适应，不同层级政府负责本级的规划，上级政府并非对下级政府的规划进行“审批”，而是强调上级政府规划应反映下级政府的意见；上级政府可对下级政府的规划提出意见及劝告，并保证公众参与规划公开。

都道府县负责编制全覆盖的“土地利用基本规划”并定期更新。其主要任务是协调早于国土利用规划出现的城市、农业、森林、自然保护区及森林公园五类“多规”，内容包括基本方向、规划图和重叠部分协调原则三项。实际上，规划图是通过叠合城市、农业等由五类单项规划划定的地区而形成的，通常存在大面积重叠的现象。规划针对重叠地区也只是给出了不同情况下的协调原则，对土地利用的管控仍通过五类单项规划各自的开发许可制度完成。因此，规划本身不具备地区划定与调整、管控土地利用行为的权责。也就是说仍保留了“多规并存”的状况。

笔者统计了 37 个已公开的都道府县国土利用规划中的各类用地目标，并与全国规划的用地目标进行了对比，发现相对于全国规划的希望增加森林、维持建设用地不变，大部分都道府县都提出了减少森林、增加建设用地的目标，反映出中央与地方政

府的不同诉求。

日本国内的研究普遍认为，作为协调“多规”的工具，土地利用基本规划作用有限，依据 5 部法律分别进行土地利用管制的现实导致土地利用基本规划的直接管控缺乏法律依据、规划存在滞后性；市町村一级的国土利用规划也缺乏实现规划目标的手段，国土利用规划与单项规划重复地区的规划内容并不一致。

尽管日本的国土利用规划具有完备的法律基础和形式完整的规划体系，但它既不是一个可以统领全局，决定每一寸国土利用状态的全能规划，也不是自上而下层层分解了目标和任务，强制传导的国土利用管控规划。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实时准

确地把握国土利用现状，表达各级政府政策导向，预测国土利用未来发展，吸引公众关注国土利用问题等方面。国土利用规划未能也不准备解决“多规并存”、中央、地方政府间政策与目标“垂直传导”的问题。

日本的国土利用规划存在以上种种问题，算不上是空间规划的理想模式，但建立在“多规并存”“地方分权”基础上的协调机制也不失为一个可观察和参考的案例。

此外，本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发现虽然日本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早已结束，甚至总人口已开始下降，但城市外延性拓展的趋势并未彻底完结。规划面对全面“收缩”？“减量”？还有待持续观察！

身体：一个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

蔡少燕 陶伟

摘要：身体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刻印体，身体与城市从一开始便密不可分。从古希腊古罗马到现代城市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身体经历了自由—沉睡—受压制—再苏醒—受破坏—重新认识的阶段。身体创造了城市，城市的一切活动由身体出发，并经受身体的使用和检验。通过对 26 种国际权威期刊 275 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 1994—2016 年间，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积累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从身体的视角研究城市，研究议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体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交通和建筑设计 with 城市布局等。二，从城市的视角研究身体，研究议题包括移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群体的身体等。身体成为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和途径。

关键词：身体；具身性；城市研究；身体地理学

引文格式：蔡少燕，陶伟. 身体：一个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13-20. DOI: 10.22217/upi.2017.584.

199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文社科领域“身体转向”的到来，人文地理学家开始关注身体（body）与具身性（embodiment）的问题。城市本身从一开始便与身体密不可分，城市为身体提供最根本的物质性支撑，城市一切活动从身体出发，并且经受身体的使用和检验。身体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刻印体，以身体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城市，可以折射出许多城市问题。相比于国外，国内城市研究仍未对身体给予应有的关注，对于身体与城市相关性研究仍然缺乏。本文对 26 个国际权威期刊的 275 篇相关英文文献进行了梳理，旨在整理身体与城市相关研究的

主要议题，以期推动国内的相关工作，为国内快速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从身体的视角看城市，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活力；从城市的视角看身体可以更微观地聚焦各种不同的人及其群体。具体而言，1994—2016 年，有关身体与城市的研究成果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研究议题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从身体的视角研究城市，包括城市公共空间体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交通和建筑设计 with 城市布局。第二，从城市的

视角研究身体，包括移动的身体、健康的身体、肥胖的身体和特殊群体的身体。

西方学界从各个方面对身体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从关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到关注体验、审美、城市认同等情感追求，再到社会公正、空间正义和城市权利等作为人主体性的诉求。对比西方研究，现阶段国内的研究对城市发展过程中许多微观人文现象的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人的城市化的研究还很缺乏。当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城市化”

走向“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城市的转型从重点关注经济发展和空间拓展转为关注快速变化的城市中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多元化生活经验。身体是人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作为最小的空间维度，身体首先反映出人性的物理状态，同时充分体现了城市对人身体的作用。因此，身体为探讨城市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成为研究城市化相关论题，尤其是实现“人的城市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减增长”理念及其视角下的生态村实践

岳晓鹏 罗浩 王朝红

摘要：“减增长”是后工业化时代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可持续发展理念。文章阐述了减增长理念的定义、本质、内涵及实践途径，以及在其视野下的生态村实践，剖析了两者之间在本质上的逻辑关系，并从空间抵抗视角来探讨生态村作为减增长社会实践途径的可行性，最终为中国城市及乡村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减增长社会；生态村；抵抗空间；替代性技术

引文格式：岳晓鹏，罗浩，王朝红. “减增长”理念及其视角下的生态村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21-26. DOI: 10.22217/upi.2017.539.

目前，我国正在沿袭着欧美发达国家追求 GDP 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增长逻辑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危机及社会问题。本文阐述了“减增长”理念，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上，不要求个体牺牲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从广义上讲，减增长社会是对当前社会的一种替代范式，它所倡导的并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减少产出，而是在整个社会制度层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将人类本性从经济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民主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减增长理念的内涵从广义角度理解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民主诉求、生态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而从理论到实践的探讨，尤以瑟奇·拉图什（Serge Latouche）的“8R”为核心理念，他将减增长理念可能实现的方式及路径概括为 8 个 R 为首字母的英文单词：再评价（re-evaluating）、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重组

（restructuring）、再分配（redistributing）、再地方化（relocating）、再利用（reusing）、减少（reducing）、循环（recycling），其中，“再地方化”被广泛认为是减增长社会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生态村提倡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开展生产和生活，以实现经济发展吻合生态环境承载力，形成自然平衡。“地方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态村可持续实践的核心原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这与减增长理念提倡的实践途径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上形成分级同构的关系。作为减增长社会的愿景体现，生态村这种地方生存的实践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再地方化”进程，在具体实践层面体现为各种小规模、可操作的措施。

生态村以其基于地方化、分散性、小规模、手工化及替代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当前社会范式的抵抗空间，生态村可以根据实践主体及实践空间分为个人和社区两个层次。瑞典哥庭根大学在对减增长理念与生态村的关联性进行研究时，将减增长运动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费社会拜物欲的抵抗也

分成了相同的层次，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点。这种抵抗分为：（1）个人维度的抵制，即志愿简单的生活；（2）集体维度的抵制，即替代性场所空间的建立。

相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发达国家，也许减增长对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中国而言为时尚早，但是近些年来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失衡、社会资源有失公平等问题已日益凸显。面对快

速城市化及蔓延的城市空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本质关系，重新审视目前城市发展主流单一提倡的“快速、增长、扩张”等倾向的不足与矛盾，并真正思考减增长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意义应该是放缓增长的速度，在城市社区的建设上重点培育规模适度，兼具生产与生活功能，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住宅区。

德国慕尼黑大都市区小城镇就业空间关系研究

秦梦迪 李京生

摘要：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而德国城镇体系发展均衡，小城镇数量众多、吸引力强，其经验值得研究。本文以德国人口普查数据和联邦就业调查局数据为基础，借助就业产业空间关系、就业年龄空间关系和就业通勤空间关系分析方法，对慕尼黑大都市区小城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德国小城镇依托协作的产业集群、便捷的区域交通和宜居的空间品质，在促进区域就业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附型小城镇承担了大城市的部分产业转移，一定程度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网络型小城镇形成了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对中年人口有较为显著的吸引力；独立型小城镇依托资源形成特色产业，是乡村地区的就业中心。

关键词：小城镇；德国慕尼黑大都市区；就业空间关系；就业通勤

引文格式：秦梦迪，李京生. 德国慕尼黑大都市区小城镇就业空间关系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27-35. DOI: 10.22217/upi.2018.054.

慕尼黑大都市区是德国 11 个大都市区之一，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由 3 个大城市、29 个中型城市、172 个小城镇和 258 个乡村社区构成。这些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之间在人口流动、产业发展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良好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实现了高水平的集群效率。德国小城镇的发展经验，对于应对我国新型城镇化所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小城镇就业机会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是否能留住人口、吸引人口，小城镇与其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就业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镇群内在的产业协作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就业的角度，以德国人口普查数据和联邦就业调查局数据为基础，通过就业产业、就业年龄和就业通勤三个方面的分析，对慕尼黑大都市区中的依附型小城镇、网络型小城镇和独立型小城镇三

种不同类型小城镇与大都市区内其他城镇之间的就业空间关系展开研究。

基于对就业产业空间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慕尼黑大都市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存在产业协作，并形成了差异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小城镇在这样的产业集群平台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信息共享的机会，承担了更多的区域职能。比如，依附型小城镇承接了大城市的部分产业转移，网络型小城镇群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集群。

在就业年龄方面，小城镇对于中年就业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小城镇环境优美，规模适宜，房价相对低廉，也可以提供更为和谐紧密的邻里关系，因此中年人移居小城镇对于子女养育和生活幸福度的提升都会有较大帮助。

同时我们也对就业通勤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

不同城镇之间的通勤关系非常密切，很多人住在小城镇但是在大城市工作，同时一些小城镇也吸纳了大城市居民前来就业。网络型小城镇群往往形成较为均衡的通勤就业人口的相互往来关系，实现了一定的就业岗位资源共享，使得任意一个小城镇的居民都拥有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这种资源共享提高了中小城镇群中每一个城镇的综合竞争力。独立型小城镇与周围乡镇的就业通勤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放射状空间形态，对周边的乡村社区有比较强的就业吸引，吸纳了大量周边乡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是区域中重要的基层就业中心。

其实慕尼黑大都市区所位于的巴伐利亚州在 20 世纪初是德国的农业大州，人均 GDP 为全德国

最低，失业率为全德最高。在几十年间，巴伐利亚州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得益于区域规划的合理引导。1965 年，巴伐利亚州制定了《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提出“城乡等值化”的目标，有意识地将大城市的一些经济活动分散到周围的乡村地区，鼓励企业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发展。随后，在城乡空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交通整体规划》，使得巴伐利亚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从 1950 年代的 570 km 增加到 1980 年代的 1 560 km。交通网络的通达，产业协作与资源共享，以及小城镇自身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使慕尼黑大都市区中的小城镇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强劲的竞争力，在大都市区的城镇网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铁路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

李传成 孟雷雷 张婷

摘要：铁路站点与城市空间发展如何匹配，成为当前城市发展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本文从多站点格局、城市交通及城市用地格局、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三方面进行国内外典型城市比较研究；指出应加强城市规划与铁路规划的对接，充分发挥铁路站点的优势，建立依托站点的多中心格局，实现化整为零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并建构多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理想模式，对多站点结构、城市交通优化、多中心结构发展提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多铁路站点；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结构；理想模式

引文格式：李传成，孟雷雷，张婷. 铁路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比较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2018(6):36-42, 87. DOI: 10.22217/upi.2017.407.

我国省会级城市拥有铁路站点数量一般为 2~4 个，并且新建站点也在逐步规划中。随着铁路站点数量的逐渐增多，多站点与城市空间如何匹配、多站点间如何联系成为当前城市发展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铁站点的选址和布局、客运站数量与分工、站区结构的发展规律、站点对城市交通和用地的影响、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推动作用几方面。然而，既有研究大都停留在单个高铁站点研究的层面，从多站点体系角度出发的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对比国内外多站点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具体发展特征，提出发展建议。

铁路线引入城市的方式导致设站模式的不同，日本东京由各条线路引进中心城区设站，各站点串联呈环状；巴黎与伦敦以尽端式设站，形成放射状；我国城市站点设于铁路干线上形成穿越状，站点数量较少；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其总结为环线串联式、尽端放射式和穿越式与三种模式。

在车站数量上，目前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城市枢纽站点均在 4 个以内，东京和巴黎则达 6~7 个，伦敦为 13 个。在站点布局上，我国城市车站分布均匀度与国外差异很大，如东京山手线上均匀分布 7 个枢纽站点，巴黎和伦敦中心城区分别均匀分布 7 个和 13 个站点，而上海现有 4 个枢纽站均位于浦西地区。枢纽车站一般负责城市特定方向的客

流，上海、郑州不均匀指数远超其他五城，这种格局势必会加强往返枢纽站点的交通流，从而增加特定方向上的交通压力。

我国站点对旅客的吸引是全城范围的，对市内交通往往产生压力。旅客往往需要通过搭乘市内交通前往目标站点，而非就近选择站点。站点间的换乘虽可通过市内公交系统完成，但无疑会增加城市交通的压力。打通各站点间的便捷联系不仅对铁路运营本身有益，更有利于市内交通流的有序性。

国外为提高尽头式车站的通过能力，适应列车快速通过铁路枢纽的需要，先后修建环形、半环形铁路线或直径线。我国大部分站点间仅通过联络线联系，站点间列车互通换乘并未充分实现。虽然我国新建高铁站点及其配套设施一定程度上可减弱城市拥堵，但一味只增设站点而非加强站点间换乘互通，其结果或将加剧市内交通的混乱与拥堵。

我国城市商业用地除北京外，其他城市普遍形成相对偏于一侧的格局，且近半数商业商务用地未与铁路及地铁站点结合。相反，东京商业用地却集中于站点处，并伴随铁路线呈放射式布局；伦敦、巴黎枢纽站点及地铁站点附近开发均有结合，分布较为均匀。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单中心城市的诸多弊端开始显露，各国纷纷制定了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空间发展战略引导。于是，城市近郊和远郊一并纳入空间发展战略，形成了系统的多中心体系规划，以应对城市的对外扩张。

目前，七座城市均规划了“多核多圈层”的城市多中心空间格局。在各圈层多中心结构的交通支撑上，我国城市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城市中心并不完全与站点协同，协同的多为近年新建的高铁和城际铁路站点地区，然而国外三城基本协同。

交通站点具有可达性强的优势，往往容易形成中心，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其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高铁站点虽然带来新一波的开发和更新改造浪潮，与国外站点相比，我国枢纽站点在城市用地结构中的影响力显然较弱，其应有的地位与商业价值并未充分发挥。

商业商务用地需要依附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利用交通站点可有效调控商业商务用地的分布，避免过度集中或偏于一侧的情况出现。近年随着我国高铁站、城铁站、地铁站的修建，城市部分商业用地也逐渐依附站点发展起来，调整城市相关用地结构也越发迫切。

通过国内外七个城市的枢纽站点及城市空间的对比，呈现出铁路多站点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中心城区枢纽站点数量和布局上，应增设站点形成均衡的站点布局；在枢纽站点联系上，建设环线或地下直径线，实现多站点的互通以分担市内交通；城市中心城区内部，应积极依托枢纽站点形成功能混合且差异化的城市副中心，同时，在城市近郊和远郊规划和建设市郊铁路站点，形成“多核多圈层”的城市中心结构体系。

随着高铁及城铁的新建，城市拥有站点数量逐渐增加。枢纽站点在推动城市空间发展上潜力巨大，城市相关规划部门需与铁路规划部门的通力合作，从优化城市交通、用地的全局出发，加强部门间的横向和纵向综合，根据实际需求建立依托站点的不同分工、有机联系的多中心格局，实现化整为零的城市空间发展策略。

（1）全局观的站点增设

针对我国站点数量偏少且较不均衡的布局，城市规划部门应从城市空间发展真实需求、促进站点结构完善着手，在规划体制上加强铁路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横向综合”与“纵向综合”。

（2）多站点的互联互通

在站点互通上，针对我国铁路站点设置在干线上形成穿越式的既有现状，应加强环线、半环线、直径线等建设，向环线串联式发展，从而提升铁路运能、一定程度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

（3）多中心的站点统筹

铁路站点具有可达性强的优势，对城市用地开发规模和强度上具有很强的带动力。相关规划部门应从城市空间发展需求出发，建立依托便捷交通体系的“多核多圈层”的城市空间结构。

美国市县合并的五个突出特征及其对我国区划调整的启示

侯爱敏

摘要：市县合并是美国近两个世纪以来应对被区域主义者诟病的都市区碎片化的重要手段，其程序、目标、方案、后效、机制等等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了深入的观察探索。本文系统总结：美国市县合并的尝试较多但成功率低，合并程度、范围和政府结构模式多样，目标诉求多元且随时代背景变化，目标实现多数不如预期，公众意见起决定作用但法律影响合并难度与取向等五个突出特征。继而结合我国当前撤县设区等区划调整中遇到的矛盾，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启示，包括关注多元目标、重视后效评估，倾听不同利益群体呼声，内容应重于形式，鼓励多种模式以及替代方案的探索，加强规范和制度建设等等。

关键词：市县合并；美国；特征；区划调整；启示

引文格式：侯爱敏. 美国市县合并的五个突出特征及其对我国区划调整的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43-48. DOI: 10.22217/upi.2017.434.

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边界外拓展，趋向于与周边区域整合为一体，但区划边界的存在却构成了障碍。为克服障碍，我国时常采取撤县（市）设区（下称“撤县设区”）等重构手段。在美国的都市区，市县合并是常用的整合手段。不同的是，美国的市县合并历时久（近两个世纪）、数量少，但人们对有限的案例开展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在我国，人们对撤县设区的动因与目标诉求、撤并后的经济和空间绩效研究较多，但对撤并中的矛盾与不同利益诉求、撤并后除经济发展与空间扩展之外的其他影响绩效、撤并程序与体制设计等方面很少涉及，导致理论研究对广泛开展的实践指导不足。鉴于此，本文从系统总结美国市县合并的突出特征出发，结合我国当前撤县设区中遇到的矛盾，试图寻求相应的启示，以期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研究发现，美国的市县合并有五个突出特征。

第一，合并尝试较多但成功率低。美国的市县合并是一个充斥着失败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合并需要通过公投，但公投通过率极低，这归因于四个因素：美国人偏爱贴近民众的地方政府；厌恶城市而偏爱乡村和小镇；美国法律对合并极为严苛；存在化解区域矛盾的其他途径。不过，尝试合并的热情却没受影响，几乎每年都有某项市县合并举行公投，许多成功案例也是经历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合并程度、范围和政府结构模式多样。从程度上来看，市县合并并不意味着在原有市县所

有部门的合并，也不意味着服务标准和税率的统一。从范围来看，有的都市区合并后依然有着几十个地方政府分享权力和资源，有的市县可能彻底合并并且几乎不留合并前地方政府的痕迹。多数合并只涉及最大的两个综合性政府，而不涉及区内其他建制市、镇、功能区和学区等。从合并后的政府架构看，也是千差万别，有的是市县合并形成都市区政府，有的合并形成多层地方政府，有的合并后分为税率和服务标准不同的两个区。最终，在市县合并这个概念下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果，任何两个个案之间都没有可比性。

第三，合并目标诉求多元且随时代背景而变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的市县合并历经了20世纪初的高速城市化、大萧条、战后的郊区化、内城衰退，一直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几度经济兴衰。尽管每个时期主要矛盾不同，占据话语权的主导理论不同，但合并目标始终围绕效率、公平、经济发展几个主题，其他诸如复兴内城、形象和地位提升、控制蔓延、促进交通等目标也多与这几个主题关系密切，区别在于不同目标在重要性程度上随时代背景而变化。这些目标多数对应于该都市区所面对的突出矛盾，也多数是支持者理论推演的结论，并且在推进合并的运动中成为凝聚人心的口号。此外，少数市县合并中提出了其他的目标，如：简化官僚体系、提高政府专业化程度和对居民需求响应程度的目标；复兴内城、控制蔓延、提升城市地位和形象的目标；获取更多资金支持、提升融资能力的目标等等。在所有目标中，以惠及所有民众的经济发

展作为核心目标的合并动议获得选民支持几率更大。

第四，合并目标的实现多数不如预期。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市县合并多数没能实现预期目标。所谓市县合并的“好处”，多数是人们在面对现实矛盾时对变革所寄予的美好预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者推演的结果。

第五，公众意见起决定作用，法律影响合并的难度与取向。自 19 世纪末，美国市县合并基本都需全民公决，而且多数在公决阶段被民众否决。因此，公众的选票，而非专家学者或官员的意见，在市县

合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各州相关法律也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合并程序、参与范围、通过的标准由各州法律所规定，程序越严格、参与者范围越广、通过标准越高，合并难度就越大，这也是美国市县合并通过率低的重要原因。

中美城市化尽管存在着体制、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等诸多不同，但结合我国撤县设区中的突出矛盾，美国的经验教训依然可以带来诸多启示，尤其是关注多元目标、重视后效评估，倾听不同利益群体呼声，内容应重于形式，鼓励多种模式以及替代方案的探索，加强规范和制度建设等等。

美国“创新城区”概念、实践及启示

任俊宇 刘希宇

摘要：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伴随着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创新驱动等发展需求，城市越来越重视创新空间的发展与规划。“创新城区”是一种较新的理论概念和实践路径，本文对其发展条件、过程演进、概念与特征进行总结，提出“创新环境—产业环境—城市环境”的创新城区概念模型。同时，梳理美国创新城区发展的最新进展，以波士顿肯德尔广场、西雅图联合湖南区和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为例，介绍创新城区的三种类型。最后，总结美国创新城区在空间建设、政策实施、产业发展、文化嵌入等方面的经验，并提出我国发展创新城区应吸引企业，促进科技产业集聚；优化空间，提高环境品质；鼓励创新，形成创新生态系统。

关键词：创新空间；城市创新；创新城区；肯德尔广场；联合湖南区；三角研究园

引文格式：任俊宇，刘希宇. 美国“创新城区”概念、实践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49-56. DOI: 10.22217/upi.2017.093.

创新城区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一种创新空间发展模式，是全球创新活动逐渐向城市中心地区回流，城市创新由“郊区化”“园区化”向“城区化”模式转变的产物，是城市存量空间实现创新发展的一种类型。2014 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凯茨（Katz）正式提出了“创新城区”的概念；从此，这一概念逐渐得到推广，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及学者按照创新城区的理念，对多处城市片区展开了实践探索。例如在亚特兰大、剑桥、匹兹堡等市中心和次中心出现的创新源驱动型创新城区；在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等一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区域（尤其是老工业区）改造建设的城市更新型创新城区；此外，传统远郊科学园区，如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也

正进行改造，实现更加城市化、更具活力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梳理美国各地方政府的项目计划和城市规划，目前美国比较成型的、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和特色的创新城区大致有 12 处。从成立时间来看，这些创新城区的发展一般开始于 2000 年后，政府开始重点规划建设中心城区，而在 2014 年后，以政府为主体，相继提出创新城区的发展目标，并着手规划、统筹创新城区的建设。从现有区域的规模面积来看，从几十公顷到几百公顷不等，但大部分创新城区的规划范围在 80~120 hm²，也就是 1 km² 左右，相比城市中心区的规模，创新城区发展空间更加集中。从实施主体来看，一般是由政府引导，多方主体共

同参与，包括房地产商、大学、研究机构、社区协会以及企业等。

欲了解剑桥肯德尔广场、西雅图联合湖南区和

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三处创新城区的建设详情，请阅读全文。

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综述

王侠 焦健

摘要：城市蔓延以及“以车为本”的城市建设模式与场所设计，使得儿童通学出行距离加大，私家车通学出行比率不断增加，不仅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也影响了儿童体力活动以及家庭生活品质等。国外在 1980 年代开始研究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国内近年开始关注并展开相关研究。本文梳理了目前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成果，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研究基础。首先，社会生态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的相互影响关系；其次，影响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空间单元是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因子测度可以分为主观感知与客观要素两方面；然后，结合我国规划体系，对影响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影响因子从土地、交通、设计、学校四方面进行了梳理；最后介绍了该研究的应用。

关键词：建成环境；通学出行；研究综述

引文格式：王侠，焦健. 基于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研究综述[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57-62, 109. DOI: 10.22217/upi.2016.485.

城市蔓延以及“以车为本”的城市建设模式和场所设计，使儿童通学出行距离加大，私家车通学出行比率不断增加，不仅增加了城市交通压力，也影响了儿童体力活动以及家庭生活品质等。国外在 1980 年代开始研究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之间影响关系，国内近年开始关注并展开相关研究。

儿童通学出行大致有独自上下学和他人接送两种方式，出行特征包括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间以及出行链等。儿童通学出行更容易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并对家庭出行链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个人群的出行方式。通学出行与一般成人通勤、非通勤出行研究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1）行为决策主体：不同于成人个体决定出行模式，儿童通学出行受到家庭决策的极大影响，也因此，通学出行研究对象并非只有儿童个体，而是家庭；（2）影响绩效因素：相比于成人出行决策，通学出行决策不仅强调时间和经济成本因素，还强调安全因素与健康因素；（3）建成环境尺度：不同于成人出行研究中建成环境研究范围是整个城市或者片区，通学出行有明确目的地和出行链，空间尺度可集中在居住地、学校及二者之间的路径物质空间环境上；等

等。因此，探索可促进儿童步行和骑车出行的建成环境因素，并对其进行规划介入，将对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更加有效。

学者们构建社会生态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通学出行与建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因子有个体特性（年龄、性别、自我效能及儿童对活跃出行的态度）、家庭特性（家庭社会经济情况、家长的态度及其通勤特征）、外部环境因素（自然环境与政策因素）等。

通学出行实证研究绝大多数是建立在社区尺度上的。更多研究显示建成环境因子在 400 m 研究缓冲区中与通学出行的关联性较强。

建成环境分为物质空间的客观测度与人对环境的感知测度。客观建成环境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涉及人的主观认知的影响，主观认知比客观要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目前研究中对于儿童通学出行的研究以建成环境的客观测度为主，缺乏儿童主观感知维度的测度。

由于建成环境“D”变量【指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的影响关系模型中的 5 个变量——密度、多样性、设计、可达性和换乘，其英文首字母均为 d】与国内规划

体系要素之间衔接不足，从土地利用、道路交通、环境设计和学校建筑四个方面重新建构通学出行的建成环境因子，可以对接国内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社区建设和学校建设等不同层面物质空间建设要素。城市土地利用因子决定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以及出行路径的选择等，是建成环境的重要影响因子；主要通过密度（人口密度、用地比例、建筑密度等）与土地利用混合度来测度，也有研究纳入职住平衡指数、中心度及区域可达性等因子。道路交通因子影响建成环境的连通性、安全性与交通可达性；可分解为道路设计因子、交通设施因子和公交换乘因子。环境设计因子影响行人美学感知、舒适性与吸引力，更多是衡量城市建成环境的安全性和空间品质，包括友好的步行空间设计、方便的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因子包含时间管理和空间建设；城市小学的空间建设会影响

家庭择校行为，小学时间管理对接送家长的时间制约很大。

建成环境与通学出行的研究应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学校规划与选址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可促进针对儿童上学安全问题、交通安全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政策。

通学出行的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建成环境差异造成的学区房、“中国式接送”等社会问题下，通过建成环境的改善提供一个可让家长放心让孩子独自上下学的通学环境，减小了工作家长接送儿童的通勤压力，也可缓解机动车接送给学校附近交通带来的拥堵与混乱问题，同时增加儿童的体力活动与社会交往机会，促进居民的低碳出行，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城市交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因素角度评估香港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

郎崑 李郇 陈婷婷

摘要：香港城市更新一直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发展，政府和各利益群体竭尽全力地促进城市更新区内的可持续发展。文物保育和城市更新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两者是否可以并存？如何增强和提升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政府、学者和规划师的关注。基于城市更新设计的社会可持续性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介绍旧香港水警总部项目，从社会因素着手评价香港的历史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并探讨其可持续性，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活力。这为国内其他城市在更新建设过程中增强社会可持续性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关键词：社会可持续性；城市更新；历史建筑；旧香港水警总部；香港

引文格式：郎崑，李郇，陈婷婷. 从社会因素角度评估香港城市更新模式的可持续性[J]. 国际城市规划，2018(6): 63-67. DOI: 10.22217/upi.2016.144.

香港城市更新一直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发展，政府和各利益群体竭尽全力地促进城市更新区内的可持续发展。文物保育和城市更新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两者是否可以并存？如何增强和提升社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城市不同，香港的城市更新的目的是在交通便捷的繁华市区，利用以建筑物为主导的更新策略振兴衰败或贫困地区的经济，促使地区经济转型，重塑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采。本文以旧香港水警总部城市更新项目为例，深层次

梳理和挖掘历史建筑保育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探讨城市更新过程中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可持续性。

本文基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以文献综述和问卷调查来评估香港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采用多种统计分析，包括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一套城市更新设计的社会可持续性指标体系。

旧香港水警总部于 1884 年落成，自 1880 年代起至 1996 年一直是香港水警的总部，是香港四所

现存最古老的政府建筑之一。1993 年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同意将该片区定位为一个综合发展区；1994 年该片区被列为香港的法定古迹。2003 年为推动文化旅游，决定由旅游事务署牵头，以商业招标形式将其交于私人发展商，保留旧水警总部建筑并发展为文物旅游景点，成为首个私营机构参与保育，将古迹发展为旅游设施的项目。项目被命名为“1881 Heritage”，于 2009 年正式启用。

“1881 Heritage”项目具有以下特点（或说争议）：（1）保护地方特色；（2）多元需求促进商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3）商业化改造破坏历史文脉；

（4）公共空间受限，改变原有的社区识别。在旧香港水警总部改建的案例中，社会大众，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并没有参与规划决策和规划实施的过程。开发商主导的城市更新打破了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加上缺乏公众参与，人们逐渐对当地社区失去归属感，也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因此，政府、规划师和设计师在今后的城市更新规划过程中，应在寻求区域协调与整体发展的同时，通过以公众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持续渐进的有机更新；结合社会可持续性评价体系，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荷兰空间规划中水治理思路的转变与管理体系探究

曹哲静

摘要：荷兰的城镇发展与水相伴相生，在历次洪涝灾害的应对中，水治理经历了从早期依靠工程干预提高防洪标准，到后期通过生态措施减缓灾害影响的思路转变。荷兰水治理和历次空间规划衔接逐渐紧密，水治理的核心理念被纳入全国《国家基础设施与空间规划战略》和《水规划》的目标、措施和空间结构中。2011—2017 年的“三角洲项目”作为政府水治理的战略性计划，不仅强化了生态措施和韧性规划，更加强了与空间规划的融合。本文以荷兰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 2011—2017 历年“三角洲项目”规划内容的梳理，分析荷兰最新水治理思路转变的关键；并通过剖析荷兰空间规划中水治理的行政体系和法规体系，对中国作出启示。

关键词：水治理；荷兰；空间规划；三角洲项目；行政体系；法规体系

引文格式：曹哲静. 荷兰空间规划中水治理思路的转变与管理体系探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68-79.

DOI: 10.22217/upi.2017.325.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交汇的三角洲平原，水资源既带来了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动力，也隐藏着洪水干旱、淡水短缺、土地沉降、海水倒灌等灾害。荷兰在 20 世纪经历了三次大型洪水，在灾后应对中形成了从早期工程干预到综合生态措施的转变。荷兰城镇伴水而生、以水为用又与洪相斗，经历了以工程手段拦坝蓄水进行土地开发，兴建运河进行交通运输，到通过“三角洲工程”提高堤防标准，更新城镇滨水区，再到以“水土整合”的生态措施调节城镇建设与自然关系的思路转变。

在区域层面，为了保障水资源安全和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荷兰在历次空间规划编中逐渐将雨洪

安全和淡水供给的内容纳入其中。2011 年《国家基础设施与空间规划战略草案》特别指出：北海沿线区域是荷兰航运、渔业、自然资源开采、航海军事训练、动植物栖息的重要区域，需要防御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洪涝灾害，保障淡水供给。

荷兰国家空间规划自 2011 年来不断强调基于气候变化自适应和良好城乡景观的水治理的重要性，并通过结构规划在省级和市级层面进行土地利用和项目建设的落位。《三角洲项目》便是在其框架下的深化，并将成果转化为 2015 年新版国家《水规划（2016—2021）》（Water Plan）的核心内容，包括雨洪安全、淡水供给、水质提升的总体空间规划方案；针对特定流域、海口和地区的空间策略；以及

对可再生能源、航运、区域协作的指引。

荷兰主要水体系统包括马斯河、北海运河、埃塞尔湖、西南三角洲等七大部分；通过水坝调节、淡水湖区域围建和混合水道建设，维持航运水位、保障区域供水、浇灌围垦圩田、调节内陆水位、保护海口生态环境。荷兰三角洲委员会自 2011 年起每年向议会提交《三角洲项目》报告。其核心目标为国家百年雨洪安全、可持续淡水供给，空间自适应的新城开发，由此形成三个全国性子项目；重点在莱茵河河口、西南三角洲、埃塞尔湖、运河、海岸、瓦登地区六大地理区位实施，形成六个地区性子项目。其中针对莱茵河—缪斯河流域提出了“扩大河流空间”（Make room for the river）策略和“缪斯项目”（Meuse Project），针对埃塞尔内湖区提出了同时保障防洪安全和淡水供给的水位高度控制要求，针对瓦登地区提出了生态保育区涵养的目标。

在基础设施与环境部、国家行政指导委员会、省市政府、水董事会的干预下，企业团体、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多方参与，《三角洲项目》形成了共享的知识平台和创新动力；《三角洲法案》（Delta Act）和“三角洲基金”从法规制度和财政上为其提供保障。

《三角洲项目》2011 年首次提出了雨洪安全和淡水供给的长远目标、五大“三角洲策略，以及长、短期项目安排，尤其是确立了贯彻未来 10 年的三个全国性子项目和六个地方性子项目，接下来将每年细化目标和决策框架，对项目作具体工程安排，广泛促进社会参与，并对三角洲基金进行评估。

2017 年《三角洲项目》的重要进展在于提出了将空间规划与水治理结合的具体措施，即将雨洪风险管理和淡水供给与空间自适应性相结合，从而响应气候变化的要求，并在地区层面和不同主体之间展开项目实施。

荷兰政府自 2015 年起达成了“空间自适应三角洲决议”，将在 2020 年前落实针对气候变化韧性水治理的空间政策和行动措施。2016 年荷兰政府发布了《全国气候变化自适应战略》，此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奖励项目和雨洪灾害敏感区项目规划，并着手起草《2017 空间自适应三角洲规划》。2017《三角洲项目》进一步强化了“空间自适应三角洲决议”

中一系列规划工具的运用，包括规划设计工具、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具、公众参与平台工具三类。其中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具主要针对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强降雨、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等灾害与应对措施进行风险预测、情景模拟、成本计算和指标评价。

规划设计工具以导则与案例的形式形成知识共享平台，如“气候自适应设计导则”针对不同城镇环境提出了水利工程与城市设计技术导则，涵盖了堤坝利用、气候自适应建筑、城市强降雨应对措施等维度。

“扩大河流空间”子项目作为 2006—2015 荷兰政府主导的洪水预防、景观修复、环境修缮的独立项目，提出了“韧性规划”策略：承认周期性洪水的环境动态特征，依靠城市的可浸性（floodability），主动适应洪水，而非被动抵抗洪水。因此与之前通过工程措施加高堤坝阻挡洪水不同，“扩大河流空间”项目强调实现自然洪泛区的功能，通过拓宽河流空间等生态干预措施和沿岸土地整理的再开发，减轻河流高水位期对建成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只有在沿岸土地整理难度极大的情况下才采取加固堤坝的做法。

“扩大河流空间”项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空间规划的协调提升区域空间品质：河流及沿岸土地利用将融合生态、景观、娱乐、历史、生产等多种功能，通过维护、适应、更新来增加空间多样性、提升滨水空间开放性、促进主要水道的航运功能。该项目提出了感知价值（perception value）、使用价值（use value）、潜在价值（potential value）三种保护措施；并据此提出了“珍珠项链”“新老河道共建”“拓宽河带”三种情景规划模式。

“扩大河流空间”提出了长短期结合的韧性规划策略：短期策略基于空间品质提升和经济有效性原则，深化了 34 项技术导则措施；长期措施通过与多项空间规划、土地划等规划工具协调，形成高水位敏感区“保留土地”的机制，防止大尺度经济开发和城镇建设，为未来落实“短期策略”做准备。

荷兰在国家—省—市三级行政结构中，水治理和不同层次的空间规划之间均有衔接桥梁，形成了基础设施和环境部（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水务局(Water Authority)、水董事会(Water Board)主导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并通过水环境评估制度对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全周期进行约束。新版《水法》通过“水协定”“排水用水许可制度”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工具保障了与水治理相关

的空间规划的实施。荷兰的水治理经验为我国构建多层次的流域治理体系、寻求雨洪治理的空间规划载体、强化水治理中社会多元参与的行政制度与相关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启示。

新数据环境下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及其规划设计应用

甘欣悦 龙瀛

摘要: 案例借鉴作为规划项目设计中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长久以来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合理、有效的借鉴方法,且在规划研究中少有相应的方法论探索。在新数据环境支持下,基于数据增强设计的框架,利用开放数据平台,本文提出了适用于增量和存量规划设计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并以通州新城城市设计为例探索了增量型量化案例借鉴方法的应用。研究证明这一方法可为规划设计实践的案例借鉴部分提供理性支撑。

关键词: 方法论;新数据环境;城市设计;数据增强设计

引文格式: 甘欣悦,龙瀛.新数据环境下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及其规划设计应用[J].国际城市规划,2018(6):80-87. DOI: 10.22217/upi.2017.087.

本文针对当前城市规划设计项目中,案例借鉴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但是缺乏合理且有效的方法支撑问题,在新数据环境支持下,基于数据增强设计的研究框架,利用现有的建成环境量化研究方法,提出了在增量和存量城市规划设计中量化案例借鉴的技术框架。该框架首先对所选案例城市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分析,提取空间维度的指标并进行量化后,作为城市基因添加到对应的城市空间维度分类中,形成以城市空间维度为分类标准的基因库;并针对未来规划的城市,将各个基因库中适合的基因组合到规划城市中,根据规划城市的现状和规划条件灵活调整;最后,当规划方案完成后,对规划城市的各项空间数据进行量化评估,并与规划城市的现状和案例城市相应的指标进行综合比较。该技术框架同时适合于增量和存量地区的数据增强设计的实现。

在实证研究中,以增量型地区——通州新城规划设计为例进行该技术框架的应用。根据通州新城规模、与中心城区距离以及未来规划定位,在开放街区地图(OSM)诸多符合条件的城市中确定了三个数据较完整,并且在规模、距中心城市距离、城市性质上都与通州新城大致相似的大城市周边城市,分别为日本横滨(Yokohama)、荷兰新城阿尔

默勒(Almere)、法国新城马恩拉瓦莱(Marne-la-Vallée)。

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对案例城市的空间维度进行分类、指标量化和基因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案例城市基因库,每一个基因具有相应的指标和对应的空间组织方式,并结合通州新城的现状条件及规划目标,将该基因库中适合于通州新城未来城市形体生成的基因用于规划与设计方案中,以组团为单位,形成了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站点核心区周边两个层次的城市空间形态基底,并结合空间句法分析进行城市功能布局。最后通过评估和对比通州现状、规划方案与案例城市的城市形态指标,规划方案对路网密度、建筑密度、街区尺度、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做出了优化和调整。

本文研究表明量化案例借鉴的方法可为规划设计实践中的方案生成提供完整技术框架的指导。这一方法并非城市外观或是建筑形式上的简单模仿,而更加强调对案例城市形态进行量化再抽象后的一种城市空间模式和城市开发量上的借鉴。案例应用重点解决了增量型地区城市空间从无到有的问题,可为规划项目实践和规划方案设计提供科学理性的支撑,在规划项目设计中具有应用价值。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及规划策略研究

姜玉培 甄峰

摘要：在信息通信技术逐渐渗透到城市生活领域的背景下，本文从作用过程与结果方面厘清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生活空间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空间规划策略。研究认为：在 ICT 作用下，城市居民虚拟生活空间进一步延伸到实体生活空间，并通过数字媒介传递进行交互与融合，促使城市生活空间日趋呈现出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移动化、体验化等特征。尤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城市生活空间呈现出新的空间组织结构，以及新的人地交互模式。此外，不同信息资源条件下不同生活空间居民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的响应和表达方式。因此，结合信息化影响下城市生活空间出现的新的社会、空间问题，指出城市生活空间的优化应在“人本”规划的基础上，依托信息通信技术构建功能多样复合、集约高效利用、富有内涵特色、信息化程度高、注重空间正义、虚实相融的生活空间。

关键词：信息通信技术；虚、实生活空间；空间规划策略

引文格式：姜玉培，甄峰. 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影响及规划策略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88-93. DOI: 10.22217/upi.2017.476.

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向城市领域的日益渗透，城市空间已成为瞬时的信息空间，并深刻影响着以空间为载体的居民日常生活活动及行为。在这种影响下，城市居民与空间设施、城市居民之间在日常时空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些新的生活活动模式和社会交往关系，作用到一定空间上，带来了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包括虚、实城市生活空间并存与交互联系，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日趋多样化、复合化、破碎化、移动化、体验化，进一步形成了基于“物联网”的城市居民生活空间新格局，但由于信息供给和约束条件的空间差异，不同人群在日常活动模式、时间利用、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响应与表现。

信息通信技术在带来上述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空间割裂与错位、生活空间景观同质化、基础设施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公共生活空间营造缺乏信息时代理念、部分实体社交空间被虚拟社交空间挤占等城市社会或空间新问题。从提高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空间质量与品质等方面出发，笔者认为未来城市规划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构建功能多样复合，集约高效的生活空间。根据土地利用情况，做好生活空间功能多样复合程度的界定，实施城市建设用地的弹性化规划。积极

培育混合居住空间、新型办公空间、承载学习功能的休闲空间等新型空间形式。同时，将城市中需要更新改造的废弃空间通过一定的规划设计打造成集娱乐、休闲、工作等多个功能为一体的空间载体。

(2) 保护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内涵。在城市生活空间建设过程中应当保护历史特色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挖掘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内涵，注重城市特色与内涵在居民生活空间、生活方式上的表达与创新融合，尝试具有活力的更新方式，拒绝呆板的城市形象和单调的城市生活空间。

(3)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空间正义。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需求合理衡量的基础上，明确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节点布局、建设时序等。此外，降低信息化水平较低人群信息基础设施的空间使用成本，注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空间正义，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共享水平。

(4) 优化公共空间，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加强公共空间的信息化水平，并开放公共空间，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中，适时整合城市各类社会资源，进而挖掘公共空间的发展潜力。

(5) 促进虚实社交网络融合，化解虚实社交孤岛。倡导社会交往回归部分实体空间，积极营造现实交往氛围，在不同尺度上构建更加开放的现实交往空间。同时，也需要把虚拟社交空间接入现实交

往空间，构建线上线下交流融合的新型社交空间。

(6) 探索居民活动规律，落实“人本”规划。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借助大数据及相关研究方法，以及相关问卷调研小数据，分析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移动的时空距离、个体空间行为、社会关

系网络、居民生活状态、微观生活决策等，从城市居民的微观行为特征研究城市生活空间的形成过程和内在机理，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生活空间的质量。

基于形态准则视角的 TOD 横断面分区分类管理

刘泉 赖亚妮

摘要：近年来，美国部分城市在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开始采用精明准则或形态准则取代或补充传统区划。横断面模型作为形态准则描绘城市和进行规划管理的重要方法，也在多个城市的 TOD 规划实践中进行了应用，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城市或线路层面基于横断面模型与轨道公交等交通条件进行 TOD 分类，编制城市设计导则；二是中观层面在站点地区按照横断面进行 TOD 分区，编制形态准则。在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城市设计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各大中城市逐步开展轨道公交建设并进行 TOD 开发的背景下，对横断面模型在美国 TOD 规划中应用的方法进行总结，能够为我国同类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思路。

关键词：公交导向开发；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形态准则；横断面模型

引文格式：刘泉，赖亚妮. 基于形态准则视角的 TOD 横断面分区分类管理[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94-101.

DOI: 10.22217/upi.2016.400.

近年来，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站点地区进行 TOD 开发愈加成为城市建设关注的开发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为了确保数量庞大的轨道站点地区 TOD 规划获得成功，规划管理部门普遍采用编制 TOD 规划指引的方式进行整体系统的控制引导，如住建部编制了《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甚至重点片区及线路等均开展了相关研究或编制了相关的指引。不过，不同城市的指引编制方法各不相同，如何使 TOD 规划管理更加合理好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在对 TOD 规划指引编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注意到作为 TOD 概念发源地的北美地区内已有相当多的城市开展了大量的同类工作，例如早在 1990 年代，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的经典著作《未来美国大都市：生态·社区·美国梦》（*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本身即是脱胎于美国圣迭戈等地 TOD 实践形成的规划设计指导书。此外，

如佛罗里达、萨克拉门托、丹佛等州、县、市不同层面的 TOD 规划中均存在编制规划指引作为管理手段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美国城市的 TOD 规划管理工作中，借鉴形态准则（Form Based Code）方法构建横断面模型进行分区或分类引导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如迈阿密、夏洛特、萨克拉门托和利安德（Leander）等城市或地区的 TOD 规划实践均采用了划分横断面进行分区分类的思路。与以往规划强调用地功能优先的传统思路相比，形态准则提出“形态优于功能”的理念，强调空间形态塑造与人的使用的重要性，更加重视城市设计要素的作用。与我国部分城市的规划指引侧重强调站点的交通特征（如分为枢纽站、中间站、端头站、车辆段站等类型）、区位条件、重视容积率等刚性指标控制的方式不同，基于形态准则视角的 TOD 横断面分类内涵更加丰富，并非仅仅从交通角度对轨道站点进行分类，而是对站点所在城市地区的空间类型进行划分，对该区域空间形态、功能需求、环境特征进行描述，综合确定规划目标

与管理要求,对 TOD 地区不同圈层和地块具体城市设计需求进行回应。这种规划管理思路更加关注站点地区城市发展的整体需求。

此外,我国规划研究学者对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或形态准则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介绍、探讨和批判研究,也探索和实践了 TOD 规划及管理方法,但对形态准则或横断面模型在 TOD 规划这一专门领域中如何应用的方法和技术缺少专门的关注。在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城市设计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各大中城市逐步开展轨道交通建设并进行 TOD 开发的背景下,对横断面模型在美国 TOD 规划中应用的方法进行研究,能够为我国同类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思路。

基于这一理解,本文对美国城市 TOD 规划管理中应用形态准则和横断面模型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城市或线路层面基于横断面模型与轨道交通等交通条件进行 TOD 分类,编制城市设计导则;二是中观层面在站点地区按照横断面进行 TOD 分区,编制形态准则。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 TOD 规划中,横断面模型既能够在城市整体或轨道线路层面帮助站点地区进行分类,以识别和强化不同站点地区的特征,也能在具体的站点地区规划中,与 TOD 圈层拓展的空间模式相结合,促进 TOD 地区的功能集聚和空间优化。这些方法使得 TOD 地区的规划管理更加精细化和有针对性。

嵌入性治理:法团主义视角的中国新城空间开发研究

冯灿芳 张京祥 陈浩

摘要:我国城市空间开发的治理模式选择中,存在着“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文章认为,法团主义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意义,并基于这一视角,以苏州高新区为实证,重点厘清了城市空间开发中,政府通过大量设立各种类型的准政府组织,实现对于市场与社会的“嵌入式”治理机制,并辅以“制度嵌入”和“利益嵌入”手段,实现空间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有效管理的双重目标。本研究的结论是,面对市场与社会日益多元的利益要求,政府通过实施“嵌入性”治理手段,可以卓有成效地吸纳新型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提升自身对于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维护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发展干预的权威性与韧性。

关键词:嵌入性治理;法团主义;空间开发;准政府组织;苏州高新区

引文格式:冯灿芳,张京祥,陈浩.嵌入性治理:法团主义视角的中国新城空间开发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8(6):102-109. DOI: 10.22217/upi.2017.572.

分权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三重改革带来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崛起,三者的强弱地位及组合形式影响城市空间资源的配置。尽管我们知道“多元协商”机制是治理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方向,然而,如何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学术界与政策界并未达成共识。

这来源于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的特殊性,一方面我们保留了国有土地所有制、行政划拨、国家投资开发建设等一系列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遗产,另一方面土地使用权改革、商业用地开发的市场化机制等一系列市场化转变。可以说,当下城市土地开

过程中,仍然同时存在着“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两种相互竞争的手段。

围绕不同的治理模式,学界也形成了两种彼此竞争的“学派”,即“市场主导”的支持派和“政府主导”的支持派。他们以不同的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现象,并引发了莫衷一是的模式选择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呈现此消彼长之势。

以上的争议,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说:在城市土地开发这一政府垄断的领域里,面向市场化改革,政府应该与市场和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怎么去

优化? 鉴于此, 研究将借用国际学界强调“权威政体”结构变迁重要理论之一——法团主义 (corporatism) 这一视角, 以“嵌入性治理”为分析框架, 来审视和指导当今我国城市土地开发。

区别于多元主义, “法团主义”强调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权威政体, 而“嵌入性治理”则是权威政体在中国语境下民主化的治理特征, 是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创新性理论。其核心观点是: 政府、社会与市场主体, 并不是完全的独立个体, 它们之间存在大量的中介性组织和中介性媒介, 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依赖这些中介性组织和媒介来促成彼此之间的合作, 从而达成共赢。

而具体到城市空间开发领域中, 主张政府在社会和市场形成纵向“嵌入性”治理结构, 分别由“组织嵌入”“制度嵌入”和“利益嵌入”三部分组成。三者构成一个闭环、稳定的“嵌入性”治理结构, 维护政府权威地位, 并避免国家/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直面冲突, 从而有利于实现柔性治理。

在城市土地开发领域中, 研究将进一步聚焦新城新区。为什么呢? 以新城为载体的大规模土地资源开发、积累与增值, 形成了具中国特色的“造城运动”, 其开发成就是西方国家不曾拥有的。另一方面, 与“造城运动”相伴而生的是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中国特色的开发矛盾, 也是西方国家未曾遇到过的。以新城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 能深刻窥探我国城市土地开发的特色、特点和独特性。而重点实证对象为苏州高新区, 因为它经历过较为完整的发展历程。

从法团主义视角来看, 以苏州高新区为剖析案例, 发现我国新城新区土地开发确实呈现典型的“嵌入性”治理特征: 作为地方政府代理人, 管委会主导土地征收、开发规则及空间秩序的建构; 同

时充分利用各种准政府组织, 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嵌入到市场和社会中, 构建“社会规制与服务之网”。比如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村民委员扮演上挂下联的作用, 并充当征地拆迁纠纷的防震器, 避免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直接矛盾; 而在土地开发过程中, 各类国有开发公司成为高效落实政府发展意图、为项目进行融资、开发与经营的执行主体, 充当城市开发的加速器, 而各类事业单位成为政府为市场与社会服务的支持者。

各种新型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土地产权嵌入和多种利益同构中也不断地被体制化、吸纳或同化, 各种“反力量”被有效预防和抑制, 最终构建稳定的治理四面体。

从以上四面体结构可以看出, 中国地方政府高度介入城市土地的开发, 并没有经历西方那种明显的“权利”收缩过程。而面对市场与社会日益多元的利益要求, 政府通过实施“嵌入性”治理手段, 可以卓有成效地吸纳新型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 提升自身对于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 维护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发展干预的权威性、高效性与韧性, 并支撑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空间高速扩张的奇迹。

当然, 该模式也有嵌入过度的风险, 存在组织行政化、制度供给过剩、资源分布不均等潜在矛盾, 需要与时俱进改进嵌入的方式和程度。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 法团主义视角提供了不同的治理思路——嵌入性治理模式, 通过构建“小政府、强政府”格局来保持“中国模式”的体制优势, 尤其契合“权威政体”的民主化治理, 这是有别于西方三元分立、制衡基础上建立的伙伴型治理, 是对治理这一源于西方理论的有益丰富与发展, 为改善全球城市治理实践提供了中国之策。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研究

靳文博 翟国方 何仲禹 陈伟

摘要: 城市建成空间环境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从城乡规划学视角出发, 采用 CGSS2010 问卷结果、统计年鉴数据和六普人口数据为样本,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析探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尝试将提升居民幸福感这一抽象的规划目标具体分解到便于管控的量化型规划指标层面。分析结果表明,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城市

道路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绿地面积等 5 个因素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道路用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建议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确定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取值范围时，应充分考虑对居民幸福感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规划编制工作的角度对主动干预居民幸福感作出有益的探索尝试。

关键词：城市规划；主观幸福感；建设用地指标；有序 Logistic 回归

引文格式：靳文博，翟国方，何仲禹，等. 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城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间关系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110-117. DOI: 10.22217/upi.2016.052.

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未停止。

城市、规划与居民幸福之间，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早在 2000 年前就提出，“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居留于城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指出，田园城市的本质是“城乡一体化的新城市，满足广大普通人民安居乐业需要的家园城市，消灭贫民窟和贫富差距的公平与平等的城市，其居民幸福而满足”。以城市美化运动和城市环境保护运动为代表，近现代城市规划工作对城市居民健康幸福的关注持续加深。2015 年底，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城市工作必须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 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近年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各种不稳定因素及风险共生现象逐渐显现，中国居民幸福感随之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因此，维持乃至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对城市功能的认识已呈现从“经济贡献”向“幸福功能”转变的趋势。福利、效率和公平正义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推动了全社会对“你幸福么”这一议题的热烈讨论。

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初步证实，城乡差异、住房产权、房价、城市规模和微观设计要素等因子可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我国规划学界已就“幸福

城市”的内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展开了初步的讨论，但尚未在规划能否主动干预城市居民幸福感，以及具体干预方式等问题上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CGSS2010) 问卷结果、统计年鉴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定量考察了城市总体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道路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 5 个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人均居住用地面积、人均道路用地面积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即，人均居住用地面积越大、人均道路用地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概率越高；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越小、人均绿地面积越小，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概率越高。各项指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是规划学界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索的议题。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建议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应将相关指标对居民幸福感可能造成的影响纳入考虑，以期对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做出主动而有益的探索。

法国乡村复兴过程中文化战略的创新经验与启示

李明烨 汤爽爽

摘要：1970年代起法国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发展，并将文化维度融入乡村整治规划等公共政策。到1990年代，法国逐步形成了集文化设施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人文景观规划、文化项目开发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战略，对乡村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普遍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乡村地区的建设仍以物质空间改造为主。由此，本文聚焦于法国乡村复兴进程中的文化战略，首先回顾了法国乡村复兴历程中公共政策的演变，重点考察文化维度的政策发展；进而阐述法国乡村文化战略的内涵与创新经验；最后对我国的乡村复兴政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法国；乡村复兴；文化战略；文化项目

引文格式：李明烨，汤爽爽. 法国乡村复兴过程中文化战略的创新经验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118-126. DOI: 10.22217/upi.2016.433.

2015年，我和南京大学的王红扬教授一同完成了江苏省建设厅关于《法国乡村发展与特色保护的借鉴》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我意识到文化战略对法国乡村复兴起到的积极催化作用，便开始着手梳理总结相关法国经验。

总体来说，法国乡村复兴过程中文化战略的实施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系。首先，在发达经济体中，法国城市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法国乡村在政策干预下从衰败走向了复兴；其次，法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文化大国，从1970年代起法国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发展，逐步形成了针对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对乡村复兴起到了催化作用。

需要承认的是，即便是在法国这样的文化大国，在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政策也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乡村文化政策相对缺失；直到1970年代—1980年代，才出现首批自下而上的乡村文化项目。1990年代，法国文化部和农业部部长共同指出，“文化不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995年颁布的《领土规划与发展指导法》以法律形式指明了乡村复兴区的文化战略，明确了文化发展对乡村复兴的促进作用。2000年以来，乡村文化被视为乡村特性的重要方面，地方主导的乡村文化项目受到国家政策鼓励。这一转变伴随着法国乡村从危机到复兴的全过程。

具体来说，法国乡村文化战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1）满足乡村地区多元化的文化诉求，推动

城乡平等；（2）突出乡村特性，促进乡村地区的复兴。

法国当前的乡村文化战略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与乡村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地方造就文化”，即文化源于当地资源；另一方面，“文化造就地方”，即文化赋予地方发展新的活力。

法国实施乡村文化战略中的创新经验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通过流动性、多功能、城乡共享等方式弥补乡村文化设施的不足。法国乡村地区人口密度较低，造成文化设施建设的不经济，为此，法国保留了乡村流动文化设施的传统，通过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巡回表演、文化节等弥补乡村地区文化设施的不足。同时，为了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法国乡村地区的文化设施和场所往往具有多功能和多用途的特点。一些非专用于文化传播的场地，如历史建筑（教堂）、农业设施（仓库）、公共空间（广场）常作为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建立多尺度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提升乡村“小遗产”和“大景观”的文化价值。相对于都市区而言，乡村地区的人文景观具有分散、规模小和与农业文明联系紧密等特点，俗称“小遗产”。为此，法国区域自然公园制定了乡村小遗产的识别、保护和价值提升指导手册。同时，法国乡村的“大景观”也被融入乡村遗产保护中，构建起独有的文化意象，使其成为经久不衰的魅力源泉。普罗旺斯地区便是其中典范：薰衣草田、古罗马遗迹、中世纪村落、梵高画中的阿尔勒小城和向日葵，这些元素源于当

地资源，构成“普罗旺斯”这一地区独有的乡村文化意象。

引导和培育“以人为本”的乡村特色文化项目，发挥其综合效益。法国文化与宣传部对文化项目的定义为“作品、公众和合作伙伴。其必要条件是呈现文化作品，根植于当地的风土人情，汇集不同的人”。法国乡村文化政策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为乡村文化项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首先，法国十分重视艺术家在乡村文化项目中起到的引导和教育作用，并鼓励他们到乡村发展文化事业。其次，公众作为重要参与者，是乡村文化项目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关键。最后，地方政府、民间协会与专业公司的同通力合作，确保了法国乡村文化项目可持续运作。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城市规划应对之启示

蒋希冀

摘要：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正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城市健康发展和居民身心健康正面临严重威胁。半个世纪前的洛杉矶政府在经历严重雾霾事件的过程中，协调多方利益诉求，采取积极的管治措施及公共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其大气环境。笔者基于事件流分析方法，从洛杉矶城市发展历程、规划相关编制成果，以及雾霾事件发展历程及参与主体在其中的博弈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探究城市规划及相关公共政策工具在洛杉矶雾霾爆发期间以及后雾霾时代所起的作用；针对我国城市现在所面临的大气环境问题，提出洛杉矶雾霾事件之启示。

关键词：洛杉矶；雾霾事件；健康城市；城市规划；经验与启示

引文格式：蒋希冀.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城市规划应对之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127-133. DOI: 10.22217/upi.2017.298.

洛杉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无序缓滞发展时期（1780年代—1880年代）；（2）石油产业引领期（1880年代—1930年代）；（3）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期（1930年代至今）。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对城市形态、人口规模以及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城市发展角度而言，洛杉矶的城市规划就像全球其他许多大城市一样，经历了从重点关注城市发展方向与结构、土地使用、用地配置和交通系统等问题，到同时关注居民的城市生活品质（如健康）的转变。这一过程的变化往往都伴随着相关规划政策或编制成果的颁布。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盲目无知期（1940年代—1950年代），这一时期民众和政府对于雾霾的由来都一无所知，政府并未对雾霾的来源进行有计划的研究，更未开展相关空气质量改良行动；（2）推责徘徊期（1950年代—1970年代），虽然研究学者斯密特（Smit）寻找出了光化学作用才是雾霾毒性如此大的根本原因，但

碍于庞杂的利益链条，大气治理行动仍然推进缓慢；（3）大气污染改善期（1970年代—1990年代），随着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大力推进，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积极的污染气体排放管控和研究与净化工作使得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相比雾霾事件时期，21世纪的洛杉矶大气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离空气质量健康阈值（ $50\mu\text{g}/\text{m}^3$ ）还有一定差距，仍然严峻的健康结果和污染空气组分的变化需要政府和民众提高警惕。

洛杉矶雾霾事件的演进实质上是政府、民众、企业家、媒体以及其他相关群体追逐自身利益而联合或博弈的过程。雾霾事件参与主体的博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两次博弈有着不同的结果：（1）第一次博弈的结果是政府部门明显倾向企业利益集团，虽然成立了相关空气管制部门、划定了空气管制区，但是他们采用的是消极政治态度和手段对待日益加强的民怨，本质是为了维护石油集团为主的产业链条的集体利益；（2）第二次是由于空气质量恶化、

城市居民健康严重受损等客观现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同时科学研究者也分析研究出了雾霾现象的本质原因，博弈的结果是政府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进行干预。其中，规划部门对雾霾治理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参与到洛杉矶大气污染管控事务之中、相关规划编制成果体现对空气环境改良的考虑及具体应对策略。

总体而言，洛杉矶相关规划作为“前雾霾时代”“雾霾事件期间”“后雾霾时代”的重要公共政策手段，分别旨在达成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缓解城市内生性问题以及营造健康城市等不同目标。相关规划文件主要包括《1924 年洛杉矶主要道路规划》《1970 年洛杉矶总体规划》《设计一个健康的洛杉矶》

（2013 年）《洛杉矶郡总体规划 2035》（2015 年）以及《健康洛杉矶规划：总体规划的健康要素》（2015 年）等。

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环境问题，洛杉矶雾霾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有：（1）将良好空气环境营造纳入规划编制重要内容，开展针对空气环境问题及改善策略的研究；（2）规划部门和规划师需广泛参与到空气治理行动中，包括跨部门的协同与多学科交叉研究；（3）明确空气治理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特征，对污染物浓度和组分构成实行动态监管，以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优化策略；（4）完善的制度保障空气治理，包括法律法规、资金支撑和行政管理等方面。

政府监管、非营利机构运营的荷兰社会住房发展模式

焦怡雪

摘要：荷兰的社会住房以覆盖面广、居住品质高等特点著称。在百余年的长期发展中，荷兰形成了在政府授权和监管下，由独立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和管理社会住房的发展模式。本文聚焦于荷兰社会住房发展中政府和住房协会的不同角色、住房协会的管理与运营框架，以及对住房协会社会责任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以期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与管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荷兰社会住房；政府角色；运营架构；监督机制

引文格式：焦怡雪. 政府监管、非营利机构运营的荷兰社会住房发展模式[J]. 国际城市规划, 2018(6): 134-140. DOI: 10.22217/upi.2016.482.

2013 年，我有幸入选欧盟的“亚洲城市知识网络”（UKNA）基金资助项目，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进行社会住房方面的研究。前往荷兰之前，我就了解到荷兰社会住房在全部住房中的占比是欧洲最高的，其居住品质也相对较好。但实地参观后感到荷兰社会住房的房屋质量、配套设施、社区环境的总体水平仍然超出预期。

早在 1901 年，荷兰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住房法》，提出要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由政府公共财政补贴的社会住房。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荷兰已经形成在政府授权和监管下，由独立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以市场化方式提供和管理社会住房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重点探讨荷兰政府在社会住房不同发展阶段中职责的变化，住房协会的核心任务、管理架构、资金运营框架以及

约束监督机制，希望能够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运营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荷兰政府在促进社会住房建发展方面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转变。随着社会住房发展目标从解决住房短缺转向提升居住品质，政府的角色也逐渐从直接建设和分配社会住房转向支持和监督住房协会提供社会住房，从提供社会住房建设补贴转向提供低收入家庭房租补贴，从为住房协会直接提供贷款转向提供金融安全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中央政府始终保持了对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的直接干预：在恰当的地点保持足够数量的社会住房，社会住房的可支付性，以及社会住房的质量。

住房协会是政府授权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承担向目标群体（一定收入以下的中低收入家

庭、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提供社会住房的公共责任。1995年,荷兰政府完全停止向住房协会提供一般性的新建社会住房补贴,从此住房协会走向民营化和市场化经营。住房协会在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很高的效率和专业性,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与运营机制。在管理方面,目前绝大多数住房协会的法定形式为基金会,采用包括监督理事会、管理人员和租户组织在内的管理架构。在运营方面,荷兰社会住房在发展初期,资金主要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市场化运营后形成了以社会住房的租金和出售收入为主,以政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为补充的资金运营系统。早期大量的政府建设投入、住房协会多年持续经营的积累和近年来社会住房的出售,是住房协会持续提供高品质社会住房的基础。

尽管住房协会是市场化运营的独立机构,但因承担着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社会住房的社会责任,因而对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约束与监督非常严格,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的监管、住房协会的行业自律和机构内部监督,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监督等。

荷兰社会住房发展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包括以《住房法》作为社会住房发展的法律基础、坚持政府在社会住房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支持非营利机构住房协会以市场化途径运营管理社会住房、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住房资金运营管理体系等,可以为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造城者》：一首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的哀歌

侯丽

摘要：《造城者》是美国知名城市政治学学者苏珊·费恩斯坦的学术代表作。作为本书的中文版译者，作者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背景、内容、主要贡献、后续影响，回顾了费恩斯坦的学术生涯，比较了第一版（1994年）和第二版（2001年）的差异，分析了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并对本书所存在的争议和对当代中国城市的启示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城市政治学；纽约；伦敦；政体理论

引文格式：侯丽.《造城者》：一首纽约左翼知识分子的哀歌[J].国际城市规划,2018(6):141-146. DOI:10.22217/upi.2018.406.

《造城者》(*The City Builder*)是我在研究生阶段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与本书作者苏珊·费恩斯坦在此之后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公正城市》(*The Just City*)相比,《造城者》的一大贡献是在实证的基础上丰富了对城市开发进行分析的理论工具,尤其是在政体理论(regime theory)方面。纽约和伦敦作为规划师们耳熟能详的城市样本,在费恩斯坦的这本书里被深刻解剖、无情批判。谁才是当代城市的缔造者?谁更有发言权?谁应该拥有对城市的权利?费恩斯坦学术生涯的基本观点,可以说都淋漓尽致地在本书中表现了出来。

学生时读书怀着敬畏心理,喜欢城市繁华背后的精彩故事:例如赖希曼家族在北美的戏剧性发迹,而撒切尔如何说服他们进入伦敦市场,然后接手的

梅杰政府在1990年代的房地产危机中袖手旁观,任其破产;例如书中对那时在纽约之外还不怎么闻名的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先生的冷嘲热讽——一个“巧取豪夺和胆大妄为的化身”。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女性学者的独特视角,在理性的制度分析之外,费恩斯坦敏锐地发现,个性及性别因素也在影响着开发行业,书中对那些在房地产开发中占据权力主体的男性企业家们“受雄性自我意识驱动而努力建设高楼,并在城市景观上留下其个人印记”的评语,仿佛《动物世界》纪录片的旁白,每每想起都不禁莞尔一笑。

翻译此书给了我重温经典并且逐字逐句深度阅读的机会。敬畏之外,对于书中的内容我有了更深的理解、认同,以及不尽认同的地方,还有随着

岁月流逝看到太平洋两岸城市繁华共情的些许悲凉。本书第一版完成于1994年，西方城市学者们先是欣喜地看到在经历了1960年代—1970年代的郊区化和内城衰落之后，城市开发与再开发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心性增强了，城市变得更加聚集；另一方面，这种再中心化与传统规划理念所呼吁的理想空间模式大相径庭，城市成为以快速盈利为目的的投机性建设爆发式增长以及现实的空间需求双重压力下的产品，地区之间无止境的竞争、不平衡的发展和收益造成了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生活的便利、城市的多样性、福利的均等、城市的公正，却渐行渐远。

费恩斯坦始终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深刻抨击城市对特定人群的偏见和压迫。在《造城者》结尾，费恩斯坦并没有给出一个强有力的结论，而是审慎地提出了希望。书中尖锐地指出，追求社会进步的左翼党派或者团体应当不仅仅能够阻挡一个项目的进程，而且要能够提出可替换的、兼顾增长与公平的方案。然而，不可苛求的是，费恩斯坦也没有找到她理想的答案。当代美国规划理论界总的说来由左翼知识分子所主导，特别是在东西两岸的名校和研究城市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中，费恩斯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城市政治学研究兴起的几十年来，

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普通美国人民没有接受左翼精英的理论，美国社会的主要基础越来越趋于保守。新马及结构主义的理论家很好地研究和解释了美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他们与美国城市发展的实践脱节，同样提不出改变现状的方法及途径，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影响力。他们提出了对社会的诊断，却没有治病良方，眼看着社会发展与他们所倡导的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而束手无策。这是本文副标题称之为“哀歌”的由来。

从积极的角度讲，阅读本书的启迪是，如果一个时间周期更长的开发能够对多元利益有更好的回应，空间形态上体现为更具韧性的开发，那么规划师应该如何配合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有利于这一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具有不可避免的周期特性，而公共部门明显在市场高峰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我们应该怎样在此时利用规划政策工具保障公共利益和社区福祉？如果房地产过度供应带来的经济危机可以成为城市住房平价供应的一个契机，政策应该如何设计以允许并促进其发生？利用危机而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设计更加渐进、包容的城市发展政策，这是规划师们值得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欲了解本册更多详情，请联系编辑部。

《国际城市规划》集萃 | 2018